主　编　李树喜

副主编　张　程

编　委　张　程　陈娇娇　王　琦　夏　炎

　　杨　亮　李晓瑭　刘　晖　衣　远

　　陈丹正　周　丹　李　瑛　岳泽深

　　李　峻　蔡文俊　张　琴　蒋俊超

导言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被西方部分史学家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被视为当今全球化趋势的起步和渊薮。哥伦布和达·伽马在世界历史领域得到了反复地研究，重视度逐步提升，再通过当今西方的文化强势开始影响到国内的历史研究和观念。这一现象包含着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对世界历史中中国身影的忽视。

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前半个世纪，明朝的郑和就曾率领规模和技术都先进得多的船队七下西洋。与西方的金钱导向不同，郑和下西洋是带着使节、礼品友好前往的。这与那些欧洲船队携带枪炮，贩运奴隶的航行有着本质区别。在全球化视野中，当我们将精力倾注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上的同时，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审视古代中国[①]与世界的关系，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探讨古代中国的世界身影？

现实生活中，中国的世界身影随处可见。当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前往东南亚地区旅游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大量中华文明的印记。作为长期雄踞东亚的辉煌文明，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营造了延续千年的中华文化圈；即使在具有极高文化优越感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身影也日益渗透入其社会。中国古代的典籍、中

① 书中的古代中国相当于约公元前二三百万年前人类出现到 1900 年为止。

医、气功、武术、京剧、旅游等书籍一直是欧洲和美国书店中的醒目常客。书中的内容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部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可见中国正持续不断地对中华文化圈和西方社会产生影响。

这些影响是分领域、分内容的。古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有限，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的落后，使得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难以为继。中国的地理位置：北临蒙古高原，东临太平洋，西南是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正西面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戈壁。因此，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展开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古已有之。四大发明、建筑、茶叶、丝绸、瓷器等一直为东西方所津津乐道。

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政治影响却又是时断时续的。虽然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权威不断稳固，营造了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政治影响在明清之前十分薄弱。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政治交流远远不如经济文化科技交流频繁，也缺乏深度。16 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开始进入亚太地区，东西初识。中国的制度、思想开始在欧洲掀起中国热潮，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开始关系到全球的政治冷暖，反之亦然。近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逐渐瓦解。1900 年，八国联军的铁骑踏入北京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相互影响奏响了最强音。

一

《山海经》中的一篇《穆天子传奇》。给了后人很大的遐想空间，我们可以将之当作是中华文明早期对外交往的记录。在夏商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缔造出了当时世界上引领潮头的奴隶帝国和璀璨文明。这一阶段，中华文明尚处于自我构建时期，尚未对外展开大规模的交流。殷人东渡和先民四散等传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夏

商周能给予世界历史的，主要在于它们孕育了早期的中华文明和民族先民，为日后丰富多元、异彩纷呈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文明奉献了浓墨重彩的中华身影。

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暴力阵痛和思想争论，统一的秦帝国开启了中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英文中国名称“China”一词的来源就与秦王朝有关。与秦并列的罗马帝国根据秦的发音称中国为“Chin”。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为后来的英文所借鉴。中国的英文发音就变为了“China”。“China”一词也由单纯的“中国”之意逐渐衍生出“瓷器”等与中国有关的意思。

秦二世亡。续秦而起的汉王朝不仅赋予了我们民族永恒的名字，更是奠定了中外交流的雏形。中国身影从此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出现在世界历史之上。汉王朝东与朝鲜、日本相邻，南接越南、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西与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都有联系。秦汉以降，中外交通渐开。随着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国与中南半岛和南方海上诸国的交通逐渐开发；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开辟了“丝绸之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出使西南，开辟了西南商道。汉朝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中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跃。汉朝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通过“丝绸之路”等通衢源源不断地输出国门。轻柔华贵的丝绸成为汉民族最迷人的名片，风靡东西方的上层社会，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为了管理西域、保障商道，也为了满足日益频繁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汉帝国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设立亭栈，以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从此，汉朝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商业贸易日益频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盛世。每逢盛世，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经济飞速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此时中国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这就使得唐朝成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发动机，不断扩散影响，使他国对中国产生依赖性。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

望，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学者们为我们描述了盛唐的辉煌气象："长安是世界之都，宫墙御道、街市佛寺，东西 10 公里，南北 8 公里，比我们今天看到西安城墙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邻藩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贵族、大食的药材宝石商人、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康国、吐蕃的马匹、皮毛，阿拉伯的鸵鸟、没药，天竺的孔雀、白莲花，波斯的铜器、树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丽的纸，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礼拜。长安是帝国之都，有世界胸怀与气象。阿富汗人与叙利亚人骑着波斯战马在大唐军队里服役，近 10 万大食番商则在广州城里居留。广州、扬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停在城外珠江面上，暖风温润，夹着岸边荔树黄花的芬芳与居家沉醉的人烟味儿；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近于帝国中心也更繁华。歌台舞榭，胡姬当垆，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①

这种万邦来朝的形势随着唐宋盛世的延续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多数科技发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从 20 世纪的科技器物开始追溯，发现早在唐宋时期中国贡献的智慧就已经奠定了约 1000 年后的科技基础。

蒙古骑兵的远征将中国的影响最直观、最迅速地扩散至多瑙河畔。亚欧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都镌刻下了中国的身影。蒙古人缔造的庞大汗国，成为了中外交通的巨大舞台。宋元时期有不少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国，最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宋元海外贸易发达，泉州、广州、明州等地，至今还保存有宋元时期阿拉伯式样或基督教式样的坟墓和墓碑。

以泉州为例，泉州海上交通发达，早在唐代就是中国重要外贸

① 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 年第 3 期。

港口。宋元时期泉州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锚地，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关系，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随着海外贸易愈益发达，外商来港越来越多。元代的张翥在《蜕庵集·清源洞图为洁上人而作》一诗中写道：

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梅檀绕。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商船多海宝。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外商在元朝时期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民族的雏形就是部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或部落的蕃商。泉州的清净寺是我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泉州民谣“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式，土楼木楼还有中西合璧”，生动地描叙了泉州历史上中西交流的遗迹。

明朝甫建，郑和七下西洋。这既表明当时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也表明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决心。遗憾的是，这一盛举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趋向保守，并在保守中逐渐僵化自闭。海禁政策是明清两朝对外交流的基本国策。在海禁的旗帜下，中外交流的内容退缩到了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体系中。

而此时的欧洲掀起了发现中国、亲近中国、认识中国的热潮。大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而后又向外传递着来自中国的书信、点滴体会和并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认识。游历中国的人成为了西方社会的名流；西方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到有关中国的大讨论。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的泛中国崇拜的思潮，终于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①

葡萄牙、西班牙扮演了西方文明向东方渗透的急先锋角色。西方借此对中国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发现了与东方贸易的巨

① 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 年第 3 期。

大商机。以贸易为主要内容和动力的中西交流自海上汹涌而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社会，从 16 世纪开始逐步与整个国际社会融合为一体。融合的结果是西方文明取得了强势地位。作为当时西方文明占领全球事业的组成部分，西方最终使中国从属于西方。东亚朝贡体系在西方势力的渗透下不断瓦解。但是击碎中国在东亚体系领导地位的敌人并非西方，而是同文同种的日本。1895 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中国与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实力直到 19 世纪中期都稳居世界首位，相对优势的经济，推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发展。

秦朝的统一为大规模的中外交流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经济交流。秦朝的统一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统一后的中央政府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地区物产通畅交流。在边境地区，在首都和重要商业城市之间，贸易商队开始出现。尽管秦朝也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但是由于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国家外交的需要，私人和政府的贸易行为在整个古代中国都是存在的。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对外贸易。汉武帝时期开拓的“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同样在汉武帝时期，政府主持召开了“盐铁会议”，决定将制盐和制铁行业收为国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对全世界都具有政策示范意义。

经济交流稳步发展到宋朝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被称为“弱宋”的宋王朝积贫积弱，对外丧权辱国，内部却是人文荟萃、经济

昌盛。宋朝的工商业在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极少见的情况。宋代，特别是南宋，由于地理上的因素，也由于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而鼓励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非常发达，特别是海上贸易。广州、明州、泉州都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元朝征服造成的经济动荡很快被抹平。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那些商镇，在遭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各个民族的融合和空前的疆域扩大造就了又一个经济繁盛时期。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来自欧、亚、非诸国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绝地进出京城。同时元朝也继承了宋朝发达的海外贸易。元朝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造就了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瓷器、丝绸、茶叶是出口量最大的三项商品。在肯尼亚出土的元代瓷器证明了元朝同东非国家的贸易。元朝时期的中国是许多国家和商栈的财富源头。

明清时期，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中国国内经济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开始改变波浪式增长的轨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向上曲线型的增长。在古代中国，人口的激增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基础雄厚增长的最好例证。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内战之后；清朝康熙至乾隆时期虽然征战不断，中国社会却依然迎来了康乾盛世，这都表明中国当时堪称四方经济雄主。

中国雄居霸主的古代，中外经贸发展强劲。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有许多闪光点值得突出一提：

中外经贸往来是伴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中国政府重视对中外交通的开拓，维护商路畅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基本形成于公元前后。它东起西汉的首都长安、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张骞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寻找大月氏的，汉朝的军队也是沿着这条线路打败了匈奴，进而派兵远

征葱岭以西的大宛。公元前 60 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绿洲上城邦国家的供应，西行不再是畏途。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铁、凿井、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中西交通的稳固使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古代中国根据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专门的外贸管理和海关机构。从唐朝开始，政府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市舶管理制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宋朝继承了市舶管理制度，并于宋初在京师设“榷易院”，公元 1080 年颁布了《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这部制订于 11 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从其内容来看，堪称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这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①

中国丰富的出产为中外经济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进而扩展到科技、文化领域，是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流走过的基本道路。《史记》、《汉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除了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葵、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唐朝时期，新罗（今朝鲜）和中国的经济交流非常频繁，但是交易范围已经不局限于物品。新罗的特产工艺品以及人参、牛黄等药材大量地流入唐朝，新罗商人则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图书等。在中外经济往来中，茶叶、丝绸、瓷器扮演了主角。其中茶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汉语中“茶”既表示茶叶，也表示茶水。现代

① 朱小英：《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于 http：//www. cqstudy. com/teaching/1867. html。

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两词同音同义，就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而斯里兰卡则在殖民时期广泛引种中国茶树，成为了当今重要的产茶国。

金属货币是古代中国经济往来的主要货币形式。到了近代，中国的白银流通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古代中国始终处于进出口贸易的入超地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纸币早在宋朝就已出现，但中国国内流通货币依然以金属货币为主。对外贸易也是如此。近代中国的金属货币流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美洲大陆，挖掘了大量的金属货币。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发达海洋运输体系便利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金币银币的流通。当时在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印度的果阿、南非、巴西、墨西哥和里斯本之间构成了一张贯穿全球的贸易网络。白银是当时通用的货币。在白银笼罩下，中国的三大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连接着全球的航海线路，推动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欧洲的崛起。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的对外经济贸易稍显逊色。清朝前期严禁寸帆入海；收复台湾后曾一度开放海禁，但又制定出许多限制出海贸易的条例。这让中国的海外贸易伙伴着实头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国再申海禁，禁止与南洋的贸易，沉重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客观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时，葡萄牙原先占领的澳门地区扮演了中外贸易的重要角色。大批商品和商人由海外来到澳门，采购中国沿海商品，或者定制特定的商品。每个月都有船队从珠江口扬帆远行。举个例子：原来中国的瓷器茶具是没有手柄的。但是西方餐具习惯要有手柄。于是中国沿海地区根据葡萄牙的订货要求，烧制了新款式的茶具。这一习惯一直保留至今。景德镇、沙市、武汉甚至更北的客商常年南

下，翻越南岭，前往澳门淘金。澳门对整个内地经济的拉动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内在蓬勃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澳门最繁荣的时期，是西方势力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逐渐落后于西方的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的恶果在鸦片战争时期表现出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夺取了中国的经济主权。中国在接受近代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同时，国内经济也开始近代化。洋务运动兴起又失败；民族工业产生，在艰难中求生存。本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扮演的更多的是被动学习、接受的角色。必须承认，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分工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获得新的更多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地。这一角色的很大部分就由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来承担了。

三

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与经济交流不同，并非古来有之。政治交流是在各国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只有发展出了稳定的政治文明，各国方有政治交流的可能，才能互相进行政治借鉴。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是在帝国政体稳固后，在与其他政权的交往中展开的。

东汉的甘英原本可以获得打通历史上第一次外交往来的外交使节的殊荣。遗憾的是，甘英到了波斯湾口的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说“海水广大”，航路难行，面对波涛汹涌的波斯湾打道回府。安帝永宁元年（公元 120 年），掸国国王遣使来献幻人（魔术师），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献。古大秦即罗马帝国。这是东西方的首次见于史籍的正式政治

交往。

罗马帝国强盛时期曾多次发动对亚洲的征伐。其中有部分士兵流落到西域地区，参与了与汉朝军队的对阵。《汉书》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装备与阵形。战斗的结果是，这群穿锁子甲、摆鱼鳞阵的罗马战士被汉军战胜。这可能是中外政体的首次正面交锋。

古代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贡献是发明了科举制度。科举发端于隋，确立于唐。唐高祖武德四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科举制一直延续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诏谕："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对世界文官制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考试的选择，解决了程序正义问题，更在于它解决了录取背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相当程度上缓慢了官员队伍录取的矛盾，解决了官员素质问题。从朝鲜、日本开始，其他国家纷纷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欧洲各国就是以科举制度为蓝本，创立了现代的文官制度。有的政治史家认为，科举制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政治最大的贡献。

盛唐时期，中国在发明科举制度的同时，还以完备的政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尊崇和学习。还是以朝鲜为例，唐时新罗全方面的接受了唐朝的影响，自我儒化汉化。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并且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从此开始直到古代结束，朝鲜不断加强自己的"儒化情境"，从里到外地仿照中华文明。日本同时期也开始采用中华制度，通过大化改新确立了封建制度，仿照长安的模式建造了京都，确立了班田制，形成了饮茶、吟诗、书法、崇佛的社会氛围。

宋元时期外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科技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二项重大政治贡献。中国先进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起初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政治性的。历史发展

到近代后，中国科技发明的影响转入政治领域，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后，又被利用来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将中世纪的城堡和骑士阶层轰灭殆尽。指南针则是大航海顺利开展的技术基础之一。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①

在元朝，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模糊印象直接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间接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元代对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就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马可·波罗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著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对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15、16 世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封建各国对大财团的依赖加深，重商主义思潮开始兴起，欧洲各地陷于对金属货币尤其是黄金的狂热追求，整个欧洲都为了黄金而不择手段。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恰逢其时，向欧洲社会描述了一个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刺激探险家们纷纷去开辟新航路，驶向那金光闪闪的宝地。

美洲新大陆就是哥伦布 1492 年在东方天堂的吸引下中途发现的，这是人类地理大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哥伦布至死都坚信自己发现的美洲就是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与他一样，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方的"诱惑"。大航海打破了人类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现代意义的全球化从此开始。主观上对黄金和白银的变态追求，使得大航海时代也成为殖

①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格言第 129 条，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民贸易、种族屠杀的时代；而联系沟通全球各地，推行先进制度，动摇封建统治，促进全球的经济生产大合作，是主观邪恶基础上的客观进步结果。总之，16 世纪后的世界历史真正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历史。

岁月推移至明清之时，中国的制度和思想已日臻完善，在西方掀起了中国热潮。西方知识阶层纷纷跻身于研究中国的大潮中，探讨中国因素对西方道德败坏的社会的借鉴作用。理想的中国成为了西方认识社会、改造自身的起点和终点。“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① 这股思潮进而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学者们强调自己的中国色彩，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政客们在言谈中不断点缀中国辞藻，年轻人则向往东方的异国情调，根据有限的资料思考中国的地理物产、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人群和生活方式。

中国热在西方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国本身正在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壮大后，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东方更是从属于西方。关于在中西对比中中国迅速衰落的原因，人们至今争论不休。有些人将中国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劣根性。笔者不认同从玄而又玄的哲学领域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还是在继续发展的，只是十分缓慢，最终落在了迅速崛起的西方的后面。从经济上讲，中国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遇到了实现质变的瓶颈。此外中国人口的剧增和生产对象的限制是主要原因。从政治上说，中央王朝的统治保持

① 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 年第 3 期。

的长期稳定，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异常牢固，限制了异端思想和势力的出现，不破无立。明末清初的短暂动乱时期，中国出现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但是时间太短，启蒙星火过于零星，就在中国徘徊犹豫间，力量的天平倾斜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传统的政治伦理、制度和政府统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进入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同时，国内政治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规则，中外政治交流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频繁的程度。中国在屈辱的近代，从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发展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国将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崭新的政治影响。

四

阖卷深思。在世界历史中，中国是少数几个始终傲步寰球的国家之一。其间中国身影日渐清晰，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一，古代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世界历史添加了鲜活的色彩。汉字、水墨画、建筑规划、宗法家族制度、中央集权、国学与科举、土地赋税制度等都是其中的醒目内容。对于每个区域文明来说，自强自立是参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基础，也是对世界历史的基础贡献。中国极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其次是中国营造出了生命力极强的中华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政治伦理与制度、科举制度、朝贡制度等紧密地将东亚与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连接了起来，尤其是中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塑造了的千古贯一的东亚朝贡体系。这是与欧洲国家体系、阿拉伯国家体系、印加国家体系、印度相对等的国际体系。勤劳奋进的中国先民持续不断地向外移民，最直接地将中国的身影镌刻在东亚、东南亚各地乃至太平洋、印度洋周边地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国形

象的恒久身影，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第三是古代中国为世界历史贡献了琳琅满目的科学技术、文化典籍、贸易商品，搭建了世界各国的交流平台。不论是政治交流还是经贸往来，中国都不止一次地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文明采蜜器、驱动器和扩散机的角色。

第二，中国与西亚、欧洲的交往历史是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的主要内容。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巴比伦——阿拉伯文明发展相对较快，交往内容相对丰富。它们横亘在亚欧大陆之上，构成了世界的主要文明区域。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起到了世界历史发展推动机的作用，是世界文明的两大重心；而巴比伦——阿拉伯文明承东启西，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必须指出的是，中西交流并非中外交流的全部。亚欧大陆也不能代表全球。只是由于地理因素的阻碍（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广袤无垠缺乏岛屿补给的大西洋、终年结冰难以通航的北冰洋），由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区域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对外交流的范围，对外施加影响的范围局限于撒哈拉以北和亚欧大陆；只是由于中国、欧洲等地相对周边地区发展优势的长期存在，这些地区起到了世界历史进步推动机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不单是悠久灿烂的祖国历史是国家发展进步可资利用的资源，一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身影更是宝贵的发展资源。历史上的国家形象、一国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国内历史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情况也是国家现实发展的基础内容，是国家未来进步的经验宝库。华人华侨与唐人街、中国历史上展现的热爱和平、内敛善良的形象，中国与东方地区牢固的友谊和各方面联系，中西文明之间长期的相互羡慕和交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筹划整体发展战略时必须正视、借鉴、思考的内容。

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先逐一梳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身影，突出中国对外交流成绩；再重点介绍中国古代努力营造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主要情况和海上中国的内容；最后是中国在近代逐渐

落后，遭受屈辱，改革求进的历史。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为在唐朝至清初最为繁盛，其国际地位和威望都达到了巅峰。以此为界，远古与先秦两个阶段是中华文明融合初创时期，秦的统一和汉朝的巩固揭开了中外规模交往的序幕。汉至南北朝时期则逐步将中国推向高潮。在漫长的相互影响史中，中国的科举、朝贡体系、海洋文明都值得大书特书。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了另外一面，本书也做了横向和纵向的梳理。笔者非常欢迎读者就书中的观点进行讨论。谢谢大家。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一章 多元发展，中国是世界历史源头之一

越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海洋荒漠和高原对人类交往的限制作用就越大，早期文明的相互影响就越显得薄弱。对于处于摇篮期的各个区域文明来说，这样的限制可能是有益的。文明婴儿只有沿着自己的啼叫声发展，才能最终唱出有特色的声音，发出动听的旋律。而这恰恰是文明相互学习借鉴的基础之一。

第一节　从元谋人到炎黄子孙

人类的产生是历史的起点，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起点。距今约三四百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出现，这也是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起点。

探究人类历史内部的关系，探讨东方帝国对整体历史的影响，必须从历史的起点说起。一方面，那些稚嫩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史前文明是后来文明的原点，隐含着几乎所有后来文明的特征和文明因子。他们就是建筑的根基、瓷器的毛胚和需要百般呵护的名贵花种。只有认识它们，后来人才能更好的理解现代文明；一方面，尽管史前时期人类的相互交往极其微弱，但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类的交往与相互影响是存在的。这就造成了史前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竞争组合，形成了更先进的、地域更大的文明。史前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自然也是我们探讨的题中之义。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人类是起源于同一地区，同一人种，还是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原始人类？同样，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不是各异的？我的基本的观点是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是多点多元的，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趋同演化为各异的区域文明。

有研究表明，原始亚洲人群中具有非洲人种的某些特征。也有研究认为美国的原始印第安人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过去的。这似乎可以认为人类最早产生于非洲，然后自西向东逐渐迁徙和漂泊，扩散到了欧洲、亚洲和美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远古人类的交通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但作为高智能的群居性物种，人类

利用极为漫长的年代跋涉到地球各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①

但同时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受非洲原始人种影响的人群是其中一支。上述的研究成果不能掩盖更多的独立发展起来的人种的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创造了辉煌各异的地域文明。这些古代文明不是在地球上同步出现，而是在某些地区首先出现。这样的文明独立起源，有自己的思路和发展道路。整个人类的某一些地区和某一些群体首先步入了文明的门槛，逐渐扩散。另一些地区和群体则在这些先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影响下进入文明时代。

即使是具体的某一现代文明，它的内部起源也是多点多元的。

就中华文明来说。考古挖掘已经基本证明，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五帝本纪》开始就是黄帝，而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所以我们说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五帝本纪》并列，司马迁还记述了匈奴、东夷、蛮越等其他文化。中华文明就是世界上有独立起源的史前文明中的一个，其内部也是多元起源的。

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猿形祖先。1975—1980年间，在中国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煤场陆续挖掘了一批腊玛古猿化石，距今约800万年。最早跨入“人”的门槛的是直立人，也就是中国学界的“猿人”。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中国境内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就是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左右。此外还有蓝田人、北京人、龙骨洞遗址、金牛山遗址等。之后人类各个进化阶段的化石和遗址都在中国被发现，且数量众多，材料丰富，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这些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中国是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②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但并非是唯一的源地。中国灿烂的东方文明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异常丰

① 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1年。

② 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8—10页。

富，迄今已发现了7000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这些文明源头相互差别又互有联系。“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属于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文化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① 商朝、西周灿烂的文明就是在新石器时期各个区域文明的基础上汇聚熔铸而成的。中国境内的区域文化在不断的融合中，创造了东方千年文明。

每一个文明都得惠于养育自己的大自然。中华文明就幸运地获得了大自然的恩赐。黄河、长江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抚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广阔的原始森林、茂密的草原和出产丰富的近海成了中华始祖驰骋的舞台。蒙古高原、新疆戈壁荒漠、青藏高原和西南山脉险流阻挡了外敌对先祖的袭扰；而冷热适中、气候温顺的内部条件滋长了中华原始人群。东方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注定是一个和平、内敛的农业文明。

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但对原始人类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每一个灿烂的远古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优良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文明的性格。这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将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遗憾的是，现代人无法对中华远古文明了解太多，太深。我们太缺乏史料了。

我们知道，在大约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过着一种人少物丰的氏族生活。在北方温带的草原上，人类采取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北方的考古遗存中，各种类型的用来切割兽肉的刮削器等小型工具是最主要的打制石器。人们多居住在洞穴中，洞中常年燃烧着熊熊烈火。在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密布的南方，人们多以采集捕捞为生。反映在考古遗存方面，就是石器多以大尖状器、大砍砸器为主。南方河流附近植物繁茂、食物资源充足，早期南方人就大多居住在靠近水源的河谷地带，利用河滩的砾石打制石器，采集各种植

① 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6页。

物和捕捞水生生物。不约而同地，南北方都将猎物作为服饰的来源。

人们偶尔也会渔猎一天，却一无所获，或者因为某时段天气恶劣，不适合渔猎，就会陷入缺衣少食的尴尬。细心的原始人已经发现了一些植物的食用价值，并储藏了一些。两相结合，原始农业就萌芽了。在旧石器时代，萌芽期的农业作用微弱，处在依附于渔猎采集经济形态的辅助性地位。

然而农业的明显优势，日益显现出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的原始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史前农业的发展与兴盛大体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粟作农业系统。这是由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祖本的自然资源以及居民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差别综合作用形成的。中国史前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①

在距今一万年前，原始农业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的势头。考古挖掘证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遗址数量激增，分布地域大幅度扩展。已挖掘的稻田及相关的田间配套灌溉遗迹，反映出小型的水田灌溉农业的存在；经过很长时期的人工选育，稻米品种渐趋优良，后期有的粳稻已接近现代粳稻的品质；用麻十分普遍，且在南北方都已人工种麻；家禽饲养开始出现。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出现了养蚕业。猪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猪被大量饲养，人们尽力积存猪下颌骨。猪的数量成为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猪下颌骨成为了一种时尚。

这一时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神农氏兴起的时期。神农氏即炎帝、赤帝，不应该理解为具体个人，而是一个部落和它的首领的指称。炎帝部落发源于西北，后迁移至黄河中游南岸地区。传说中他遍尝百草，教人耕耘，部落逐渐兴盛，建立了以陈为中心的大方

① 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于《学术探索》2005 年第 6 期。

国。中原古称“赤县神州”，意即“赤帝之县”与“神农之州”。

此时发源于关中地区的黄帝部落也开始兴盛，东迁河南，与炎帝部落产生了冲突。阪泉之战后，炎帝战败。黄帝即轩辕，也是对部落及其首领的指称。黄帝部落乘胜东进，在河南新郑建都立国。为了抵御四周方国部落的进攻，黄帝与东迁山东的炎帝部落联合，与以蚩尤为首的部落联军再次决战。涿鹿之战是两个阵营的决战，蚩尤失败，南下成为了现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黄帝和炎帝部落加强联合，最终演化为汉族的祖先。

炎黄祖先的传说发展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公元前 3000 到公元前 2000 年之间。

这一时期的中华原始文化已经进入了全面兴盛、繁荣的阶段。在长期积累、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的初级文明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们对劳动工具进行了改进或创新，突出的有：考古挖掘的良渚文化较普遍使用石犁铧，使开沟一类的农活功效得到提高；太湖地区发展起来了养蚕业，能够织出较高密度的家蚕丝织物绢绸；粟、黍等种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当时人们食谱中小米摄入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明显增加，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出现的小麦，为中华历史增添了一种新的重要粮食作物；[①] 半坡遗址的挖掘成果中出现了疑似汉字起源的彩陶图案；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墓葬文化显示出当地的社会分化已经到达了相当的程度。

在史前时期，原始农业是东西方对比中最可明确的内容。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世界农业起源区域之一，中国为世界贡献了重要作物和农业技术。主要农作物——粟，水稻原生于中国华北地区。中国在华北种植粟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也是水稻的原生地区之一，水稻原生于江淮以南。河姆渡人是世界上最早种稻的人群。

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南北各地出现了近百处原始城市遗址。人们选择河流肥沃之地建筑城址，以方型为主，营造了手工业、商

① 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于《学术探索》2005 年第 6 期。

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城市周围环绕着原始部落，有的还是两三座城市连成的城市群。城市的出现是对史前文明发展的总结。人类文明走到这一步，距离国家形式只有一步之遥了。

史前时期极其漫长，世界文明发展内容纷繁复杂。在简要介绍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脉络后，我们很有必要将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发展做一下比较：

表 1 - 1：夏朝建立前中国与世界文明发展比较

时间	世界总体情况	中国文明	其他文明
距今约三四百万年，人类在地球上出现			
约二三百至一万年前	人类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流行，已使用火，晚期大量使用骨、角器；狩猎和采集业发展；血缘家族及母系氏族公社产生。		
约 170 万年前		元谋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能制造和使用石器，已会用火。	
约 70 到 20 万年前		北京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约 18 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生活在北京人活动过的地区。	
约公元前 8000 至前 2000 年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光加工的石器流行，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		
公元前 6000 年			小亚细亚地区出现亚麻和羊毛织物。

续表

约公元前 5000 年			两河和中亚地区使用冷锻法加工天然铜。古代埃及使用等臂天平秤，为已知最早的衡器
约公元前 5000 至前 4000 年			古代埃及出现以太阳和月亮为规律的日历，为已知最早的日历。
约公元前 5000 至前 3300 年		长江下游河姆渡人处于新石器时代，种植水稻。	
约公元前 4800 至前 4300 年		黄河中游半坡人处于新石器时代，制作了原始陶器。	
公元前 4000 至前 3000 年	人类开始用矿石炼铜，进入金属时代。		
公元前 3500 至前 3100 年			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出现陶轮制陶和塔庙建筑，创造了楔形字。古代埃及国家形成，出现了象形文字。
公元前 3500 至前 3000 年			两河流域居民开始使用轮式运输工具。古代埃及人已在农业中使用
			犁、耙和施肥。
公元前 3372 年			古代南美玛雅年表中最早的日期
公元前 3100 年			上埃及统治者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初步形成统一国家。
公元前 3000 年			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续表

约公元前 3000 年			埃及出现有桨和帆的船。古印度人发明了印章文字。
公元前 3000 至前 2300 年			爱琴海地区克里特文明出现。
约公元前 2700 年		浙江钱山漾留存较为精细的丝织物。	
公元前 2686 至前 2181 年			埃及古王国时期：国家统一完成，君主专制确立，大规模兴建金字塔。
约公元前 27 世纪			两河流域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形成，为迄今已知最早的史诗。
公元前 26 世纪			狮身人面像落成。
约公元前 2500 年		中国出现竹管乐器。	埃及出现玻璃球。古代苏美尔人已使用燃油灯，学会烤制面包和酿制啤酒。欧洲出现编织机。
约公元前 2500 至前 1500 年			西亚古亚述时期。
公元前 25 至前 23 世纪			古巴比伦文明开始绘制地图。
公元前 2371 至前 2154 年			萨尔贡国王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向君主专制过渡。
约公元前 2300 至前 1750 年			古代印度哈拉帕文化时期：出现城市文化，国家形成，已使用文字，使用陶轮制陶。

续表

公元前 2181 至前 2040 年			古埃及统一王国瓦解，贫民奴隶大起义。
约公元前 2113 至前 2096 年			两河流域颁布《乌尔纳姆法典》，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

表 1 - 1 清晰地表明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都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多源发展。这四个地区被人们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必须承认的是，与世界其他史前文明相比，中华史前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最快的。国家形式的出现是检验史前文明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公元前 21 世纪，启建立了夏朝。在国家出现的前后对比中，中国远远落在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后头。中国的文字和政治制度发展也落在了三国的后头。当然，文明的发展只有程度之别，绝没有优劣之分。

与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的文明不仅是独立起源的，还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途径。中国东方文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连绵不绝，没有中断。金字塔之下的居民已经不是制造金字塔的先民的后裔了，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早以灰飞烟灭，伊斯兰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重新塑造、统一了这一地区。哈拉帕文化的城市不断挖掘出来，一再引发争论。现代印度人已经不认识这些当地原始城市，竟疑为天外来客所建。

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被历史湮没的神秘文明：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建筑，英格兰的巨石阵，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巨石遗迹，马耳他神庙……

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是幸运的。让我们一起顺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明确线索，一一探究每个历史时期东方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二节　夏商，辉煌的东方奴隶王国

中国的信史是从夏开始的。夏的创建与大禹传说密切相关。相传夏的始祖鲧和禹曾相继治水。尧命鲧治水，鲧以阻治水。舜摄政后以鲧治水无功，殛鲧予潬渊，复命鲧子禹治水。禹疏导水入海，因功被推为天下共主。大禹治水传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化记忆，更在于其背后蕴涵着的有关东方帝国起源的重大推断。可能正是治水所需要的庞大的人力、物力和组织，催生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统治工具。需求催生制度。有人将治水判定为中国政治文明起源的动因，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治水鞭策了原始人群的凝聚，进而产生了制度和机构，使东方大地上的文明因子演化成了最初的国家形态。

即便如此，夏朝作为一个确切存在的王朝的直接证据非常稀少。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散布着很少的有关夏的记载。《尚书·召诰》载："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大雅·荡》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竹书纪年》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我们可以推断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存在约五百年左右，历十七世而亡。

现代考古文博技术的发展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某些新的证据。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发现了属于同一类型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文化遗物最丰富。二里头遗址有宫殿区、手工业遗址区和墓葬区之分。遗址的中部为宫殿区；北部和

东部发现有烧陶的窑址，南部发现有铸铜的遗迹，北部和东部发现有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很可能是手工业作坊遗址区。在二里头村东南等高地上发现中型墓的分布。二里头青铜礼器——爵的出土也证明了在中华大地上，以礼器为主体的青铜时代的到来。历史学界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依据 C14 测定并校正的年代数据，大致为公元前 2010 年到前 1625 年之间。

这就在地域与年代上，都同文献记载的夏朝国家活动的基本情况相吻合。宫殿基址、墓葬遗址、相当程度的手工业发展和其背后的社会分层，这一切都表明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是可信的。无论从考古资料或文献资料来看，我们将夏代作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亦即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时代是适当的。①

在后人眼中，东方帝国早期文明的概况大致如下：

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在公元前 21 世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夏。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

传说夏部落的首领是治水有功的禹。禹通过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的频繁战争，臣服夷、夏诸族，建立了世袭制的夏王朝。禹死，其子启继承王位。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境内）举行宴会，招待来阳翟朝会的众多邦国首领。这是东方帝国历史上首次大型外交活动，即钧台之享。启死，子孙或奢侈淫乐，或争权夺利，王朝统治力衰落。东夷部落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王权之争，攻入夏都，夺取王位。四十年后，遗腹子少康复国成功，威征四海，中兴夏王朝。孔甲之后，夏又开始衰落，末代君主桀的暴政加速了夏的灭亡。

灭亡夏朝的是商族的杰出领袖汤。汤陆续攻灭葛、韦、顾、昆吾等部落、方国，作《汤誓》伐夏。汤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

① 郝建平：《论中华文明的形成》，载于《阴山学刊》2006 年 4 月。

封丘东），桀大败而逃。此后三千诸侯大会，汤被推为天子，建立商王朝。史载：商立朝，汤鉴于夏代灭亡的经验教训作《汤诰》，又保留夏社，荫封夏的后裔，以宽治民。在他统治期间，政权稳定，国力强盛。东方又出现了一个泱泱大国。

值得后人庆幸的是，商人拥有虔诚而浓厚的宗教观念。这使得商朝给我们留下了比夏朝多得多的历史资料。商代的宗教观念，是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商人从众多的崇拜信仰对象中抽象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与对祖先的祭祀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商人凡事都求神问卜，以定凶吉与行止。商的祭祀活动名目繁多，如伐鼓而祭、舞羽而祭、献酒肉而祭、献黍稷而祭、合历代祖先而祭，并将此五种按次序先后反复进行祭祀，同时还有祭社。

早期文明典型的图景是：巫师狂热而谨慎地从众多整治完成的甲骨中选择平坦耐磨的龟腹甲，将其背面事先凿好的地方放在火上灼烧。龟甲正面出现的“卜”字形裂纹就是判断吉凶的卜兆。占卜后，巫师将所卜之事或结果刻（或写）在甲骨上，形成卜辞。一条完整的卜辞有四部分组成：叙辞（前辞），记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者；命辞，即卜问之事；占辞，视兆而定吉凶；验辞，记占卜后的应验结果。在地底沉睡千百年后，这些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这就是甲骨文。东方帝国正是由此出发，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最渊源流长的文字：汉字。

商代甲骨文主要发现在殷墟地区（今安阳）。安阳者，古称殷、朝歌，殷商之旧都也。在如今河南这片贫瘠的废墟中，商王朝的记忆已经昏睡了 3000 多年。明代，曾任陕西巡抚的诗人龚懋贤流连此地时，殷墟就已经是“千载凄风大白旗，消沉王气草离离。行山独锁殷墟色，淇水空传卫武诗。象箸不陈林肉冷，牛酣何处酒池夷？更怜牧野兴周后，也系东方婺女思！”的景象了。这座荒废之墟在汤汤淇水之滨，野草离离，凄风阵阵，王气消沉，仅仅留下《诗经·淇奥》等远古的绝唱。

2006 年 7 月 13 日，殷墟被正式列为世界遗产。这片新的世界遗产位于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据文献记

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273年。殷墟在甲骨文被发现后不久，于20世纪初期开始挖掘。现在已经建成了宏大的殷墟博物苑。独具一格的苑门，装饰着龙、虎、饕餮、夔和蝉等殷商花纹，古朴庄重。苑内殿宇高耸，廊庑环绕；柱网结构，朱墨雕彩；仿殷石雕，栩栩如生；花木扶疏，松柏苍翠。

这是根据甲骨文的字型和“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等商朝断片记录仿建的，力图营造“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氛围。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将其定位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①]。

起源于河北的商王朝，先后在亳、隞、相、邢、奄等城摇摆不定，最后定于殷，经营出一个东到大海，西到陕西东部，北达河北东部，南至长江的中央王朝，为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文明大国。之前夏的疆域南至江汉北部，东近淮泗。在这一区域内，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发展壮大起来。商较之于夏，疆域北过了易水，西北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南抵长江，成为了早期帝国中的庞然大物。

商王朝把东起泗上（今山东西部泗水流域）、西到河南（今河南伊、洛河流域）的大范围平原地区称作“邦畿”，直接由商王管辖。在邦畿外围，为部族和方国（已归属的部落国家）管辖区：在其东北的有肃慎，滦河下游有孤竹，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境内有鬼方、方、土方，陕西北部有羌方、犬戎、熏育（荤粥），西部有周、氏，西南为巴、蜀，长江中游为濮、楚人，淮河流域为淮夷等等。商王朝自称为“中国”，为四夷环绕。正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我们这个东方帝国日后发展出了完善的世界观体系。在这里，先提醒一下读者诸君。

大约在少康中兴夏朝的时候，西亚大动荡后的赫梯王国也开始复兴。达里亚斯二世应用铁制武器、战车和马武装军队，进攻并毁灭哈尔帕，创立了赫梯帝国。其子孙四出征伐，相继称霸小亚细

① 沙鹤、陈溯等：《殷商：废墟下的帝国》，载于《文明》2006年第3期。

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当赫梯军队到达埃及时，前进的步伐终止了。强大的埃及帝国之前沉浸在图书馆、木乃伊、灌溉、24 个字母符号、日晷和创作小说上。双方签订了和约。停止扩张后的赫梯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公元前 13 世纪末，海上民族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侵，导致帝国于公元前 12 世纪崩溃。公元前 8 世纪始，新兴的亚述帝国成为了西亚的霸主。

世界早期文明的另外两个代表是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和两河流域古的巴比伦文明。前者被视为现代欧洲文明的火种，后者以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及其创立的君主专制和《汉穆拉比法典》闻名于世界。当时的印度还处于早期吠陀时代。与中国早期文明一样，印度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交往稀少。

在各区域文明缺乏直接交流对比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以后人的眼光来思考东方早期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夏和商的制度、经济、文化为东方提供了值得炫耀的历史一页。

我们判定夏为一个完备的王朝，重要的依据是它建立了完善的国家机器，如官僚机构、军队、刑罚等。夏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在建立了由六卿统领的国家统治机构和军队外，修筑城郭以保卫王室贵族，同时制定刑法，修筑监狱，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禹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法。夏代奴隶数量众多，王室贵族正是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强迫他们劳动，而且还任意杀戮。其他各部族敬畏有加，定期向夏王纳贡。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政治制度是我们这个东方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

夏朝继承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农业基础。夏重视水利工程，将之作为农业的基础。夏的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这些简单的设备和原始水利设施，支撑起相当繁荣的农业经济。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陶器中，有较多制作精致的酒器。文献中也多有贵族饮酒成风的记载。这都说明夏代已有剩余的谷物可以用于酿酒。随着农业基础的夯实，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开始出

现。传说桀最宠爱的妃子妹喜好闻裂缯之声，王宫中就有专人为其将缯撕裂，以邀其一笑。在扎实的农业和分工基础上，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盐铁论·错币》记载："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这表明夏代已经出现了货币。

夏的文化以天文历法闻名。《左传》所引《夏书》中的"辰不集于房"，就是记录当时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桀时"夜中星陨如雨"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夏代的历法是传统的干支纪日法。精美的陶器装饰和乐器的出现，也都说明了夏代文化艺术的高水平。

商朝的统治在夏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商王自称余一人、一人，强化绝对王权。商王以下官制分内服、外服，即王畿内与畿外两种地方。军队以师为单位，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整个社会划分为平民和奴隶阶层。平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战事时还被征参加作战；奴隶不仅要从事各种劳役，而且遭到任意杀戮，甚至用以殉葬或祭祀祖先，其数量很大。卜辞中亦有大量杀人祭祀的记载，其中最多一次杀祭者达 500 人。外交上，商王为抵御外族外邦的侵扰，亦为扩大自己的领土，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向征召方国一同征伐外族，成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强大国家。

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即火耕）。工具中出现了青铜农具。除了酿酒业外，园艺、蚕桑业、畜牧业和渔猎亦有发展。商代畜牧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全备。商品经济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商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气势恢弘的都城殷就是商人高度发达的奴隶经济的结晶。

商代的历法是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 365 又 1/4 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 29 或 30 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记

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商代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为 10 日。由于农业、畜牧业以及田猎等活动的需要，对气候的变化特别予以重视。商代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有食、月有食，在日食时并有大星等现象出现，可见对日、月食的观察之精细。商人在数学方面已经采取十进位，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

手工业是商最值得一提的行业。商的手工业分工较细，能产生各种礼器、兵器、陶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青铜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约公元前 13 世纪，中国青铜器到达鼎盛时期。国家博物馆镇国之宝——司母戊鼎就是商人的杰作。司母戊鼎成于晚商，造型庄严雄伟。长方形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四足中空。重达 875 千克。该鼎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代青铜冶铸业具有极高水平。

商朝的普通平民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陶器。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商的贵族喜佩玉。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夏和商远离我们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致于有关它们的述说听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人们陶醉于远古回响的同时，常常忘记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杰作，我们现实生活与思想的点点滴滴都可能源于此，惠于斯。放在世界历史横向大比较的舞台上，夏和商的辉煌丝毫不亚于其他文明的发展程度。它虽然没有对世界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东方帝国那些轰动寰球的事、物与思想无不发端于此。

第三节　殷人东渡和海洋传说

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陆地民族。我们的活动、思考都是在陆地上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海洋传统。遗憾的是中华文明中的海洋因子远远没有被人认识。尤其是明朝开始的闭关锁国，更给人中国闭塞守陆的感觉。

我们返回到中华历史的起点，就会在那里发现辉煌千年的海上历史和一个个湮没在海洋中的未解之谜……

19 世纪 20 年代，世界考古和航海界都在流传一个名词："有段石锛"。考古队在太平洋中人迹罕至的岛屿上发现了许多用坚韧柔软的藤条将石斧固定在把上，可以挥动自如的石器，称为"有段石锛"。这些现代人看来极为幼稚的工具，却是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些石器是原始人类争抢的利器。扩大探险范围后，太平洋诸岛、新西兰、复活节岛及南美的厄瓜多尔等地都挖掘到了"有段石锛"的踪影。①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荒无人烟地方发现的石器主人是谁？

仅仅几年后，1929 年，浙江良渚也考古挖掘出极为相似的"有段石锛"；之后广东海丰和香港南丫岛也相继获得类似的发现。

人们不禁要将这两处破土而出的石器联系起来思考。太平洋和南美洲沿岸发现的石器主人是不是来自中国呢？"观落叶以为舟"、"见朽木浮而为舟"的中国祖先是否远洋出海，将远古文明扩散到

① 王佩云、范春歌、杨剑坤、程薇：《沉没的丝绸之路、破译失落的海洋文明之谜》，载于《文明》2004 年 11 期。

了太平洋和南美等地呢？这样的疑问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有学者在解读，也一直争论不断。

隐含在这些争论背后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自古存在的海洋传统。作为汉族主体的华夏民族就是枕着黄海之滨的涛声成长起来的。早在久远的上古时代，中华先祖就对波涛汹涌的西太平洋充满了遐想。《史记·皇帝本纪》载轩辕皇帝曾“东至于海”。《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反映出我们的先祖对海洋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周易》述说“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于天下”，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利用海洋的理性认识。

从辽东半岛和黄河沿岸到岭南海岸和香港地区都发现了大量能够证明海上交通情形的实物。需要提及的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桨和舟山群岛出土的大量陶器，不仅证实了六七千年前中华祖先就制造出了舟楫，而且表明在 5000 年前的大陆和舟山群岛的波涛之中就存在往返的航线。河姆渡人极有可能将石器制作、人工种稻及海洋捕捞等远古文明传播到海外。

约 7000 年前，宁绍平原居住着越族祖先。他们利用浙北优质的土壤和水热资源，培育种植水稻，形成了闻名海内外的河姆渡文明，被称为河姆渡人。1973 年考古学者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六支用整块木板制成的木桨和一具夹炭黑陶质的独木舟模型。这些凝聚先民们智慧的独木舟立即就成为河姆渡文明的代表之一。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都是用整块硬木为材料加工而成的。木桨柄部粗细适中，可容手握，大多数加工成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逐渐减薄，制作都比较精细，外形和现在江南水乡农村小船上用的木桨基本相近。其中有一支木桨，柄与叶的连结处刻画直线和斜线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既美观又实用。这些河姆渡遗址船桨制作都讲究，桨叶轻薄，在制作上属于比较成熟的类型。

除了在余姚河姆渡，浙江湖州钱山漾、福建连江、广东化州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独木舟或船桨的残骸，时间跨度从 5000

年到 9000 年不等。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当年先民们沧海横渡的场景。简陋的工具配合北太平洋常年的洋流，制造了原始人群远航的奇迹。河姆渡人从钱塘江口附近乘着独木舟或木筏出发，向东偏北行进。大致在北纬 30°左右，存在向东流动的北太平洋暖流。他们可以借助这股力量漂向太平洋的深处，中途经过夏威夷群岛北端，而后直对拉丁美洲墨西哥北部的瓜达卢佩岛附近；河姆渡人也可以先沿着南中国曲折多港湾的海岸到达广东沿海，汇集东南各地的航海部落。在北纬 3°～10°之间潜伏着赤道逆流，向东流动至东经 180°处与南赤道洋流相遇后一分为二。其中一股向南流动，辗转到达南太平洋，与那里的西风漂流汇合向东达到南美的秘鲁。

时间推移到距今 4000 多年前，当时的殷族人还属“九夷”中的“东夷”族人，以擅长航海闻名。他们居住在今东北的西南部和河北省东北部的，臣服于夏朝。据《竹书纪年》记载：禹的八世孙后荒（帝芒）曾“命九夷，狩于海，获大鱼”。很可能就是夏王命令臣服于自己的东夷族人驾舟船为其捕猎鱼类。商都殷墟出土大量的鲸骨、海贝、海龟壳、象牙、蚌壳等产于我国南海、东海或南洋一带的海洋物产，证明殷人受命入海捕大鱼的记载应该是事实。[①] 我们凭此也可以认定，当时我国北方海域已经存在着众多海上航路，至少渤海之内，已经可以畅通了。

夏朝中后期开始，殷族开始壮大扩张，开始越渤海南下，至山东半岛，再进入河北、陕西一带，最后代夏而立商。商朝以夷族入主中原，仍然保留有航海探险的传统，与“海外”有过相当频繁的往来（所谓“海外”，专家们认为是今渤海以东的海上诸岛屿，也有的认为可能是朝鲜半岛），航路与航线也逐渐从北向南扩展。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记载有商纣王征讨胶东半岛的人方国时，曾两渡淮水至齐国，然后沿海南下，四处征战。

到了商末，善于航海的殷人受到了西边的周人的进攻。牧野一

① 王佩云、范春歌、杨剑坤、程薇：《沉没的丝绸之路、破译失落的海洋文明之谜》。

战决定了周代商立。不知道细心的读者有没有发现：牧野一战中，临阵倒戈的是商朝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当时商朝的军队主力正在山东地区征战，实力保存完好。西周立朝后，那支数十万的精锐之师，自始至终没有与武王的军队进行过一次战斗，甚至没有出现过便仿佛从人间蒸发了。

殷人的青壮年主力哪里去了呢？

史载：殷商帝辛（即纣王）三十二年，公元前 1047 年，周武王于孟津准备伐商。纣王急召贵族微子、箕子及攸侯喜（攸，同条，地名，侯是爵位，喜是人名）等出兵勤王。当时攸侯喜正统帅商军主力十余万精锐及林方、人方、虎方等部落的 15 万人，与东夷交战。第二年，奉诏的喜正在回师勤王途中，得知 70 万奴隶于牧野阵前倒戈，商军大败，周军入朝歌，帝辛登鹿台自焚。

商亡。许多殷商的贵族和百姓不服周朝统治，举家迁移。比如同奉诏书勤王的贵族箕子就带领一部分殷族遗民逃亡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朝鲜。而统帅殷军主力的攸侯喜及其军队却突然下落不明，成为殷商历史的千古疑案……

1922 年，中华民国第一任驻智利公使欧阳庚上任。欧阳庚祖籍中山张家边大岭村，当时已经 64 岁了。每一位那样的老人都有浓厚的乡愁，盼望落叶归根。欧阳庚也不例外。

一天，欧阳庚惊奇地发现公使馆的马车房后面有三亩涕竹。这是他的家乡稀有的植物群，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少数地区。涕竹截其二节，剖为两半，即可以为舟。甲骨文“舟”字即是一段剖开的竹子。（当代人已经看不到涕竹了，它在中国本土已经绝迹，只生长在美洲。）

欧阳庚便询问印第安仆人，这些涕竹是从哪里来的？

仆人说，涕竹是印第安人的祖传外伤药，是“Hosi”王三千年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带来的，现在印加的医师用涕竹治外伤，还用针灸治疗内科百病等等。

《神异经》记载涕竹确可治疗外伤，是中药偏方。而针灸治疗是盘庚避水迁都之时发明的。这些印第安人又如何知道？“Hosi”

的发音极其接近中文的“侯喜”，会不会就是殷末征东夷的攸侯喜呢？

循着欧阳庚的发现，我们再深挖下去，会发现一系列的“巧合”。

就在西周建立不久，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突然兴起了一种带有明显亚洲特征的奥尔梅克文化。这是美洲大陆上第一个主要的文明形态。

同样，公元前 1200 年已居住在墨西哥海湾沿岸的丛林中的奥尔梅克人是一个谜一样的民族。让世界历史学界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之前缺乏文明证据的美洲大陆，会突然凭空出现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民族。奥尔梅克人建立了宏伟的宫殿，规划了宗教中心，始创了美洲最初的龙、凤和虎的崇拜物，制造了翡翠和玄武岩玉石雕塑，发明了最初的文字，而且其扩张影响力遍布整个中美洲。许多西方学者意识到了奥尔梅克文明的突发性出现，倾向认为它是外部文明介入的产物。①

更令中国人兴趣盎然的是：奥尔梅克遗址祭祀中心的地下出土了 16 尊翡翠雕像。这些雕像人的面孔形似中国人，且头颅系人工改型的高长头。这种高长头正是殷商所崇尚的习俗。这 16 尊雕像的其中十五座黑色玉雕呈同心圆排列，面向一红色玉雕像。红色玉雕像后立着六块玉圭板，圭板上刻有类似商殷甲骨文和金文的字迹。现在已经证实，这些玉圭板上刻的正是殷人先祖和商朝诸王的名号。对奥尔梅克文字的研究表明。这些阴文契刻的刻写方法与殷商甲骨文相同。他们的线型方块字，自上而下书写，与殷商结构方式和书写习惯相同。

在墨西哥各地的后续考古挖掘，发现了大批与我国商代风格酷似的墓碑、雕塑、石刀、壁画等。尤其是在墨西哥发现的青铜像、蒙古式的眼睛、中国式的辫子和华夏式的帽子，几乎与古代中国人一模一样。

---

① 施征：《失踪的商纣王军队》，载于《科学 24 小时》2002 年 10 月。

现存的美洲印第安人和华人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智利等地的印第安人称小孩子为“娃娃”，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你、我、他”为“宁、内、依”，称“河流”为“河”，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把船称为“赛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阿拉斯加留着垂髻的因纽特男孩，也与华北小儿毫无不同。

非常自然的，很多人，包括国内外历史学家，都推断那支消失的殷军和部分遗民到达了美洲，推动发展出了印第安文明。

那是一幕非常悲壮的历史画面：国亡，山东半岛的殷商大军和殷民，前无去路，周军逼近，前途渺茫。成千上万的人最后退缩到了沿海的某个地方。终于，统帅攸侯喜下定决心，说：“我们出海吧，去那不知名的远方！”

根据殷人航海传统推测，这批殷人极有可能在渤海、黄海以东的某个岛屿上出发，砍涕竹做舟做药。他们的目的地可能也和箕子一样是辽东、朝鲜或者日本列岛，也有可能就是遥远的美洲。但等军民放舟入海后，遇到了长年东流的黑潮暖流和太平洋暖流，不自觉地漂航到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再沿着南下的洋流漂向美洲大陆，最后有一批幸存者到达美洲中部的墨西哥。他们或许生存下来了，并创造了与本土文化极相似的新的文明。

的确，在美洲大陆，尤其在墨西哥，有许多与我国古代，特别是与商代风格酷似的墓碑、祭坛、雕塑、石器、文字、图腾崇拜、器物、纹饰及相类似的风俗习惯等。在许多相似或相同的遗存物与习惯面前，人们仍然无法肯定，更无法否定殷人东渡美洲的种种推测。

但有一点是所有学者都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殷人是擅长航海的民族，发展出了中国古代高度的航海文明。中华民族自从幼年开始，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章 引领潮头，迈向成熟的中华帝国

从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末是中国的周朝和秦朝时期。在漫长的 800 年里，中华民族继承了夏商先民奠定的文明基础，继续引领世界各区域文明发展的潮头。西周的封建王朝到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质疑和动摇，最终在秦朝转化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一国家。古代社会开始定型。其间零星模糊的中外交往随着秦的统一正式汇聚成大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第一节　西周，最初的封建王朝

周人发源于渭水流域，是后稷的后裔。周人几经迁徙，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开始以周为国名，臣属于商。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就是周文王。周文王统一渭水流域，迁都于丰邑（今陕西沣水西岸），日益强盛。继位的太子发，也就是周武王，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作誓声讨商纣王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周朝建立，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 11 代，12 王。

西周分殷商故地为三国，由纣王的儿子武庚、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周武王死后，武庚、管叔、蔡叔曾联合反叛，被消灭。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的隐患，周朝召集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东都洛邑；迁反对周朝的殷商顽民于此，加以控制。

于是，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关中的镐京被称为“宗周”；东都王城被称为“成周”。周公为了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将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共 71 国：封投降的商贵族微子启于商朝故都宋，称为宋公，保持商人的宗祀；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周公长子伯禽前往受封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赐以殷民六族和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师尚父受封薄姑故地，在营丘建立齐国，有征伐特权；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防御群翟；封召公奭于蓟（今北京西南），建立燕国，控制燕山南北和辽

西一带的戎翟部落。鲁、卫、宋、晋、齐、燕都是周朝分封的最重要诸侯国。

在南方，为了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还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在大江下游的江东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

周初71国中姬姓之国共有53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这些封国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周王赐以诸侯土地山川和人民，同时分予宝器，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而从土地看，公、侯均方圆百里，伯70里，子、男均50里，实际是三个等级。至于土地不足50里的，则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全国大小诸侯均向周王负担一定义务，服从周王的命令，要向周王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周王作战。

分封制的社会基础是宗法制。嫡长子为继承人，其他各子即为别子。别子必须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新家族系统的始祖，不再改变，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都是庶子，称为小宗。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到了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整个社会井然有序。比如在军队中，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在军队中服杂役。这套制度为古代中国社会严格继承。

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周王所有，周王将国有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臣下只有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或自由买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耕地阡陌纵横，很似“井”字形。“井”字分成九块田，周围八田分由八家耕种，为私田；中央一田则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

田。奴隶主利用井田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

西周的这套制度被统称为“封建”。西周的封建制度是与宗法、分封、井田等相互关联的统一体。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封建（比如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的意义不同。原始的封建包含的主要特征是权利与义务的密切关联。在政治上，周王将土地、政权和军队分割封给诸侯。诸侯在享有极大政治自主权的同时要对周王承担政治军事义务。周王要在文化、军事和政治上保持权威，给诸侯提供典范和保护。如果周王违背了封建制度下的规范和制度，诸侯有权反抗，直至恢复相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经济上，土地被一级级地分割下去，同样需要执行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原始的封建制度下，没有一方的权利是绝对的。

中国的封建制度只存在先秦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于天下，封建制在中国便走向了终结。之后虽然在一些朝代开国时，也曾出现过分邦建国的情况。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了古代中国的固定政制。“秦以后的封建，则是‘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封而不建’的局面。并且，秦以后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封建制只是微不足道的末流小节。可以确切地说，秦之后不能称之为封建制，本来意义的封建制在秦王朝就终结了。”①

这样的封建制度在西方古代社会存在的时间比中国要长得多。尤其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制度实行的典型地区。当时的封建制度建立在贵族分权和独立基础之上。君主和封建领主之间存在明确的契约。不论哪一方违背契约，都会遭到其他各方的反对。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神圣罗马帝国的实践都体现了这一套封建制度的运作。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中出现的庄园主其实都是封建领主。

西周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基本相同。而我们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比如汉、唐、明、清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尽管当时在经济上，农民阶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类似于封

① 叶剑锋：《“封建”的语义学考析》，载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建制度下的人际关系。但地主阶级拥有的绝对优势是封建制度所没有的。而在政治上，我们却不能说那时的中国政治依然是封建政治。“最早使用 feudalism 一词的是法国人鲍廉·维里亚和孟德斯鸠，他们主要用之指称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法律制度。后世欧洲学者大致上承袭了这一用法，用它来描述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这样的理解已经成为了世界通义。

近代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封建论，建议放弃“封建”的原意，而指代一种社会形态，从而最终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为封建社会。虽然笔者倾向于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称为“传统社会”，但在本书的写作中，依然混用封建社会和传统社会。

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延续封建制度呢？封建制度的产生与存在需要特定的背景。那就是动乱的背景。因为战乱，力量分散，才容易产生以分权和自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哪一方都不能建立绝对的势力优势。而中国自秦朝开始，统一的国家开始形成，已不再存在动乱的封建背景。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文明的早期，在文明的孕育期，都很容易出现封建制度。

中华文明发展之快之辉煌，使得中国的封建制度产生得比较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周时期，中国与世界分别发生了什么？

表 2 - 1：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771 年的中国与世界

时间	中国	世界
约公元前 11 世纪	周武王伐商纣，西周建立。	古希腊荷马时代，史诗时代。
公元前 1000 年 ~ 前 600 年		古印度后吠陀时期。雅利安人国家开始形成，婆罗门教流传。
公元前 10 世纪 ~ 前 612 年		古代西亚新亚述帝国时期
公元前 841 年	国人暴动；召公周公行政，号曰共和。中国历史准确年代自此开始。	

公元前 9 世纪末		古希腊斯巴达国家形成。
公元前 8 世纪		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形成，传为荷马所作；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羊皮制成的书籍。
公元前 776 年	中国史载世界上最早的日蚀记录。	古希腊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亚召开。
公元前 771 年	犬戎攻周，杀周幽王于骊山，西周亡	

由表 2 - 1 我们可以清楚发现，西周封建制度逐渐发展到鼎盛的时候，世界其他地区不是处于史诗时代，就是在国家的形成时期。从政治发展上来看，中国明显发展得比其他地区要早、成熟。

西周不久就进入了巩固时期。传说周公制作礼乐制度，规范了周王朝的制度。成康时期，周朝达到鼎盛。康王死后，周昭王继位。昭王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直至江汉地区，最后身死军没，使周朝蒙受前所未有的挫折。继昭王而立的周穆王好大喜功，致使朝政松弛。之后周朝实力削弱。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中国的局面。周厉王在位期间，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而厉王又垄断社会财富，压制国人的不满，结果造成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终于酿成国人起义。公元前 841 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于彘。朝中由召公、周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共和十四年，周厉王死于彘，周宣王即位。周宣王在位共 46 年，励精图治，朝政有所起色，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公元前 781 年，周幽王宫继位，社会动荡，朝政腐败，西周统治内外交困。诸侯常常不来朝贡。幽王宠幸褒姒，改立太子。废太子宜臼逃奔申国，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公元前 771

年，幽王死，西周覆亡。宜臼迁都洛邑，为东周平王。

与夏、商不同的是，西周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了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在制度、文化、经济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制度上，封建制度、《周礼》和西周《九刑》都是典型。其中《周礼》备受后世推崇。《周礼》非常繁缛，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祇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乐官管理。

农业是西周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周人已种植黍、稷、稻、麻、大豆、小豆、麦、粱、瓜，基本具备了现代所有的农作物种类。在农技上，人们已采用休耕制。西周的工匠多在官府手工业中工作，商贾也从属于官府，身份低微。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城邑内外展开民间贸易，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西周使用贝币，单位为朋。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西周的文化和思想观念较商代已有较大发展，教育制度更加完备，自然科学得到深入发展。

西周的文化依然存于宗教之中，但之前尚鬼的色彩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祇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有各种宗教官员：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卦辞、爻辞中透露了大量周人历史的内容。《周易》、《尚书》、《诗经》中的重要篇目也都成书于西周。随着西周末期的战乱，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

西周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

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①] 教育的确立和普及极大推动了科技文化知识的发展。西周时，天文学家观测恒星，确定了传统的二十八宿体系。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这是古代天文学的一大进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明确记载了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日食，并涉及其前半个月的一次月食。地理知识也有发展。《周礼》载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成王在选定洛邑城址时，也事先绘制了地图。

西周青铜器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综合体。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这副作品不仅是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证明了西周冶金事业的高超，更是研究西周社会和政治的精品。

① 技艺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等“六艺”。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二节　春秋战国，东西方智慧对话

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中国就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前后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时期。

春秋战争是中华民族先民遭遇的第一个大乱世。诸侯征伐不断，民族融合加快，加上社会结构剧烈更替，催生出了一个思想火花四溢、人才辈出的时代，造就了一个宗法血缘纽带弱化、图强争霸、孕育统一的时代。

春秋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当时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东西南北还有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周王室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诸侯国不再按约向天子述职和纳贡。东周国已与一般小国无别。春秋的故事最乱，也最具有可读性，到处闪耀着智慧的火光。整部春秋史可以被看作是战乱争霸史。

最先称霸的是齐桓公。齐国先拉拢宋、鲁、郑等国，又利用当时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激烈，出兵救邢存卫，在中原国家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齐的崛起威胁到楚的利益。两国在河南地区展开了激战，形成了均势。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周天子也派人参加，正式代天子成为诸侯的主宰。桓公亡，齐霸中衰。晋文公利用周王室内乱、周襄王避难郑国的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文公通过兴兵勤王，拓土增威。公元前632年，晋在城濮大败楚国。冬，晋文公大会诸侯于温，迫使周王赴会，成为中原新霸。晋国的霸业得到了秦国的军力支持。晋文公

死后，秦晋交战。秦穆公不断与晋较量，但晋始终堵住秦东向的通道。秦国难以进入中原，只好向西拓土以自强。南方的楚国终于在楚庄王时期如愿问鼎中原。公元前 606 年，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周郊，派人向周王询问九鼎之轻重。公元前 598 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降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结果晋被楚打败。后来楚围宋达九月之久，晋国不敢出兵援宋。宋、郑等中原大国都屈服，共推楚庄王为新霸主。

此后的春秋，北晋南楚形成相持形势。齐顷公时，齐和楚连结，不断用兵鲁、卫。公元前 589 年，晋应鲁、卫之请攻齐，于鞍打败齐军。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在蜀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 10 国。公元前 576 年，楚对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转服于楚为借口伐郑，楚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国战败退兵。此后晋、楚继续酣战，同时走向衰落。公元前 546 年，宋国向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 14 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规定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会后几十年中，晋楚两强力量近于平衡。中原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春秋晚期吴崛起于东南。晋扶植吴以制楚。公元前 506 年，吴大举攻楚，胜楚军于柏举，大军攻入楚的郢都。楚王出逃，楚国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大败越于夫椒，乘胜而攻入越都。之后吴国进逼中原，臣服鲁、邾等国，击败齐国。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但吴连年兴兵，国力空虚。被卧薪尝胆的勾践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公元前 473 年，越灭吴，夺得霸主地位。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各国君主权力下替。主宰国家命运的公卿大夫争权夺利，相互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比如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属于异姓贵族的有鲍氏和田氏。后田氏代替姜氏统治齐国。春秋末年，晋国干脆被赵、韩、魏三大臣瓜分。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

三国。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的正式开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初年，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合称战国七雄。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战国时战役短者数月，长者旷日持久数年。各国继续力量，修筑城墙，革新武器装备。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政治形势的日益严峻，各国为顺应经济变化，开始变法革新。维新变法贯穿了整部战国史。

魏国进行变法最早。魏文侯任用士人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楚悼王时，吴起奔楚，进行变法。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开始强盛。但一年后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战国初年，田氏篡齐君位。齐威王时，齐最强于诸侯。韩昭侯时，申不害在疆域最小的韩国修术行道，也进行政治革新。各国变法最为成功的是秦国。战国初年，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奠定了基础。

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改革、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等变法，成效不一。但强烈冲击了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变法使国富兵强，改变了社会格局，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衡和竞争，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秦在惠文王时开始称王，并不断攻打韩、魏、楚，以扩大秦的疆域。而当时东方六国依然相互征战不断，在连横合纵之间首鼠两端。到昭王时，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秦庄襄王灭周，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政，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为了让读者对这一段复杂动荡的时期有相对清晰的认识。没有经历过乱世的人是不会体会到三代社会到此时候产生的深刻变化。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再是固定的，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有人依靠军事、政治、

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成为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还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士农工商”，即后世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雇佣劳动时有出见。春秋末年，孔子开创私学教育，向出身低贱的阶层普及教育，从此出现了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以从事政治活动为目标的文士集团，更为后世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多数国家主要从平民中破格提拔人才。申不害、范雎等都是出身贫贱的宰相。秦的强大与其不问出身、广揽天下英才不无关系。

这是一段与唐宋之后趋向保守内敛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难得的政治大乱世和思想大盛世。伟人层出不穷，思想璀璨夺目。战国时学失于官，士散于野。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招贤养士之风盛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各国君主和社会都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末年刘歆把战国百家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这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外，后人将其他九家政治学派称为九流。每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各家皆有所长，学以致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世一直惊叹于春秋战争的精神力量之强。有人认为：“强烈的主体意识、自由思考的百家争鸣、开拓进取的变法改革、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构成战国精神的主体。战国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①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不是自闭保守的人，也不是迷信愚昧的人。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悝、吴起、商鞅、赵胜、魏无忌、黄歇、田文、孙膑、乐毅、田单、苏秦、张仪、公孙衍等无不积极进取，奋力建功。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畏败北杀头，四方奔走，

① 张彦修、李文颖：《战国精神简论》，载于《殷都学刊》1999 年。

大声疾呼，大胆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的王道和仁政、墨子的兼爱和尚贤、道家的清静和无为、荀子的礼治、韩非子的法、术、势，无不是针对时势需要而提出的富国王天下方略。各家之说未必尽善尽美，但百家争鸣所体现的自由思考的内涵和人们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的风发意气着实令人振奋。而以提一匕首而入不测之强秦的荆轲为代表的包括专诸、聂政、要离、田光、樊于期、高渐离等人在内的侠客群体，也都在这个雄壮的时代留下了自己的豪言壮举。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章典籍和脍炙人口的千秋故事。

而这些都是由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拘谨陈闷、盲目自满的氛围所不能比的。

在中外对比方面，我们与文明程度发展相对较高的地中海沿岸诸国做对比，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继续领先于世界文明的平均发展程度，并且逐步拉大了这一距离；而在思想活跃和经济发展方面，中外在此时又存在相当大的可比内容。

首先，在政治上，中国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战乱中孕育着统一的因子。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向传统社会转型。

郡县制开始出现，代替了封建制。各诸侯国一般将地方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在县以下有乡、里。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与过去相比大为加强。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往往设郡以统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地方守、令由国君亲自任免。分邦建国到战国时期虽然依然存在，但受封者仅有一定的治民权，且很难长期世袭。一系列新政治制度表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将相制、郡县制、俸禄制、玺符制、上计制等制度的宗旨只有一个—取消封建贵族的特权，使独立的贵族变成听命于君主的官员，把原来通过分封赋予贵族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个人手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使早期的封建小国形成了以五霸七雄为代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领土国家。中央集权是适应这种变化的。

“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发生的变化是一个从封建王国转变为专制帝国的过程。”①

同时代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则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还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度，政治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权力制约。在欧洲大部分先民的思维中，专制是坏的，是需要避免的（柏拉图等少数人除外。但柏拉图也给理想的专制君主增加了一系列限制语）。一般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而且古希腊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古罗马即使稍大，也难以与中国比较。这可以被视作地中海国家没有选择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地理因素。

第二，古希腊和春秋战争时期的中国都出现了人文荟萃、百家争鸣的时期。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城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希腊各城邦和爱琴海地区的人才会聚雅典城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间。有来自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亚学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学术中心之一。他们连同古希腊本地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和命题都进行了探讨。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是次要的，但是他们所体现的思维的缜密性和对理性的推崇一直为西方所继承。

对比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思想火花，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思想尽管在同一时期达到了高峰，但不尽相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文化涉及的领域虽多，但零散个别、不成系统。这些知识和认识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古希腊的科学文化知识则更多地表现出大胆的探索性和思辨性。古希腊人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当时社

① 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载于《史学月刊》2001 年第 3 期。

会生产水平下人类思维所能到达的深度，并且构建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这些成系统的理论至今仍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严谨复杂的思维推演锻炼出了古西方学者的抽象思维。这与注重形象思维和实用性的东方思维是背道而驰的。古希腊学者认为“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因此不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认识，非常重视对事物本质和原理的研究。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和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呼唤将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都定位为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春秋战国发展天文学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而不是探索太空、思考时间和空间的起源；又比如春秋战国发展冶金业和化学工业不是为了认识物质和自然，更多的是为了改良武器装备和生产工具。

第三，当时的中西方社会的开放程度都相当高。活跃的思维和文化交流就是有力证据之一。古希腊也好，古罗马也好，春秋战国也好，都非常注重与周边政权和民族的交流，对外经济贸易都非常繁盛。

随着商业的发达，中原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市。如临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国雍城东北部设有很大的露天市场。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官吏，负责收税和维持秩序。“小的县和邑也大都设置了供商品交换的‘市’，韩上党地区，其中17邑有市，魏国小县有市的30余。齐国曾规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达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们征收黄金一锰，占用场地每6方步收租金（钱）1斗。”① 大城邑中还开设了不少手工作坊，使不少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发展。如齐国临淄的人口多达30余万。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商业渠道，促进了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各政权、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往来。而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腓尼基的船长和水手、古希腊的商品和船队和古罗马的殖民者将地中海沿岸连成

① 解光云：《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载于《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1月。

了一个整体。整个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市场。

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东征推动的希腊化时代，原本可以展开中西规模交往的序幕。遗憾的是，这位已经到达门口的客人还是没有迈入东方天地。**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三节　秦帝国，世界史上的东方呐喊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帝国。秦帝国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

尽管秦帝国自建国至子婴亡国，前后仅历时 15 年。但却是中国历史上至为关键的时期。秦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纷争，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与政治遗产，开始了中国集权专制的传统社会。一方面，秦实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秦始皇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推行的巩固统一的措施，为之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所效仿。同时，秦朝暴虐推行的统一政策整合了国家资源，使中国开始成为巩固强大的国家。巩固、强大的国家行为体是世界历史上文明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主体。先秦时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零散、微弱的；秦朝的统一开启了中外成规模交流活动的序幕。直到汉朝，统一集权的国家形式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常态，我们的民族也被赋予了当今的名字，中外交往的序幕才彻底展开。

公元前 221 年，秦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就展开了封建与集权的争论。李斯主张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秦朝陆续设立了 40 余郡，直属于中央管辖。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对集权和专制制度进行了细化，建成一套适应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在独裁的君主下设立分权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再下设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早在秦献公时期，秦国就

建立了“户籍相伍”制度。秦始皇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成为古代中国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制定了全境通行的严刑峻法，统一全国的道路（驰道）、文字（小篆）、货币（圆形方孔铜钱）和度量衡，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以铜虎符发兵，由皇帝与领兵者分掌，控制兵权。为了防止封建割据和民众反抗，秦始皇也采取了许多为人诟病的暴政：焚书坑儒，强迁六国富豪，没收天下兵器等等。秦代的急政完全逆转了春秋战国时期复古封建的思潮，强力推行了国家统一，也激化了矛盾，造成了王朝自身倾覆的条件。

秦朝的疆域奠定了古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成为了汉族生息的核心区域。秦始皇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土。统一后，秦始皇派蒙恬率军抗击匈奴。蒙恬于公元前215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第二年进一步斥逐匈奴。秦还把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修复并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万里长城，用来保护北方农业区域。公元前223年，秦军灭楚后继续南进，夺取越人土地，置会稽郡；跨越南岭占领珠江流域，设立象、桂林、南海三郡。在广袤的领土上，咸阳、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南阳等点缀其上。志得意满的秦始皇多次巡游天下，炫耀功绩，终于死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秦二世继位后，秦帝国很快瓦解。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尽管刚刚作为强盛的国家行为体开始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秦朝有两件大事还是值得大书特书：修建长城和徐福东渡。

修建长城的直接原因是抵御匈奴民族的南侵。因为气候原因，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的生存物资是难以保证的；而南方富裕的农业地区对匈奴民族存在强烈的吸引力。加上在军事能力上优势，匈奴从战国时期就经常南侵中原。战国时期北方的秦国、赵国和燕国都开始修筑长城，用来防御匈奴入侵。蒙恬共用了9年的时间才把它们全部连接起来，全长5000多公里，成为了当代中国的标志性建筑。

长城不应该被简单看作是防御工事。它更多的是两个不同社会

形态的分界线。匈奴的游牧文明和汉族的农业文明被长城所隔断。农业发展需要安定的环境，长城满足了这个愿望。但是修筑长城的行为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和平和消极防御的心态在后世起到了既喜又忧的历史作用。祖先的长城让汉族核心地区的人们习惯于和平安定的农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是创新精神和奋进心态略显不足。创新和交流恰恰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秦朝对匈奴威胁的处理一直影响着古代中国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尽管后世增加了怀柔等手段和技巧，但始终没有认识到交流胜于隔离。

在新朝大致安定后，秦始皇开始将目光投向浩瀚的东海。胸中的勃勃壮志使他不满足于对海洋的模糊认识。恰好齐地的方士徐福的求见，开始了轰动世界的东渡。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琅琊，徐福再次来见秦始皇，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第二次派徐福出海，并配备了强弩射手，亲自督战。“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徐福入海求仙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汉书·伍被传》也记载了此事：“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

《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正史中最有权威性的史学名著。《史记·秦始皇本纪》直接取材于秦代国家档案；伍被是徐福的下

一辈人。伍被父辈对徐福东渡的大事当有所闻，他所说的很有可能来自父辈的传说。因此，徐福东渡一事是真实存在的。表面上看，徐福东渡的原因是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也有人认为徐福是带童男童女们逃避秦朝暴政。往深层次上看，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摆在了统一王朝的面前。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不可能不带有探索世界的目的，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对未知地区世界的认识，也将统一的强大王朝呈现在了世界面前。

徐福一行到达了哪里？世界历史研究主流认为徐福一行最终到达了日本列岛。最早明确提出徐福到达日本的，是中国后周的义楚和尚。《义楚六帖·城廓·日本》载："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义楚说这是日本弘顺和尚告诉他的。之后宋代欧阳修、元代吴莱等都有类似的明确说法。现在学者大都认同此说。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①

日本保留有大量与徐福有关的遗址遗迹，就是最好的证据。据台湾学者彭双松先生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 50 余处，登陆点 20 余处，传说故事 30 余个。例如日本新宫市还保留着徐福和他的随员七人墓、徐福祠等遗迹，每年八月该市都要举行大祭仪式。这些遗迹与传说虽不全是真实的，但也与史实有所关联。

在公元前 200 年前后，日本由渔猎经济的绳纹时代转变为农耕经济的弥生时代。之前日本处于文化、生产技术等相当落后的原始公社末期，尚未有古代日本国。此后水稻、蚕桑、药物等种植得到了推广，日本的经济文化得到了突然的巨大发展。日本很快由新石器时代跃入铜铁器时代。考古表明这个时期稻作农耕、环壕聚落、金属器的出现，都与大陆文化息息相关，这是由于长期的移民活动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一般认为这是徐福一行到达日本传播的结果，

① 也有很多学者怀疑徐福到日本一说，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产生于 10 世纪左右的日本，随着中日交流的频繁，徐福的传说传入日本，于是以讹传讹。

是他们数千人将秦朝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术与习俗文化引进日本。日本民间尊称徐福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乞雨神、温泉神、纺织神等等。长期以来徐福传说已与神道教相结合，流传相当广泛。

凡有徐福传说的日本地方，当地人都相信徐福到过他们的地区，建徐福庙、徐福墓，拜祭徐福，并积极寻找遗迹。同类遗迹往往重复地见于多处地点，并且长期以来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不少的人还以徐福的后裔自居。近年来，日本的徐福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认为徐福当年所到的“平原广泽”就是日本；日本皇室人员也不无骄傲做地称，徐福是日本人的祖先。日本裕仁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给“香港徐福会”的贺词中宣称：“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徐福东渡，不管是真的到了日本，或是被波涛汹涌的东海所吞噬，其积极探索的冒险精神和勇敢顽强的品质体现了新兴统一王朝对外交往的萌动。中华帝国与海洋的不解之缘由此开始，发展出了内容丰富的海上中国。第六章将会有详细的叙述。

秦的历史实在太短，呈现给我们的身影实在不多。但强大的秦朝给之后的传统中国定了型，向世界历史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从人类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到秦朝统一，世界早期历史上的中国身影是零星模糊的。但是国势初定，文明已成，世界舞台上中国剧目的序幕刚刚展开。

第三章 独领风骚，从容登上巅峰的东方帝国

西汉至南北朝的千年时间里，中国在不断成长，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身影也成规模的增多，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痕迹。这一阶段前期的汉朝，中国呈现出恢弘的盛世气象，中外交流广泛，中国在东亚初步营造了稳固的国际体系；后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战乱不断，但是中外交流还是在艰难中持续。不论是中外交通的拓展、国际体系的草创、商品的交换还是宗教的传播，这一个千年的历史逐渐将古代中国推上了世界地位和影响力的巅峰。

第一节　西汉，盛世中国的身影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一个盛世王朝。汉时，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身影骤然增多。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与疆域拓展、丝绸之路、匈奴西迁等内外呼应，构成了统一帝国给予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惊喜。

西汉初期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汉高祖把六国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10 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以抑制他们的分裂活动；铲除除长沙王以外的异姓诸侯王，在异姓王旧地上陆续分封同姓诸侯王。文景两帝时期，西汉逐渐走向强盛。“七国之乱”平定以后，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汉武帝统治的 50 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为加强皇权，汉武帝削弱王国势力，设置刺史强干弱枝，削弱丞相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后，国家积弊已深，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剧烈。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公元 8 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进行了越来越激化矛盾的“托古改制”。赤眉、绿林起义最终埋葬了西汉王朝。

西汉时期，中国从容不迫地登上世界舞台。在巩固国内大一统局面后，西汉政府稳步向周边地区拓展，传播中华文明。为了探索遥远的未知世界，西汉将营造中外交通途径作为走向世界的重心。其中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向西交往的

通衢。

西汉时期，中华文明相对周边地区的优势随着国家的大一统继续增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越、羌、西南和西域地区开始进入中国领土；匈奴、乌桓和鲜卑各民族在汉文化的感召下开始了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武帝年间，闽越发兵围东瓯。汉武帝将东瓯居民内徙至江、淮之间，纳入西汉的编户齐民，并派兵攻闽越。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贵族多人为侯。元封元年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武帝把越人迁徙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南越在汉初为西汉藩属，但南北关系若隐若离。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军攻入南越。岭南地区重新进入中国领土。

西南地区的西南夷于西汉初年与巴蜀等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汉武帝曾派唐蒙出使夜郎。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武帝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印度）的道路。从此内地与滇国的道路打通了，滇王于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内附。西汉对西南各族的控制加强了。

西汉初年，古老的羌族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从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向西筑令居塞。宣帝时，羌人与汉人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昭、宣以后，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

汉初北方的乌桓臣服于匈奴。霍去病北击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迁到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谁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虽然也常常攻击匈奴，但同时也骚扰汉朝北方边郡，成为新的边患。乌桓与更北边的鲜卑在与汉朝的日常接触和战斗中，开始了融入中国的进程。

秦朝虽然北逐匈奴，但是匈奴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首要边患。汉初，西汉采取和亲政策，以低姿态开始交流。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蓄势已久，开始主动出击匈奴，寻找主力决战。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夺回河套一带，设置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远征，过焉支山，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谕居延海，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精骑10万，兵分两路，深入漠北打击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削弱。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但汉朝国势也大受打击，“无以复往”，遂改变了以往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一方面汉朝通过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设郡置县及西通月氏、大夏，联合乌孙，基本上完成了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另一方面重新实行和亲政策。汉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匈奴和内地之间联系大为增强。汉武帝末年的“思富养民”政策为之后的政府所继承，西汉致力于整顿和加强西北和北方沿边防务，对匈奴实行较其他各族更为宽松的“羁靡”政策。

通过和亲互市，匈奴获得了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机会，从中原换得了较多的生产、生活用品。汉文化也较多地传人匈奴。匈奴是由多部族或部落组成的共同体，各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接触汉文化的时间与受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建立汉赵政权的屠各匈奴就内迁较早、受汉文化影响也较深。而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匈奴则远遁欧洲，将展开崭新的剧目。

为了联络乌孙、大月氏等共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去寻找飘荡不定的同盟。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率众出陇西向西域进发，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西行向汉族介绍了闻所未闻的神秘之地，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汉军破匈奴设立河西四郡后，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了。昭帝时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立都护。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建昭三年，汉军远征康居，汉朝和西域的通道

大为安全了。西域道路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西域的探索与稳定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 1877 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现代我们称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为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考古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热门商品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张骞西行尤其是汉置西域都护后，中西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西汉直至明初，丝绸之路随着中国内地盛世的兴衰而时断时盛。

公元五六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丝路沿途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不久就派使者出使西域。洛阳更成为各国贡使、商人荟萃之地。隋朝隋炀帝主动招徕西域商人，恢复已经衰落的丝路。唐朝在西域设伊州、西州、庭州，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鼎盛的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胡商，一派国际都会的风貌。唐朝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西北丝绸之路的东方经济推动力开始削弱。唐亡宋起，西北地区政权分立，丝路的安全难以保障，这就降低了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东南海上贸易逐渐频繁起来。蒙古帝国的建立再度繁荣了丝绸之路。东西方使者、教士和商人，不绝于道。明后，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明初的中国更重视海路，之后的闭关锁国则彻底关闭了中外大规模交往之路。丝路没落了。

汉朝基本奠定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大致东起长安，西行上陇坂，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现在早已为黄沙所掩埋的楼兰国。楼兰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北道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东汉明帝北攻匈奴，得伊吾庐（今哈密）地后，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时，南朝也尽力维持与西方的往来，从益州（今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在这些主商道及其支路周围，绿洲、城邦和贸易站点缀其间，散发着迷人的神秘感，现在是研究中外交流和考古学的热点地区。

与西北丝绸之路相伴随，古代中国还存在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起于公元前 2 世纪以后的四川盆地，从成都出发经今四川西南，通过贵州、云南，然后到缅甸、印度，并由此可达欧洲、非洲诸国。这条在川、滇、缅、印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的商道是中国通往外界的最早的一条古代陆上交通要道。它比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还早。

张骞出使大夏时，在市场上见到蜀布、竹杖等，很好奇地询问何处所来。当地人说：“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原来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有一条商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缅、印古道上的贸易商人，绕过西藏高原东南部，经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过缅甸，到印度、阿富汗，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最古老的丝绸之路。

当时正是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来西南地区从未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二来西南地区缺乏稳定的、繁荣的政权。因此，历

史对这条通道缺乏了解。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一直默默无闻地起着沟通中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作用。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亚洲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衔接处，是民族迁徙、经济往来的通衢，是大陆文化向南传播以及岛屿和海滨文化的北上渗透的咽喉地带。早在秦汉时期，蜀中的丝绸、布匹、铁器就沿此道销往东南亚、南亚及西亚，而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亦沿丝路输入中国。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价值不亚于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① 在西南丝绸之路重镇永昌郡②境内的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的荒冢中，考古工作者曾一次就出土了汉代五铢钱千枚，足见西南丝绸之路贸易之盛。与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相比重的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将在之后有专门章节论述。

西汉对世界历史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对丝绸之路的营造。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文明的早熟和发达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文明；汉朝、唐朝、元朝、罗马帝国、萨珊、波斯、东罗马帝国及后来的阿拉伯帝国都在总长 7000 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沿线。丝绸之路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一条连接沿线各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纽带。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产生的火花常常点燃历史的发动机。

丝绸之路还是当时世界各民族政治、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之路。当然也使沿线各民族、各国家不断增进了解，互派使者，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使节之路”。佛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来的，所以又是一个“神灵之路”。匈奴是通过这条路西迁的，乌孙、大月氏及后来的突厥、西辽、蒙古也都是沿着这条路西迁的，所以，这还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

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品是丝绸，但是并不局限于丝绸。西方

① 涂裕春：《古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融合》，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年 2 月。

② 永昌郡先名益州郡。汉末因为与益州重名，故改为永昌。在今云南保山地区。

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新鲜的物种知识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为中国所吸收。中国的桑蚕技术、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瓷器、茶叶、金银器皿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丝绸之路意义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起点的中西交通大动脉。它是强盛时代的中国向外拓展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贸易交流的主要路线。它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的文明网络。

在丝绸之路上，西域[①]永远散发着诱惑之光。自西域成为中国领土后，西域在之后的中西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宣帝时，始设西域都护，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蜀宾、乌弋山离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外，其余50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之下。从诸国分布的情况看，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地域范围是相当明确的，即天山南北、东疆地区、帕米尔及其以西的大宛、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的先民为西域的维护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有据可查的西域都护有10人：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东汉时期见于记载的西域都护是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②] 名传千古为读书人争气的班超自不必说。又比如郑吉"为人强执"，在西域20多年的时间里，组织屯垦，发展地方经济，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筹建西域都护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他又在各族人民团结

---

① 中国西汉以后，对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地区的总称。今新疆境内的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与今新疆相邻的中亚诸国，当时也被称为西域。

② 马国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载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6月。

和稳定西域社会秩序方面建立了功勋。段会宗从汉元帝始，先后八次出使西域，其中三任西域都护，“西域敬其威信”。他多次帮助乌孙缓解内部矛盾，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血冲突。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 10 年），74 岁的段会宗病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西域可算是西汉时期日益强盛的中国走向世界努力的缩影：拓展文明，开辟对外交通。

第二节　东汉，东西方的第一次握手

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夏五月，朝廷“遣副校尉阎磐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同年冬十月“南（南匈奴）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渡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①

这段史书写的是东汉对北匈奴七次巨大打击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汉朝军队长途跋涉，夜袭匈奴大营。而北匈奴单于在混乱中受伤堕马，连老婆阏氏也来不及带走，在数十名轻骑兵的拼死保护下才得以身免。史书有夸大之辞，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北匈奴残余跟随单于向西迁移了。

刘秀中兴的东汉王朝继续了西汉祖先走向世界的步伐。首先，东汉王朝加强了对周边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整合过程，继续缔造大一统的政权和文化；其次，东汉王朝将对外的视野拓展得更大，更远，主动派遣了向外交流的使节。作为又一个盛世王朝，东汉的对外步伐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历史最大的影响却是匈奴别部在中国的沉重打击下远遁西方，对欧洲文明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这可算作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成果。

①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0、2953页。

东汉的经济在西汉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西汉高。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铁农具的使用大大超过西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南方经济得到开发，人口大量增加。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有发现。首都洛阳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官僚贵戚凭借权势，还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

刘秀还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以高官厚禄换取功臣实权实职，将实际权力收归尚书台；在地方政权上，州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域，州刺史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提倡讲经论理，推崇儒术，更重要的是用察举、征辟、举贤良方正以及明经等办法，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不料强化的专制体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和争斗，还出现了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东汉中后期的帝王全都成为傀儡。和帝 10 岁即位，安帝 13 岁即位，顺帝 11 岁即位，冲帝 2 岁、质帝 8 岁、桓帝 15 岁登基。朝政日坏，直至黄巾起义，朝廷内争才告一段落。结果起义是被镇压了，天下却不再姓刘了。

在东汉初期，佛教开始从西域传入中原。汉明帝曾派遣使臣去西域求佛经。献帝初平年间开始大规模造像和招揽信徒。中国接受佛教后，成为了佛教重镇。

东汉时内地与周边各族的交往比西汉时期更加频繁。东汉初年，乌桓、鲜卑常骚扰汉北方各郡。光武帝时许多鲜卑大人陆续率部归附东汉，乌桓渠帅被封为侯王君长。此后百余年，乌桓叛服不常。东汉重歼北匈奴后，残留的北匈奴人与鲜卑人逐渐融合。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农业生活为主的扶余人。光武帝时扶余遣使奉贡。扶余东南鸭绿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高句丽人。光武帝时，高句丽使臣曾至京师奉贡。中华文明已经深入了白山黑水之地。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与汉杂处。由于官吏和豪强的侵夺，羌族常常起而反抗，遭到东汉的军事镇压。但是羌族一直牢固地占据聚居地直至今天。

东汉初，西域分裂为50余国，与汉朝关系一度紧张。西域北道诸国，重新受制于匈奴。明帝时，派将军窦固率军西击匈奴，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和帝时，窦宪连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汉任命班超父子先后为西域都护。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贪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段历史纪录告诉我们：甘英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的波斯湾。甘英的使团来到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粮食。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安息国向来以汉丝及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愿汉朝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向甘英备陈渡海的艰难，使甘英止步而还。这次出使虽未达大秦，但丰富了国人对中亚各国的知识。

梁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对此大发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聘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①]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限的历史纪录。

① 王子今：《甘英遗憾》，载于《世界知识》2005年10期。

甘英的记录在元明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西域在东汉初年原本为复振的匈奴所控制。匈奴利用中原混乱之际，趁机扩展势力，势力日渐强盛，又大肆寇掠汉境。“杀略钞掠，北边无复宁岁”。东汉王朝初建，光武帝无暇北顾，对匈奴妥协退让，“赂遗金币，以通旧好”。

匈奴此时的强盛是其在中国境内的回光返照。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遭遇了自然灾难的巨大挑战。“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呼韩邪单于内争失败，率其所属归附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分裂为南匈奴。东汉政府扶持南匈奴以夷制夷，加速了匈奴的分化瓦解，导致南、北匈奴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从此匈奴失去了再次统一的机会，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衰落之途。

南匈奴内附后，在北方边郡助汉守边，使中原地区大大缓解了北部边患。南匈奴入塞后，经过与汉朝人民长期的杂居、通婚，最终在十六国的战火中融于汉族之中。随着东汉国力的加强加上南匈奴的配合，东汉政府开始反击北匈奴。本节开头的汉匈大战就是汉族联合南匈奴对北匈奴发动的历次反击之一，历次反击都是汉族胜利。北匈奴日见穷窘，“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公元83年至85年间，北匈奴部众纷纷南下归汉，共73批，从此退出漠北地区。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匈奴大败后，残部仓皇西迁。匈奴西迁的行程，中外史料，语焉不详。马骏骐先生的《略论匈奴西迁》① 一文全面概述了匈奴大败后的历史。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匈奴离开了蒙古高原，向西先到达康居，后到乌孙。鲜卑族占据了匈奴的故地，留在当地的北匈奴数万人也自称鲜卑。随着康居和乌孙两国的强大，匈奴受到排挤，不得不继续西迁。这些北匈奴残部一路悲壮地唱着：

① 马骏骐：《略论匈奴西迁》，载于《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

忘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那支山，使我女儿无颜色。
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于天。

情形凄凉。他们必然在中亚的荒漠戈壁遭遇了众多的艰辛困苦。但直到公元 292 年前后，西方史籍中才出现了匈奴人的记述。西欧学者在论述东方军事时，提到亚美尼亚国王泰格兰纳斯的军队中不但有阿兰雇佣军，且还有一队匈奴士兵。半世纪后，波斯北部边境遭到 Chionites 人攻击的新闻传到了欧洲。“Chionites”可能就是欧洲对迁徙的匈奴人的最早称呼。

公元 4 世纪中叶，匈奴人击灭了位于今南俄草原以东的阿兰国，迫使哥特人西迁。欧洲震动，自此匈奴人在西方的活动骤然增多。阿兰国在康居西北 2000 里，是匈奴西迁的第三站。阿兰在顿河河畔，匈奴占领阿兰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自公元 374 年起，匈奴收编残余的阿兰军队，休整壮大后开始进入欧洲。

一开始，匈奴人向东欧、波斯四处出击，互有成败。匈奴人依然盘踞在顿河流域的阿兰古地。公元 400 年秋，罗马帝国将领盖尼亚，谋叛失败，托庇于罗马尼亚地区的匈奴。该地区以乌尔丁为首的匈奴人，捕斩盖尼亚，呈送首级给东罗马皇帝，以示友好。

在此前后，匈奴势力逐渐从南俄草原伸延至蒂萨河流域，并多次派兵横渡多瑙河，不断攻掠色雷斯。东罗马帝国色雷斯总督招架不住，被迫以每年付给匈奴 350 磅黄金为代价，换取了乌尔丁不再扰掠其帝国边陲的承诺。以后，乌尔丁连年蹂躏东罗马帝国。公元 5 世纪初，他忽然掉转马头，挥兵指向西罗马，攻打班诺尼亚省。东哥特人归服匈奴，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不愿受匈奴人的奴役，于公元 401 年踏上了涌入西罗马帝国的大迁徙征途。

乌尔丁死后，“上帝之鞭”阿提拉于公元 445 年掌权。此时匈奴的势力中心已位于多瑙河中游，相当于 19 世纪奥匈帝国之地。公元 447 年，阿提拉率军兵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不敌，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之后，匈奴大军向西欧进军，强渡莱茵河。在莱茵河，发生了人类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最惨烈的一场战

争。匈奴士兵驱赶着马，跳进河里。马向对岸游去，有的士兵是骑在马背上的，而更多的则是拽着马尾巴游过去的。对岸乱箭齐发，马和人将莱茵河填满，河水则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渡河后的匈奴大军驰骋西欧，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逃亡到英伦三岛；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则战败投降匈奴。此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处于了历史末期，大批东方民族迁移进入西罗马帝国，给帝国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公元 450 年，阿提拉集合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 50 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迫使各蛮族结成了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西罗马打了 20 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

公元 451 年 9 月 20 日，两军在色恩河南岸的特洛城郊外决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 100 万。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铁骑风驰电掣般冲向由蛮族组成的中央战线。蛮族联军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击溃。正当混战正酣，西罗马联军形势危急之时，强悍的西哥特援军及时赶到，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年过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受挫的匈奴骑兵转头又撞上了左翼西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标枪的投射之下。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回马恩河畔的营地，用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才稳定战线。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卡塔劳温大战，战斗虽然只持续了 5 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 16 万人丧生。双方伤亡惨重，未分胜负，阿提拉无意恋战，退回匈牙利境内。

第二年，阿提拉重整旗鼓，从巴尔干取道而南，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人侵意大利、攻陷意北重镇。在向罗马进军的途中，匈奴军中发生饥馑、瘟疫，东罗马援军亦已至。阿提拉被帝国派来的使者罗马圣·莱奥大主教说服，并接受了送来的贡物以及罗马霍诺里娅（Honoria）公主，再次退兵。453 年，阿提拉因酒色过度而暴卒。

阿提拉死后，诸子纷争，新匈奴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各被奴役民族结成联军，反抗匈奴。公元 454 年，东哥特、吉皮底人、日耳曼人联军与匈奴军队在匈牙利境内的聂德尔河畔会战。匈奴人随后东移避居南俄大草原。公元 461 年，阿提拉之子邓直昔克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公元 468 年，他又率师南下，渡多瑙河，进犯东罗马帝国，战死沙场。群龙失首的匈奴种族离散，逐渐被其他民族融合。公元 500 年左右，匈奴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像颗耀眼的流星，陨落在历史的天空里。

关于匈奴人的后裔问题是世界历史的热点之谜。主流观点认为残余的匈奴人发展建立起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最初过着飘忽不定的游牧生活，4 世纪出现于西欧，9 世纪末迁入今匈牙利境内。约在公元 1000 年，斯蒂芬一世经罗马教皇加冕称王，建匈牙利王国。至于匈牙利人究竟来自何方无从考证，历史文献记载既零星散乱，且游移不定。同时匈牙利人中等身材，较一般欧罗巴人身材略短，脖颈粗壮，头颅圆形，是典型的亚洲人头型，双目细小，脸面较平，扁鼻，胡须稀疏。匈牙利人与匈奴人同属蒙古人种，形体容貌也有惊人的相似，能够说明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代。当今的匈牙利就存在要求承认匈奴民族的呼声。

匈奴西迁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中上演的第一场大剧。汉朝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雄踞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和类型不同的两大文明中心。二者在经济结构、政治机制、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上存在着极大差异，各以自身的能量向四周进行辐射，导致中西文化的碰撞。匈奴人充当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灭亡了西罗马帝国。① 在匈奴、日耳曼、哥特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罗马帝国奄奄一息。476 年 9 月，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雅克废黜了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西罗马帝国灭亡。

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遭受了游牧民族的冲击，一盛一灭，令人费解。被汉朝军队击败的北匈奴残军为什么到了欧洲

① 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载于《衡水师专学报》2001 年 6 月。

就能横扫西罗马帝国呢？

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起有落，时战时和。战争中既有和亲这样政治上的联系，也有互市这种经济上的交往。与汉帝国相反，罗马帝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从进攻逐渐转入防御的。罗马帝国对蛮族战争虽然也是由帝国的实力盛衰决定，但是呈直线型，没有起伏，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交往。因为，处于帝国末路，西罗马对游牧民族的战争远不如汉政府对匈奴的规模大，也没像汉王朝那样进行有组织有准备的大反击，因此，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次，中国北部匈奴对汉文化的冲击频繁，但规模不是很大。他们主要是掳掠财富和人口，对土地的要求很少。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冲击是逐步升级的，越到后来越是迅猛异常。他们要求的不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土地，是要在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有着充分的组织准备，并且有一道坚固的长城作屏障，因而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罗马对蛮族的战争，尤其在后期，毫无组织准备，即使是皇帝亲征，也是处于挨打被动的局面。汉帝国对匈奴战争伴随着文明的渗透，每次战争胜利后都要迁徙大量汉民戍边，巩固和开发新占领地区，把汉文化带到匈奴地区并深深扎根。这一点是罗马帝国所望尘莫及的。

最后，罗马文明和汉文明的特性也不一样。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世代固守在同一土地上的小农经济形成了民族的内聚力和保守性。“它不像西方文明有着文化上的交往和继承，反而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同化影响周围的野蛮部落。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才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去排挤外来文化，顶住匈奴的冲击并将匈奴逐至大漠以北以至西迁。于是带着汉文化影响转向西方的匈奴文化，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去扮演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敲响了罗马帝国的丧钟。”①

① 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载于《衡水师专学报》2001 年 6 月。

第三节　三国两晋，战乱阻不断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乱世。周边民族纷纷入侵，神州大地战火纷飞，政权林立。在熊熊火焰中，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继续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雏形。乱世中孕育着统一，直到8世纪末隋朝建立，中国走上了传统社会的发展顶峰。这500年的历史既是之前统一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历史结果，也可算是古代中国迈上巅峰的历史酝酿。

因为战事的耽搁，中原王朝实力大为衰落，且重心放在图强争霸上，西北丝绸之路随之隔断。中国与遥远之地的交流也随之中断。这一时期境内各割据政权的外交基本局限于亚洲各邻国。

与北方的五族乱华的动荡形势相比，当时的南方相对稳定，南方的民族融合以平和得多的形式在稳步进行。当时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僚、俚、僚等。蛮族人数最多，占地最广，势力最强。南方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郡县统治，只收纳米谷，不征徭役。经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和反复不断的征服与反抗，蛮族开始分化。相对蛮族，僚人汉化较早。历史上的名人如东晋陶侃、南齐胡谐之等其实都是僚人。俚人分布于交、广、越诸州，僚人分布在巴蜀地区，南朝辖域日渐狭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益加重视，客观上推动了各族的汉化。

客观形势促使了南北各政权都将目光转向了浩淼的东海。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为中国的海外交往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基础。早在三国时期，南北方的造船业在世界上就处于领先

地位。孙权时期已能造出载重量约千吨的大海舶，以及蒙冲、斗舰等各种类型的战舰。东吴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远航朝鲜与东南亚各国，“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乘风破浪，行程数万里。① 北方的曹魏在平定辽东之后，还大量移民渡海，充实山东地区的青州。景初三四年间，魏国迁徙辽东诸县的吏民渡海到青州齐郡，设立新县。成千上万的辽东官民成功漂洋过海反映了曹魏航海事业的发达和繁荣。

此时的中日关系大为亲近。早在西汉，日本 100 余国中就有 30 余国遣使中国。东汉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日本“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汉倭奴国王”印。三国时期的公元 3 世纪，日本岛上出现一个邪马台国，女王名卑弥呼。曹魏和邪马台国曾多次互通使节。正史中，陈寿的《三国志》首次为日本立传。

《三国志·倭人传》提到的日本诸国名称共 33 个，重点记述的有以邪马台②为首的 29 个国家。当时曹魏和日本之间有了固定的海上交通，从带方郡出发，“循海岸水行”，进入倭国界后，首先经过对马国。其后依次为一支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投马国、邪马台国。邪马台国女王名为卑弥呼，领导其余诸国。这些记载基本符合日本当时的史实。《倭人传》还对日本八国人口户数、官职制度、地理环境和经济物产等也做了记载。日本当时“种禾稻、兰麻”，还有捕鱼、捞蛤，不分深水浅水，均能入水取之，有些人“食海物自活”。细兰、绵、帛布、兵器、酒、玉、船只等都是较普遍的手工业产品。日本各国都有市贸互通有无，特置官吏“收税赋，有邸阁”。

《三国志·东夷传》载：“景初二年（公元 238 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倭女王向魏国皇帝“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

① 朱子彦：《三国时期的航海和造船业》，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3 年第 6 期。

② 邪马台国究属在何处，今人颇有争议，一说在九州北部，一说在本州的大和，一说在筑后的山门郡。

二匹二丈”。明帝接见该使团，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回赠了白绢、龙锦、铜镜、珍珠、铅丹等大批礼物。《倭人传》几乎全文收录了魏明帝颁赐卑弥呼的《诏书》。这份《诏书》透露日本使团以难升米为正使，都市牛利为次使。其贡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还有4男，6女。明帝认为，卑弥呼地处遥远，遣使“贡献”实在不易，感其“忠孝”，封其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缓。魏明帝也不忘要求卑弥呼绥抚国人。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个国家级使团。魏帝的诏书和礼品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由带方郡太守遣使航海送至邪马台国。中日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往来关系。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8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除生口外的其他7种贡物均是珍贵的上等产品。在位的魏齐王对“掖邪狗等拜率善中郎将印缓”。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景初年间的正使难升米再次来华。魏国“诏赐难升米黄幢”，奖励其在中日友好关系中做出的贡献。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发生战争，遣使来华通告求助。“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曹魏遣塞曹掾史[①]带着诏书、黄幢等到日本。以后卑弥呼病死，嗣女王壹与亦遣使节来洛阳，送上大量贡品。曹魏派张政“以檄告谕壹与”，以示支持。也就在这一年，新女王壹与遣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归国，并献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枚，青大句珠2枚，异文杂锦20匹。这当是日本使者第四次来华。

司马昭执政时，邪马台国和曹魏继续互通使节，来往不绝。根据《三国志》的描写，在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间的短短10年中，双方使者往来6次，相当频繁，远胜于后代。[②]

---

① 塞曹掾史系带方郡佐吏，掌边塞诸事，西汉始置，东汉、曹魏延续。

② 孟古托力：《读〈三国志·倭人传〉——曹魏与日本列岛诸国的往来》，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

地处东南的孙吴政权和海洋关系更加密切，对外交往集中在东南和东北海域两个方面。孙权于公元 230 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只得夷洲数千人还。孙吴船队是从章安（今浙江临海）启程，从台州湾出海，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后横渡台湾海峡，在今台南市和嘉义县一带登陆。这是历史上大陆人民开发台湾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件大事。但是军劳无功，卫温、诸葛直归国后被下狱诛杀。公元 242 年，孙权又遣将军聂友、都尉陆凯率领三万人的船队远航朱崖今广东省、澹耳（今海南省）。

孙吴的船队不满足于航行于东海大陆架地区，还远航东南亚。公元 226 年，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率领庞大船队出使南洋。朱应、康泰等人的南洋之行，历时达六年之久，“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其中包括林邑（今越南东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朱应、康泰滞留扶南时，恰巧天竺国（今印度）使臣也来到扶南，康泰“具问天竺土俗”，了解到天竺“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水陆通流，百贾交会”等风土人情。

在东北方向，孙吴政权对辽东和朝鲜半岛国家展开的外交往来。为了威胁曹魏后方，实现南北夹击的战略意图，东吴多次派遣海船前往辽东半岛，与辽东的公孙渊结成同盟。公孙渊反复无常，曾斩杀吴国使者，“送其首于魏”。赤乌三年（公元 240 年），孙权为报仇，“遣使者羊衡、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而还。大批船只从江南至辽东半岛，海路艰险，中途还要通过魏国的领海，冒着随时会受到魏军袭击的危险。孙权还特派船队访问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嘉禾二年（公元 233 年），高句丽王宫奉表称臣，贡貂皮等特产，孙权“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王亦送马数百匹回赠给孙权。这些史实证明了当时吴国的海运之强。

这一时期，交州地区（今两广、云南东部地区）后来居上，成为中原王朝与南海诸国交往的门户。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都是以交州为基地的。本地区的优势地位，使得它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商队来往中原的中转站。

许多外国商人来交州贸易，并由交州进入内地，有些人甚至就居住于交州。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有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今越南），交趾太守吴邀将其遣送至建业。“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时对”。秦论在中国呆了八年才回国。孙权遣官吏送秦论坐船回国，可惜使臣在路上病故，未能达到通航罗马的目的。《高僧传·康僧会传》中记载，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因商贾移于交趾”。士燮家族出入人中，有“胡人夹毂焚烧香”，这些“胡人”可能就是来自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传教者或商人。由于南海诸国到交州贸易甚多，交趾、日南的太守等官员也从贸易中获利不少。“初，徽外诸国尝贵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此可见交州贸易之兴盛。由于交州交通的便利，其经济相应兴旺繁荣。交州的合浦郡就不产粮食而产珍珠，郡民用珍珠换取粮食。又如史书中称：“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四节　佛教，因祸得福还是命运多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自东汉传入中原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乱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时期，佛教经历了推崇、恩赏到大规模灭佛的传奇发展历程。这似乎意味着佛教在中国的命运。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了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藏传佛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当时是作为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

等）大致相同。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此后若干世纪以来，都保持着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修学的优良传统。傣族男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再还俗。

今天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主要是汉地佛教。下面笔者将就汉地佛教的传播进行论述。

汉地佛教怎样传入中国目前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力主西来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佛教可能是从西北慢慢渗入，经由丝绸之路的两条支线在敦煌进入中国的，并且从哪里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外国人习惯于从西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佛教从西北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①]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佛教海上传播的线路。综合起来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绸之路，南沿海上丝绸之路。[②] 但后者比较鲜为人知。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外传。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就此归纳了六种说法。清代学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来”说，认为先秦即已传入；民国学者马元材等持“秦朝”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持“西汉末年”说；方立天等学者持“两汉之际”说；任继愈、严北溟等学者持“东汉初年”说。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订。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赐楚王英诏言其

① 松本伸之：《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载于《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王健：《汉代佛教东传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于《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公元前 2 年，大月氏国（这本是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此时的佛教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与佛教有关的帝王是汉明帝。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 64 年）派遣使者 12 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 67 年他们与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相传有匹白马驮经而来，建白马寺纪念。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

从此，佛教为上层官府和史馆之流所注意，佛教开始大范围传入中国，并且很快发展起来。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

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化，引发了各阶级对于佛教的多方面兴趣，外来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典籍，可以说是以空前绝后的规模涌进内地，同时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发生了全面的接触，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这个时期，主要传播活动仍是佛典翻译，魏都洛阳和吴国的都城建业是传播活动的中心。这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以后佛教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阶层人普遍信仰佛教，到处建有佛塔、寺院。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如敦煌、云冈、龙门等古代的雕塑、壁

画，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工程。这时有成就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 年）所译的佛典有 384 卷，内容精确，对佛教发展贡献极大。还有西行取经最有成就的法显（337—422 年），他游历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 30 余国，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写的见闻，为佛教发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史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①

特别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 2846 座，僧尼 82700 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 700 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 年）年间在全国建立了 111 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承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的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这时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 年）。玄奘历时 19 年，长途跋涉 5 万余里，去到印度取经，共翻译佛经 75 部 1335 卷，并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见闻录。唐太宗推崇玄奘为“法门之领袖”，“千古而无

①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对”。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朝廷恩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唐朝时期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 年），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寺院 4600 余所，拆毁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 4 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 260500 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综上所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以及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概括。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

和密宗。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嫁接”成功，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向朝鲜、日本等地传播。在隋唐时代，在中日交往中，佛教始终占有重要地位。[①] 中国佛教在海外的传播亦多属于嫁接类型。由于中国佛教传入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不同，日本佛教先后形成奈良系（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平安系（天台宗和真言宗）和镰仓系（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曹洞宗、临济宗、日莲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至今对日本仍影响深远，这些教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日本化的最终完成。朝鲜佛教也经历了从“五教九山”到“五教两宗”的变化，特别是智讷（1158 - 1201年）阐扬“禅教一致”、“定慧双修”，他开创的曹洞宗，至今仍是韩国佛教的主流。[②] 其中唐代律宗名僧鉴真（687—763年）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终抵奈良。为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请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年（748年），先后五次率众东渡，但均因天时、人事不利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并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于天宝十二年（752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自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同时他还被尊为日本建筑、书法、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到了五代时期，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地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

① 韩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载于《佛教研究》1999年卷。

② 张雪松、刘泳斯：《扦插还是嫁接？》，载于2006年4月11日《中国民族报》。

后梁龙德元年（921 年）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年）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淘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这对佛教本身来说，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禁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虽然在南方佛教有缓慢发展，但是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已告一段落。

五代以后，佛教虽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但是，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了，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佛教的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僧人间传法交往络绎不绝。天禧五年（1021 年），北宋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僧尼近 46 万人，寺院近 4 万座。徽宗时，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全国有寺院 4 万 2318 座，僧尼 21. 3 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即位后自封“大庆法王”，亲自讲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帮助他巩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权。明万历以后，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的出现，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使

佛教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之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汉语系佛教仍在民间流行。大清会典的律令规定：僧道不得沿门化缘，不得外出，禁止妇女到寺庙进香礼拜等。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倡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如杨文会、欧阳竟无、大虚等。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就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些人还对佛教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把佛学思想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代随着西方殖民南亚，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南传佛教逐渐被西方世界认识，并逐步得到传播。出洋的华工、华商也将中国佛教带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出现的第一座寺庙是 1853 年由广东省华侨公会四邑总会在旧金山创立的，是以儒、释、道三教混合的形式出现的。截至 19 世纪末，美国西海岸各州已经有小木屋型或各种家庙约 400 座。但由于华人受到白人歧视，中国佛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19 世纪末，随着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巴西等地，日本佛教也逐渐在海外传播开来。越南等东南亚移民也将自己的佛教信仰带到法国等欧洲国家。民国时期，太虚等法师曾积极筹备向海外传教，但由于国内外时局动荡，收效不大。当时中国佛教的海外弘法活动主要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如

印顺法师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曾在菲律宾弘法，而竺摩法师在马来西亚的弘法活动成果最为引人瞩目。20 世纪中叶，随着一批西藏、蒙古喇嘛在西方传法，西方社会开始出现藏传佛教的热潮。①

作为舶来品的佛教，经过中国化过程后，成为了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之一。当今的佛教已经深刻影响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行为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内容，已经完全渗透到亚洲各国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佛教不再只是宗教，而是东亚各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① 张雪松，刘泳斯：《扦插还是嫁接》，载于 2006 年 4 月 11 日《中国民族报》。

第四章 灿烂的东方，辉煌的顶点

从唐宋到清朝前期，古代中国在巩固中稳步前行。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星星点点，汇聚成了一场星光璀璨的大戏。虽然其中也有战乱割据，也有闭关锁国，但是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影响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以欧洲为代表的外部世界在17世纪掀起了中国热潮。中国的制度、器物和文化为世界所称羡。灿烂的东方文化成熟、鲜艳、散发着迷人的气息。遗憾的是，从明清开始，文明成熟的中国社会逐渐趋向保守，在保守中逐渐僵化。这样的转折使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盛极而衰，滑向了下坡道。

第一节 科举，延续千年的选人制度

政治准入问题是政治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及相配套的考试制度是现在世界通行的解决之道。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制，可算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历史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自隋延续至清末，存在了1300多年。隋炀帝时，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学业优敏即明经科，文才秀美即进士科。唐朝将隋创的科举制推向顶峰。于进士科外，唐代增设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常设科目以及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非常设科目，还有皇帝特别主持举行的制科。武则天在位时增设武科。

与之前将选拔对象局限于官宦世族不同的是，科举制的大门是向所有读书人敞开的。考生来源一是由中央和地方学校经考试合格的生徒，一是由地方选送的未在校学习而自学有成就的乡贡。明经、进士等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要考试各科所习专业课程。考试的方式方法，唐至宋初，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宋以后主要试经义。其中策问是主试者就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应试者发表意见，做出书面回答。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而且直到清末，一直是进士科的考试项目。北宋神宗以后，废除了帖经和墨义，代之以经

义。经义就是以五经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写这种论文有较多发挥思想的余地，较之帖经、墨义是一种进步。到了元代，明文规定经义考试首先须从四书中出题，答案须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任意发挥。明中叶以后，又要求阐发经义的文章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于是，经义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的要求。

相对于之前的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优点非常明显。科举制则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客观要求。通过科举考试，士子获得了参政的机会，打破了世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相应地扩大了统治基础，缓解了阶级矛盾；同时社会精英阶层都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游戏规则”，埋首于书山文海之中。这都有助于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科举制的精髓是“公平”两个字。科举制度一改过去以官吏推荐为选举的主要途径之做法，公开选拔，公平竞争。允许平民自愿报名参加官府考试，通过考试获得受选资格；选拔的标准和方法都是公开透明的，严格的选拔过程保证了过程公正（科举考试的正规、严格使得一些学者甘遂将科举制称为考试制）。这是在复杂的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下所能达到的公平极限。

酒香不怕巷子深。科举制一经产生就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应用于各自的政治实践。

日本国效仿科举最早。公元 7 至 8 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等六科。但是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相比较唐朝科举的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公平性不足。

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 10 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

才学高下，而是看其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荐举之弊”。11 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考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至此贡举制已完全异化，日本不再有科举制。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公元 958 年至 1894 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 936 年）。唐朝时，科举制度传入高丽。特别的是，高丽的科举不仅制度与中国相同，而且执行从属于中国的科举。如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公元 1371 年）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 500 字以上，《四书》疑，限 300 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 300 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 1000 字以上，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再考书、算、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

李朝于公元 1392 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定科举法，罢《四书》义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①

越南的科举从公元 1075 年始，至 1919 年止，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在举行过十次太学生科考之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影响，陈睿宗于隆庆二年创设进

① 刘海峰：《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载于《中国考试》2005 年第 1 期。

士科，考取了 50 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黎朝以后，则模仿中国明朝科举。洪武三年 （1370 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赴中国京师参加会试。明成祖永乐四年 （1406 年），安南重入中国版图至明英宗正统元年 （1436 年） 黎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

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三个中国近邻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他们发现了科举对聚拢人才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作用，纷纷模仿采行科举制。科举制逐渐成为了中华文化圈的主要政治内容之一，并且影响越来越大，通过各种交流渠道传播到了西方。

近代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在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9 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英文著作 《中国环行记》 一书中谈到科举：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 （就如它将要的那样） 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在 18 世纪以前，欧美各国选用公务员的办法，或是个人赡询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立国较晚的美国在 19 世纪末，就因为政党分肥及由之导致的官员腐败问题导致政坛动荡不安。甚至有总统成为这一问题的枪下牺牲品。因为缺乏统一而公正的标准，西方政治学界一直为解决公务员队伍的准入问题和内争问题而苦苦思索。

而科举考试标榜的公开取士、公平竞争使西方政治学界眼睛一亮。他们意识到采用科举考试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效仿科举制引起了西方人的兴

趣并受到赞誉，不久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①] 1791 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

老牌帝国英国在完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最为关心，从 1570 年至 1870 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 70 多种。英国于 1793 年、1816 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180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文官考核制。1853 年，英国自由党首相格累斯顿委派财务部副大臣查理斯·屈维廉与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人全面研究英国选用官吏的问题。第二年，他俩提出了改革报告，即著名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报告尖锐提出英国政府里的官员裙带关系和庸碌无能的情况，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要得到第一流的人选，就必须求助于竞争。报告还建议设立一个考试委员会，按照才能和教育程度录用应考的年轻人。这份报告开启了现代英国文官制度的大门。1855 年，英国成立文官委员会。1870 年，英国枢密院规定“一切文官职位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标志着以公开竞考、择优录用为基本原则的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英国的文官制度为其他西方国家所效仿。各国于 19 世纪中期也相继开始实行文官制度。1883 年，美国依据英国文官制度的经验，颁布了《文官制度法案》，以公开竞考、机会均等、择优录用等原则作为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从此美国文官制度正式确立。[②]

西方的文官制度吸取了科举制度公开选拔、公平竞争的精髓，又没有陷入明朝之后科举八股文的桎梏，代之以西方的政治伦理、政治理论和行政管理知识来考核考试者。科举制与西方政治现实的结合与完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就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成为现

① 刘海峰：《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见，www. confucianism. com. cn，2006 年 11 月 6 日。

② 薛菁：《唐代科举制度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载于《教育评论》2001 年第 6 期。

代西方文官制的先河。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贡献。如美国学者柯睿格 1947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西方人将科举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并列，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第二节　隋唐，煌煌中华帝国

隋唐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的盛世。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的先导地位。每逢盛世，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经济飞速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此时中国的器物、制度、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这就使得隋唐成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发动机，不断扩散影响，使他国对中国产生依赖性。尤其是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断，西北丝绸之路因只隔断。西来的商品最东到达河西地区，外商们纷纷改在河西贸易。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结束了300多年的纷乱混战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隋朝初年，朝廷派军西征，重新控制了河西地区，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隋炀帝继位后，热衷于中西交通和贸易。公元607年，他委派户部侍郎（主管财政）裴矩专驻张掖，主管外贸事宜。公元609年3月，隋炀帝西巡，到了青海和甘肃，往返历时半年，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西巡皇帝。

6月，隋炀帝到张掖郡，登焉支山，主持召开了盛大的国际贸易会。在张掖，隋炀帝见了高昌王和西域27国使者。为了庆贺这次西巡取得的丰硕成果，隋炀帝令各族王、使者都佩金玉，身披一件用毛制成的服饰，焚香奏乐，在道旁歌舞欢呼，依次参

见。同时令武威、张掖两郡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前后数十里夹道欢迎。几十里路上，车马填咽，难以通行。这次以“显中国之威，示中国之盛”的贸易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因为隋炀帝的重视和亲行，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了新的荣光。从此隋朝在丝绸之路的张掖设立互市，并派驻特使宣传和招揽官私贸易。发展到唐代，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葱岭以西，西域各国向唐朝称臣纳贡的使者不绝于途。由于政治环境的安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中前期，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甘肃成为全国经济最富的地区之一。农业、纺织业及黄金生产、水利资源开发和利用等，在全国都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就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

在“张掖盛会”的影响下，中亚西方更多的国家纷纷前来洛阳入贡于隋。隋炀帝在洛阳建国门外，特设招待蛮夷酋长、贡使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馆，以便朝贡贸易。四方馆的设置一直延续到了晚清。当时洛阳城中规模巨大的三个工商市场中以丰都市为最大，位于洛河南岸端门大街以东，周长 8 里，有 12 个通门，内有 120 行、3000 多家店肆，四壁有 400 余店，货贿山积。大同市在洛河以南，端门大街以西，周凡 4 里，市开 4 门，邸 141 区、资货 66 行。通远市在洛河以北、迪河以东，濒临潜渠，周 6 里，是洛阳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蕃夷商贾汇聚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进行官私贸易，使洛阳成为国际贸易盛会的大市场。

在南方，隋炀帝又开通了通济渠，加强南海、岭南一带与内地的商旅贸易，也为南方海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往来不绝”，“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潜，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隋朝短命而亡。它所奠定的对外交往的制度和规模都为唐朝所继承发展。唐朝也以重新贯通丝绸之路作为入手点。隋末的战乱和突厥的兴起，重新隔断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

制权，唐王朝发动了数以百计的战争，终于在显庆二年（657 年）破灭西突厥。唐朝在突厥故地设立都护府和州县，将版图延伸入了中亚腹地。至高宗初年，唐已将“丝绸之路”各主干线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天山南路分设“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在天山北路西突厥故地置北庭都护府，建 23 个都督府、二州，并将伊州、西州、庭州并入陇右道，由朝廷派员直接管理。在此基础上，内地与西域等地的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日益紧密，政治关系与军事关系日益增强。

唐丝绸之路的贸易方式，以贡赐、边界互市的官方贸易为主，也积极开展广泛的民间贸易。众多的胡商不仅组织庞大的商队，进行长途贩运；而且涌入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组织社团或单独经营，或与当地汉族商人合伙经营。唐朝还在四方馆的基础上特设鸿护寺典客署招待蕃客贡使，并安置馆舍膳食等优厚待遇之事，鼓励朝贡贸易，以及互市或交市贸易。唐代“丝绸之路”因此走向了繁荣与兴盛。唐王朝的威望远播中亚、西亚地区。

盛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主要国家有 70 多个，复杂的交通网络从东亚开始，延伸向四方。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可达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达尼泊尔和印度；往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到达南亚诸国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而至；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海各国。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丝路驼铃不绝，海上风帆竞发。

商贸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古代中国的文章典籍、科技发明和诗歌文学就是以贸易为先锋，以商路为载体四散传播的。

唐代都城长安，由于国家的强盛和中外交往的繁密，达到了城

市辉煌的顶点。它以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欧亚大陆。从隋朝建立到唐朝前期的300年间，长安拥有100多万人口，面积达84平方公里，成为四方商旅往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大都市，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中外交流的繁盛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打下了世界烙印。来自西域各国、经丝绸之路东来的文化通过朝觐、宗教、商业以及民间市井生活方式融合传播，成为当时长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热闹的城市中散发着浓郁的胡风胡韵：

……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毡腥脑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这首《法曲》，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安的国际景象，展现了多元文化对唐长安城市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大量外商外客聚居长安，使长安成为了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大熔炉。各种胡食，如胡饼、烧饼、抓饭、各种酒类等在内地流传起来。《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长安“贵人御撰，仅供胡食”，玄宗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唐代长安驰名的胡麻饼成为饮食新宠。白居易曾有《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诗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此外还有烧饼、五福饼、搭纳等。酒肆里的“三勒浆”（用摩勒、毗梨勒和河梨勒三种果实酿造的美酒，最早产于波斯，唐初传入长安）、葡萄酒、龙膏酒等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水酒，成为豪客新欢。①

像长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在唐朝还有很多。泉州、广州、明州、成都、扬州等等，比比皆是。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南方的广州。由于广州海外航行与贸易的发展，使得广州的“江中有婆罗

① 史向军：《唐长安的胡风胡韵》，载于《陕西档案》2005年2月。

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业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大量的外国船舶远渡重洋到达广州，船上载满珍贵的宝物和香药，主要还是要换取中国的珍贵丝绸，也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商及使者聚集广州。广州成为阿拉伯、波斯、南洋等地区来华和中国外贸商船的出入口，成为岭南首盛之地。当地的外侨聚居处称为“蕃坊”，远来的阿拉伯商人还兴建了存至今日的广州怀圣寺。唐末黄巢军队进入广州时，就杀害了城内的外商蕃客多达 12 万人。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 714 年），广州开始设置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市舶使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涉外税收机构。当时对外贸征收的税率正史没有记录，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税率大约是 30%。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扬州、明州、泉州也逐渐成为市舶中心。中国因此成为了最早发展出完备的外贸管理制度的国家。

广州的繁盛印证了中外海上交往的密切。在陕西省径阳县云阳镇发现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为我们证明了唐朝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流。碑文载主人公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还是贞元初年他作为唐王朝的聘国使航海前往远在中东的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杨良瑶从长安到岭南，自南海舍陆登舟，航海出行，在一年内便完成了外交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用和平方式宣扬唐王朝的政治主张。贞元四年（788 年）六月，杨良瑶因功被封为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唐代的大食国是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天宝十年（741 年）但逻斯战役后，基本划定了大唐、大食两国在中亚细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后双方经济贸易空前频繁。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年）八月大食国开始遣使节朝贡起，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 年）九月最后一次大食使节离唐回国，前

后 148 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 39 次之多。2005 年碑文的发现证明了唐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的历史。杨良瑶一行不仅要远早于郑和的盛举，更证明了当时唐朝开放的胸襟和远航的能力。①

① 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载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 6 月。

第三节　弱宋，科技与文化的发动机

说宋朝是古代中国的盛世，很多人可能不信。宋朝从来没有统一中国，而且积贫积弱，对外卑躬屈膝，内政昏暗，残害忠良。宋朝的历史更可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黑暗的历史。史书明确称之为“弱宋”。但是宋朝的确是古代中国的盛世，是中国对外交往的盛世时期。

宋朝开国时就立下的规矩，尊重读书人，不准杀一个读书人。因此，宋朝以文人领兵，以文人掌权。皇帝对自己深恶痛绝的文人也只能发配到岭南了事。不尚武功，强干弱枝造成了宋朝军事实力极弱，但却造成了宋朝科技文化的双重繁荣。正是因为宋朝的弱，财政不支，政府对商品经济采取了保护支持的态度。宋代的社会经济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正是因为宋朝的弱，偏安东南，客观上只能将精力放在海洋上，推动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

在宋朝士大夫乃至最高统治者中间产生了“义利双行”的思想，人们由传统的贱商抑末转向“通商惠工”。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开封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成为南宋的行在所后，逐渐发展成最大的商业城市。此外还有建康府 （今江苏南京）、鄂州 （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等商业中心。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

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为了逃避税收，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还是沿海，都相当兴盛。

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海外贸易看作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如宋神宗明确指出：南汉王朝的富强与发展海外贸易有关，“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为了“招来外夷”、“来海外之货”，宋灭南汉后即在广州沿袭唐制设置市舶司；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作为北宋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北宋对舶货实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规范后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也随之增加。“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①

南宋时期，国土大为缩小，用度不支，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来支持财政运转。南海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 20 多个国家。南宋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宋朝对进出口货物实行禁榷制度，并通过市舶“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赚取了巨额利润。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对外贸易的增多反过来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活跃了内地社会。绍兴七年（1137 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

① 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06 年 1 月。

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海外贸易利润既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统治者就将通货贸易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积极实施。绍兴十年（1140 年），宋高宗谕大臣曰：“广南市舶，利之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万络，皆宽民利也。”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南宋的年市舶收入高达 200 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估计，南宋初年财政总收入不到 1000 万络，而外贸收入约 150 万络，占总收入的 15% 左右。绍兴末年财政总收入达到 4500 万络左右，而外贸收入约 200 万络，占总收入的 4% 左右。

1000 年前的这些数据证明了疆域狭小的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从经济上看，宋朝的确是个盛世。这是建立在海外贸易繁盛基础上的盛世。

宋代也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宋时期，绚丽、辉煌的中华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通过各种途径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辐射和扩散。亚洲、欧洲乃至非洲国家都对宋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吸纳和受容。

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指南针在宋代又有重大进展，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开封府、杭州、眉山（今属四川）、建阳（今属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南宋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宋书印刷之精良使其成为了后世竞相收藏的珍品。宋廷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

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景德三年（1006 年）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元祐年间，

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水运仪象台。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庆元五年实行的《统天历》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383年。北宋中期贾宪发明“开方作法本源图”，世称“贾宪三角”，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600年；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约770年。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元丰五年（1082年），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种类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南宋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共15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北宋末陈勇在南宋初撰成《农书》，是综合性的农学著作。陈翥撰写的《桐谱》，蔡襄著《荔枝谱》，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庆历元年（1041年），喻皓在开封建成砖塔，其建筑方法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内的开元寺塔，于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又称瞭敌塔，高84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

在思想哲学领域，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心学。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大约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到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理学自明清后备受推崇，开始流传到周边国家，为外人所学习吸收。直至今日，宋理学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群体中仍保有强大的影响力。

宋朝强盛的科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传向东南亚、印度西亚和欧洲各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成为宋文化外辐射的第一波区域。在隋唐时期，三国大规模地引进了唐朝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律令制度、宗教文化和科学

技术。宋朝以频繁的交往和优越的文化发展巩固这些国家的对中华文化的吸收过程，为整体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极大贡献。

13 世纪初，高丽引进了宋朝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仿陶制活字铸成铜活字，使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印刷业的萌芽完全归功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启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献典籍的输入，使日本禅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样和形体而刻印各种书籍。越南在 13 世纪出现了印刷术，同样是对宋代印刷技术的移植。在建筑技术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禅宗式”建筑技术在日僧重源和荣西的引进下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播磨净土寺的净土堂、山城醍醐寺的经楼等，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宋代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在火药技术上，1377 年，高丽政府在中央“设火□都监，煎取焰硝”，不仅大量生产火药，还制造出火箭、火筒、火炮等 17 种火药武器，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医疗技术、天文历法等也相继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①

除了日本、朝鲜、越南三国，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些甚至还没有发展到国家阶段。宋朝依然平等与之交往，以先进文化滋润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萌芽，刺激了东方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宋朝文化外传的第三个波层是印度、西亚和欧洲地区。通过宋朝的努力，我国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和筹算方法以及人参、茯苓、当归等药物传入了印度，对印度数学、医药学的发展也发挥了良好作用。宋朝的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还传到了阿拉伯，并通过阿拉伯进入了北非和地中海地区。

以宋朝的罗盘为例。指南针是在 12 世纪初经南部海路传入欧洲的。欧洲人对中国罗盘稍加改进：一是用 32 分度代替了中国罗盘的 48 分度；二是采用支轴撑起磁针，使之具备现代指南针的雏形。指南针的应用，使欧洲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成功，无不归功于指南针

① 姚兆余：《宋代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的引导。

相较于科举制度，宋、元时期外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科技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二项重大政治贡献。中国先进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起初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政治性的。历史发展到近代后，中国科技发明的影响转入政治领域，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后，又被利用来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将中世纪的城堡和骑士阶层轰灭殆尽。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①

著名南宋诗人陆游在中外交往的盛世留下了许多歌颂海上交流的诗歌。他的《感惜》诗：

行年三十忆南游，
稳驾沧溟万斛舟。
当记早秋雷雨后，
柁师指点说流求。

他的《步出万里桥门至江山》诗：

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浪头。
一日新雨霹，微茫见流求。

这两首诗只是唐宋时期人们面向海洋，展现开放胸襟和对外交往气魄的众多诗词中的两首。我们后来人读起来，依然能感觉到宋朝衰落表象下的汹涌波涛。

①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格言第129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第四节　蒙古西征与大元帝国

12 世纪是东西方都在铁骑蹂躏下瑟瑟发抖的世纪：

有一支铁骑横扫了蒙古高原、黄河流域、中亚、波斯高原、阿拉伯帝国、俄罗斯，纵横东欧，饮马多瑙河和尼罗河，用钢铁长矛将不同的文明串联起来。它就是来自东方的上帝之鞭——蒙古骑兵！

当西亚、欧洲的青壮年在清真寺或教堂的钟声中，聚集在宗教旗帜下的时候，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甲胄鲜明，步兵盾阵和重装骑兵鱼贯而出，队形极其严密，方阵极其雄壮。这些继承古希腊重装步兵和古罗马步兵方阵传统的军队将对严谨的思维、高度集体性的要求坚持到了 12 世纪，发展出了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骑士们身着厚厚的锁子甲，只露出一双厉眼，以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手握长枪和长剑，疯狂追求杀伤力。这些全身披挂上百磅重甲的骑兵，驾驭着同样重装的纯种大马，在嘹亮的号角声中一齐平举长矛，以严整的方阵猛扑向前。任何一方大地都会在这样的方阵脚下颤抖。

进攻的远方，逐渐有零散的蒙古骑兵出现在视野之中……

相比之下，蒙古人丝毫不像正规军。这些东方的敌人骑着没有任何装甲的矮小的蒙古马，柔软的丝绸内衣外套着简单的牛皮，只携带简单的弓箭、短斧或单勾枪，有些甚至挥舞着简陋的木棍。只有少数几人穿戴着铠甲，行进在蒙古骑兵的前面。没有耀眼的旗帜，没有嘹亮的号角。

西方骑兵方阵加快了冲锋的速度。指挥官一面大声吆喝，严令

保持严整的冲锋队列。队列始终被西方军事界视为部队的生命所在；一面命令后方的弓弩手和标枪手开始放箭、投掷标枪。开始有蒙古骑兵中箭倒下，而蒙古军队发射的弓箭在方阵的重甲上乒乓作响，对西方骑兵毫无杀伤。

轻快的蒙古骑兵开始与方阵正面遭遇。散漫涌来的蒙古骑兵迅速分化为五人左右的横队，在极为宽广的正面发起了进攻。远处，大批的蒙古游骑四处做着西方人看来毫无意义的运动。骑兵方阵继续推进，损伤极小，只是一波又一波的蒙古冲击不断降低了方阵的速度。骑士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协调，有些方阵开始出现队列分错的痕迹。

四周的蒙古骑兵越来越多。依然没有号角、没有传令兵……

西方骑士的心头开始涌现不祥的预感。

突然，四周的蒙古骑兵呼啸起来，疯狂地向方阵突击。决战突发而至，蒙古人一般都倾巢出动，连护卫王族的怯薛军团也不例外，骑兵手执近战武器“穿凿而入，砍将夺旗”。过于讲究队形、正面的杀伤力和防护力几乎限制死了西方骑兵的战术机动能力。蒙古人避开方阵四周的矛阵，用强弓射杀马匹，用短斧砍劈和勾枪拖人下马。一个又一个骑兵方阵出现了缺口，开始溃退，就好像一头头大象陷入了狼群的围攻。笨重的骑兵摔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被长矛扎死，被马匹践踏而死……顷刻间，胜负易位，蒙古人取得了绝对胜利！这样的战例在钦察、在波斯、在匈牙利一再重演。

直到杀死除了战友之外的所有在场者，蒙古人才撤出战场。没有幸存者，没有人知道蒙古人的真正实力，只有恐怖的传说伴随着一条条淌满鲜血的河流扩散到西方。

历史上，蒙古帝国对外征战的总兵力从未超过 20 万，直接用于单个战役的兵力从未超过 10 万，却取得了杀戮超过自身数量 10 倍 20 倍敌人的辉煌战绩。机动性是蒙古人获胜的法宝。长途突袭、迂回作战、集中主力等战术开始出现于军事学界。蒙古骑兵往往携带一面皮制盾牌、一支长矛、数囊羽箭就去闯荡天涯。他们每人牵引着三四匹耐力极强的蒙古马，随时更换，以保持一天数百里的行

军速度；饿了就喝马奶，或者杀掠附近的居民点。这些蒙古勇士从三四岁始就被交给专门的军事教练，接受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是世界上素质最高的职业军人；军队只按十进位制简单组建，即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和万人队；千人队以下将领由下属军官士兵选举产生，官兵之间的指挥只用简单的小旗或响箭。指挥官被赋予了宽泛的自主权，不受繁琐的指挥。1224 年，蒙古名将哲别和速不台领军两万游荡在南俄草原侦察。他们主动捕捉战机，在哈尔卡河全歼了基辅大公米基斯拉夫的八万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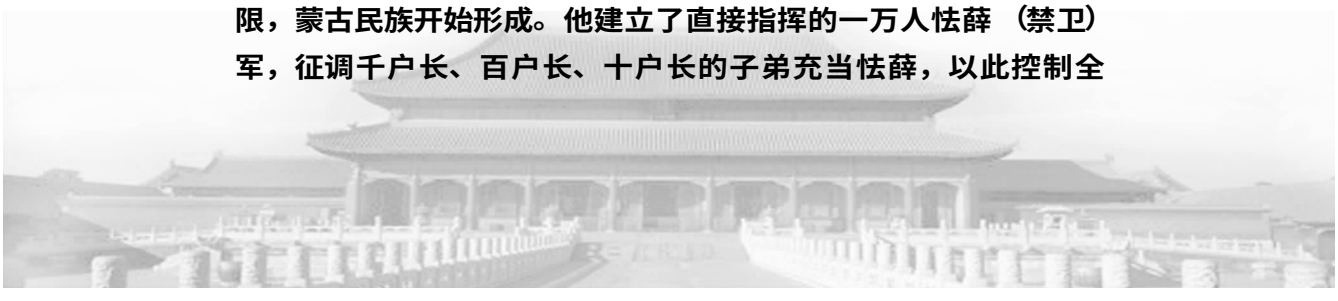
蒙古军队鄙视防御战，极少攻城。蒙古铁骑对固守的据点呼啸而过，将攻城的任务交给配备滑轮绞车、毒箭和火炮的汉族奴役军队。一旦破城，愤怒的蒙古军队会将城市变成死城、废墟，使城市周边成为荒漠。

谁能想到，震惊欧亚大陆，让无数国王贵胄屈膝投降的蒙古人 20 年前还处于周边民族女真的奴役之下。传说，蒙古人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起源于呼伦贝尔草原，几百年来像野狼一样分散在草原深处，过着原始游牧生活。这个逐水草而居的民族经常会为了争夺一片草场而爆发部族之间的战争。他们先后臣服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和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交纳繁重的贡赋，还不时地被周边的金、西夏等族掠为奴隶。

这样的局面顷刻之间就改变了，因为历史赐予了灾难深重的蒙古人一位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姓孛儿只斤，名铁木真，乞颜氏。元朝追谥太祖皇帝。铁木真 1162 年生，幼年丧父，少年时代经历艰难坎坷，历经多年征战，先后消灭了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等部，结束了蒙古高原部落林立，相互攻战杀伐不息的局面，于 1206 年建立大蒙古国，即汗位，尊号成吉思汗。

用武力统一了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之后，成吉思汗分封诸王，确立政治司法制度，统一文字，建立万户、千户制度，消泯部落界限，蒙古民族开始形成。他建立了直接指挥的一万人怯薛（禁卫）军，征调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控制全



国，作为政权的武力支柱。此时蒙古汗廷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草原贵族斡鲁朵，而成为了勃兴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这台军事机器开始急速运转，先后向西夏、西辽、金朝用兵。成吉思汗 1215 年攻占中都 （今北京），臣服高丽；1218 年灭西辽；1219 年至 1224 年间发动西征，深入俄罗斯和印度半岛，建立四大汗国；1227 年灭西夏；该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去世。

成吉思汗的戎马一生，灭国 40 有余，臣服 600 多部落民族，攻占欧亚大陆土地超过 3000 万平方公里，确立了蒙古诸国的基础。长子术赤，为钦察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 （元太宗）；第四子拖雷，后人为元代和伊利汗国皇室。

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时期，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他们以骠悍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地区，以疾风骤雨的形式确立了以蒙古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让之前和之后的东方帝国统治者都难以企及。

公元 1219 年，西域强国花剌子模袭杀蒙古商队及使者。蒙古铁骑远征的第一个拳头就落到了这个臃肿虚弱的帝国身上。

成吉思汗亲率 20 万大军西征，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随行。不到一年时间，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干沦陷 （1220），国家灭亡。西方失去了花剌子模帝国的屏障后，形势岌岌可危。蒙军长驱直入中亚。成吉思汗挥军追击花剌子模太子，深入印度河流域，大败花剌子模残部。速不台、哲别穷追花剌子模王室，西越高加索，深入俄罗斯。进军欧洲的蒙古军于 1223 年大败钦察和俄罗斯的联军，再进入顿河流域，同年在迦勒迦河与突厥和俄罗斯联军决战，大败之，将俄罗斯诸王公杀戮殆尽后班师回朝。

当中亚和俄罗斯的战况传到欧洲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后者太大的注意。蒙古人的轻骑突进战术并不是他们首创的。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执政官克拉苏率领四万大军征伐波斯，结果在卡莱战役中全军覆灭，他的对手就是使用轻骑兵战术的波斯帕提亚帝国。同样

使用轻骑兵战术的草原民族匈奴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扼守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独自应对亚洲游牧民族的侵袭，成为欧洲东南面的一道屏障。欧洲各国一直缺乏对游牧战术的认识。傲慢与疏忽使欧洲人在1234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该年，继承成吉思汗之位的元太宗窝阔台召集诸王大臣会议，继续西征。

这一次蒙古军队分兵攻打波斯、钦察和不里阿耳等部，很快基本上征服了波斯全境。但在钦察，蒙古军队遭到了顽强抵抗。1235年，窝阔台决定派军增援，由术赤之子拔都总领察合台之子拜答儿、窝阔台之子贵由、拖雷之子蒙哥以及诸王、那颜、驸马的长子前往参战。次年，蒙古大军会师西征。

闪耀的流星在这一刻划过历史的长空。在匈奴入侵欧洲8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再次碰撞。

公元1237年，大将速不台征服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耳后，蒙古诸军会攻钦察：蒙哥斩杀大将八赤蛮，里海以北地区被蒙古军队占领；拔都率军大举入侵俄罗斯，公元1237年底占领梁赞、莫斯科等14城；1238年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次年攻陷俄罗斯发源地基辅，灭亡俄罗斯诸国。公元1240年，蒙古军队进攻孛烈儿（波兰）、马扎尔（匈牙利），开始进入欧洲腹地。

当钦察大地狼烟四起之时，大量军民逃往中欧，被匈牙利收留。1241年拔都致信匈牙利国王贝拉，要求他不得接纳钦察人，否则兵戎相见。贝拉断然拒绝。大战迫在眉睫。贝拉明白匈牙利军队完全不足以抵挡蒙古军队攻入中欧，便派遣使者持血剑前往中欧各国，以上帝与欧洲的名义，恳请王公贵族们前来支援。匈牙利周边波兰、波西米亚、奥地利等国，以及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都纷纷出兵响应。

就这样，蒙古与欧洲大对决的战场选在了匈牙利！

2月，拔都率领七万大军离开南俄草原，杀向匈牙利。拔都以王子身份统帅大军，蒙古名将速不台掌握实际指挥权。此时已年过

60 的速不台是成吉思汗麾下的头号悍将，成名于蒙古征花喇子模之战，一生指挥 60 余场战役，从未失手。

这一次，速不台将蒙古大军分为三路，由拜答儿和窝阔台之孙海都领兵两万组成右翼，快速北上攻掠东普鲁士，兵锋直指波兰，目的是阻止贝拉的女婿波兰国王博列斯拉夫四世出兵；他和拔都亲率四万大军为中路，朝匈牙利缓慢前进；而窝阔台之子合丹领军一万在左翼策应。

右翼蒙古军在瓦尔斯塔特遭遇波兰联军主力，拉开了这次中欧大战的序幕。此战波兰联军阵亡 25000 人，蒙古人从阵亡的欧洲人头上割下的耳朵足足装了九大麻袋。波希米亚国王温塞斯拉得知瓦尔斯塔特战役的结局，立刻撤军回国，躲进城堡里据守。扫荡波兰后，拜答尔率右翼兵团南下，希望与拔都大军会师。遗憾的是，这支军队没有赶上决战。

4 月，蒙匈主力遭遇。匈牙利联军超过七万。蒙古中军会合左翼后，共五万人。10 日，拔都效仿成吉思汗登上高台，企求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腾格里的保佑，祷告了一天一夜。

1241 年 4 月 11 日清晨，号角四起。

蒙古大军在匈牙利大营南面几公里的地方涉渡绍约河，向匈牙利军队发动突然袭击。贝拉率七万大军在莫希平原面向南方列阵，以逸待劳。拔都率领两万骑兵迂回到西面攻击匈牙利阵营的右侧；速不台率领三万骑兵大幅度迂回，前往匈牙利大军的北面。匈牙利军队右侧遭受持续攻击。贝拉判明形式后，命令匈牙利阵营以右翼为轴心，整体向右旋转，企图包抄拔都的两万骑兵。这一机动战术是正确的，但是匈牙利骑兵方阵从来没有接受过高速运动中保持队形的训练，在移动过程中相互拥挤，方阵瓦解。就在匈牙利人乱成一团的时候，速不台的三万骑兵到达了北面攻击位置，抓住有利战机猛功。匈牙利阵营顿时土崩瓦解，四散奔逃。贝拉率领残军撤退到绍约河畔的营垒里负隅顽抗。

蒙古人获得了野战胜利。

蒙古大军随军招募了大量汉族工匠，携带着许多相当精巧的床

弩和投石器等攻城器械，拆卸后分装在马背上运输。他们用床弩向匈牙利人的大营发射火箭，用投石器将大量石头、盛满滚油的瓦罐、烟花爆竹等等抛掷到匈牙利人的头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匈牙利人惊恐万状。

速不台下令在包围圈西面角留出缺口，诱击匈牙利军队。当绝望的匈牙利骑兵发现这个缺口后，率先从缺口突围。开始，败军毫发无损地逃脱了。失去理智的匈牙利人于是争先恐后夺路而逃。当可怜的匈牙利人拥挤在缺口时，蒙古骑兵主力从两侧夹击溃兵。密集的箭雨笼罩了天空，中箭落马的匈牙利士兵被蒙古人用长矛和马刀一一了结。莫希平原之战，七万匈牙利大军只有不足一万人生还。匈牙利国王贝拉在卫队拼死保护下逃脱，被一路追击到克罗地亚，躲到一个海岛上方才保住性命。

波兰和匈牙利的溃败震惊了整个欧洲。当时蒙古的密探也深入德意志帝国和维也纳搜集情报。圣殿骑士团大首领阿尔芒写信给法国国王路易，提醒说中欧已经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可以阻挡蒙古铁骑直抵法国了。法国人联合奥地利人在多瑙河流域合军迎击蒙古大军。法国国王路易出兵前向王太后告别说，此次东征不是他们将蒙古人送进地狱，就是蒙古人把他们送进天堂。

路易和奥地利大公腓得烈忐忑不安地在多瑙河西岸严阵以待，但蒙古人始终没有来。

蒙古军队在匈牙利滞留了整整一年，忙于扑灭各地星星点点的抵抗力量，并攻掠了亚得里亚海东岸及南欧各地。年底，窝阔台的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军从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流域，最终以撒莱为都城，建立了钦察汗国。

12 年后，拖雷之子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远征，将矛头指向西亚。1253 年 10 月，旭烈兀率兵进入伊朗西部，进抵两河流域。

蒙古军携带大批石弩和火器，途经阿力麻里、撒马尔罕，到达波斯碣石城，目标首先指向了木剌夷国，告谕西亚诸王协同消灭木剌夷。1256 年，蒙古大军渡过阿姆河，到达木剌夷境内。蒙古先锋怯的不花初战即给予敌军沉重打击。木剌夷首领鲁克那丁在和战之

间迟疑不决。11 月，蒙古军队占领其都城阿剌模式堡，鲁克那丁被迫投降。1257 年初，鲁克那丁被蒙古军队杀死，他的族人也都被处死，木剌夷被完全平定。

1257 年 3 月，蒙古人继续西征，指向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当时阿巴斯王朝由哈里发谟思塔辛执政，既直接统治黑衣大食，又管辖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是两河流域的强国。该年冬，旭烈兀、拜住等率军三路围攻巴格达。蒙古军队用炮石攻打巴格达城，城门被炮火击毁。翌年 2 月，谟思塔辛率众投降。蒙古军队大掠巴格达七天，谟思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之后，蒙古兵进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

1260 年春，旭烈兀在叙利亚得知蒙哥死讯，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西进，自率大军东归。怯的不花军队的存在威胁着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存亡。埃及苏丹以伊斯兰“圣战”为号召，召集伊斯兰世界残存各国军力和北非各国军队，前进至巴勒斯坦地区与怯的不花军决战。留守的蒙古军仓促应战，加上急躁冒进，遭遇伊斯兰军重围。怯的不花阵亡，蒙古残军下马步战至全军覆没。蒙古的扩张至此达到顶点。

到达波斯的旭烈兀获悉忽必烈已继大汗位，遂不再东返蒙古，派使臣拥护忽必烈为大汗。忽必烈遣使传旨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密昔儿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大食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旭烈兀建立了又一个汗国：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是最后一个成立的蒙古汗国。在公元 1217 年至 1258 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分封了四大汗国：在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模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察合台汗国；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窝阔台汗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公国，建立钦察汗国；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的汗本是蒙古帝国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事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遗憾的是，蒙古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

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利的经济联系，因而使蒙古帝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和伊利两大汗国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窝阔台和他的儿子相继被选为大汗，窝阔台汗国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汗庭设在伊犁河上，在地理上与中原腹地及蒙古高原连成一体，在政治上也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蒙哥大汗即位后，在察合台汗国的别失八里等地设置尚书省，管辖范围从畏兀儿至河中诸地。察合台汗位的继承上也经常受到中央王朝的左右。它和窝阔台汗国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蒙古西征对世界的影响毕竟是短暂的，而四大汗国的存在使得东方对世界的影响持久而深远，成为了沟通东西的桥梁。

唐朝以后长时间民族之间连绵不绝的冲突、战争，阻断了丝绸之路，阻碍了东西的文化交流。然而，蒙古西征横扫欧亚大陆，消除了国界的限制，使得欧亚交通畅通无碍。“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当时，在蒙古帝国控制的广大地区中，有两个文明中心：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中心，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文明中心。这两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中心就似两台发动机，拉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多民族的汇集，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交融。例如在大不里士：“聚集着各种宗教、各种派别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学者和历史家，他们来自中国、华南、印度、克什米尔、西藏、维吾尔和其他突厥国家，还有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由于蒙古人在汗国中居于统治地位，加之他们来自中国并与蒙古大汗国保持一定联系，所以中国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很大。[①] 又比如蒙古人“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

① 滕海键：《蒙古西征与东方文化的西传》，载于《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5期。

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蒙古帝国重开陆上丝绸之路，教皇与各国君主在惶惶不安中不断派传教士出使蒙古帝国，以期了解帝国的动向，并力争将基督教推广于帝国之中。由此，罗马教廷、法国与蒙古帝国开始直接接触。以法国为例，法使东来开启了中法外交之门。①

战争和异族统治是需要谴责的，但它们客观上也极大促进了东方帝国文明的传播。蒙古帝国时，东西方医师和名工巧匠，常被相互调换，为统治者服务。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三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亚，进而传入欧洲的。

1294 年，蒙古人在波斯所建的伊利汗国的伊利汗为摆脱财政危机，开始用雕版印刷纸币。纸钞完全仿照元朝至元宝钞，上面除印有波斯文外，还印有汉文“钞”字。它使波斯人、阿拉伯人具体地接触到中国的纸钞和雕版印刷术，影响深远，至今在波斯语中仍称纸币为“钞”。在钦察蒙古汗国的政权机构中，有很多畏兀儿人担任文书雕刻工作，他们熟悉中国的活字雕版印刷术。一些俄罗斯人也在蒙古汗国宫中任职，他们通过畏兀儿人学会使用活字和雕版印刷，而后他们又把这种雕版印刷和制作活字的方法传至欧洲；中国的算盘也在钦察汗国时期传入俄罗斯。算盘是当时世界上最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元代已广泛使用，在元代文献中多处提到使用算盘珠。算盘在 14 世纪通过俄罗斯传入欧洲，直到 20 世纪初仍是这一地区简单的计算工具。在 1260 年，怯的不花军队为阿拉伯人所败，阿拉伯人也便获取了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所使用的火药技术，并将之传到欧洲。

东方文明通过蒙古通道对欧洲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当蒙古人入侵西方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末期。这是一个科学成为神学婢女的蒙昧时代。在教会的愚民统治下，欧洲人处于一种蒙昧自守的状态。蒙古西征迫使欧洲人来探究东方，关注他处，进而有利于打破宗教迷信。欧洲的封建制度和统治者遭受了蒙古的沉重打击，兼

① 鲜于浩、雷斌：《法国与丝绸之路》，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以当时教权和王权的斗争，开始出现了对欧洲传统观念的否定，出现了普通的人，而非宗教控制的人，他们会为自己思考。

蒙古大军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在战争中，火器给各国的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火器制造从此传到西方，促进了那里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以火药为代表的中国技术的作用到近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

谈到蒙古西征，除了上面的历史伟人和重大事件，还不得不说及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

传说，威尼斯商人尼柯罗·波罗与其弟马菲奥约于1265年抵上都见忽必烈，并被派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夏，兄弟两携尼柯罗的儿子马可，取道伊利汗国，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东归元朝复命，于1275年到达上都。马可·波罗此后侨居中国17年。

马可回国后写有《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占三分之一强。其中详细介绍了元朝的省份、制度和自己经历，尤其对北京、扬州、杭州等城市的描写细致而吸引人。

该书自问世后引发了700多年的争论。最大的争议是书的真实性，即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负面的证据有：1. 在现存的元朝史料中，没有马可这个人的蛛丝马迹。比如马可在游记中声称自己在扬州做过三年地方官，但是扬州县志上却找不到他的名字。2. 游记没有提到汉族文化中最能唤起外来人好奇心的独特风味——长城、中医、筷子、茶叶、毛笔字、缠足等。正面的解释有：1. 马可只在元朝担任低级官职，很难在王朝正史中留下名号。2. 马可的欣赏品位、兴趣点和现代人迥异。长城在元朝的重要性远远比上明朝，不像现在这般雄伟壮观；蒙古人不用中医，游记中就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忽必烈朝廷里的御医是个希腊人；马可在中国主要同统治阶级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交往，并且不会说汉语，远离汉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这样解释书中没有提到长城、筷子、茶叶、毛笔字、缠足等就顺理成章了。

必须承认的是，马可对亚洲和中国的很多描写是客观、准确的。19 世纪以来，人们公认此书在中世纪亚洲的地理、民族、风俗、物产、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对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的持续争议只是蒙古遗响中的一声。现代东西方对蒙古帝国的兴趣持续炽热。从西方人不惜巨款，动用 DNA 检测等高科技手段，证明自己具有成吉思汗血统到日本、蒙古各国联合搜索成吉思汗陵，不一而足。这是每一个世界帝国共有的遗风。

第五节　东方，永远的诱惑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16—17世纪时，在古老的中国除了出现了清王朝取代明王朝这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外，一切都似乎是那么的平静依旧，而在这块大陆的西面，却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历史变革。

这场变革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科学技术。这里的历史，最先登上了近代舞台。

与此同时，这场大变革对历来权倾一时的基督教教会也有极大的冲击，使传统的基督教分裂为新、旧两派。新教在北欧占据了优势地位，旧教则在南欧进行了“革新”。改革的结果是，旧教改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配合资本主义在全球殖民扩张，向亚洲、美洲派出传教士去进行先期活动。

这种先期活动，实质上就是思想扩张，是为经济与政治扩张所作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西方传教士们到亚洲、美洲国家与地区活动的背景与目的。

为此，传教士们每去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前，都要针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作一些准备工作，准备一些能够尽快切入的“敲门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大国，特别是思想上封闭性极强，单靠宣传“上帝”、“耶稣”是很难取得

较好效果的，不能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①] 因此，他们把科学技术作为了“敲门砖”。

于是，就有了传教士的来华，随着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外交流的高潮。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较之以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快发展。后来，罗马教皇颁布命旨，不准中国教徒敬天、祭孔、祭祖；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又干涉中国内政。1723 年，雍正帝下令禁止传教。西学东渐的势头衰落下来。

最早来到中国的，是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金尼阁等人。他们在来华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

当传教士们举着西方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叩击中国的大门时，特别是当这块“敲门砖”将影响到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命运时，国人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抉择呢？

就统治者而言，大多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能够接受如制历、建造天文仪器、帮助制作枪炮火器等等行为，但对科学技术在本质上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

在明清的统治者中，康熙皇帝是对西学最欣赏的一位。在他亲政以后，首先解决了杨光先等弹劾汤若望而使汤若望入狱的事件。接着，任用南怀仁督造西式大炮以镇压吴三桂之乱，并且让南怀仁建造新的西式天文仪器。南怀仁去世后，又任用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为翻译，参与中俄边界谈判。还让白晋回国聘请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在他晚年，任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主持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全国测量与最大的地图绘制，成就斐然。他还指示张诚、白晋等编译了《数理精蕴》（最终由梅毂成等编定）这部大型的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对我国数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相传这位皇帝自己也曾亲身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亲自进行计算与测量。[②]

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依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有利于学习西

---

① 卓怀国，林建明：《浅谈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传教与西学东渐》，载于《历史学习》2005 年第 8 期。

② 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载于《南开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方科学知识的政策举措，科举的内容与形式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说明统治者并不真正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

其他的皇帝，当然就更远远不如了。

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包括为官的与民间的）来说，在这股潮流面前，大致有这样四种态度与抉择：

一是坚决反对，全然排斥。如明末清初的冷守中、魏文魁、杨光先等人，或是著文反对，或是上疏弹劾。他们之所以反对，最根本的是由于儒家的道统立场与民族狭隘心理在起作用。

二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如乾嘉学派及许多人士都是如此，人数较多。构成这一人群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想欢迎却又不敢，有的是想反对却又缺乏过硬的理由，有的是怕惹麻烦，有的是不屑一顾，原因很多，表现却基本一致。

三是兼收并蓄，中西贯通。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清初的天文学家王锡阐与数学家梅文鼎。这两位历来被公认为是中西贯通做得最好的，确实，他们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立场是有偏颇的，成绩是有限的。这两位的民族自尊心与儒家道统思想极其强烈，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最发达，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如此，梅文鼎甚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中国派生出来的。因此，他们都主张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思想上的这种深层次原因外，与他们当时所见到的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也有关系。如他们见到的西方天文学，还只是第谷的小轮体系，确实并不比浑天说高明多少。如果他们接触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四是弃旧迎新，全盘西化。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传教士合译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①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总的来说，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生根发芽，只是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时才得以传播。它的影响面只涉及了精确历法的修订、对全国版图进行测绘、制造先进的军用火器，以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的制造等，对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整体上没有什么触动，有的甚至遭到严厉的抵制。比如，杨光先强烈地反对推行汤若望主持的新历法，理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只有历法和算学有个别例外。历学家王锡阐（1628—1682 年）和算学家梅文鼎（1633—1721 年）注意吸取西学的长处，在历算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心态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排斥得厉害。他们或者认为西学在我国古已有之，只是后来失传，或者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或者认为西学实际上源于中学，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这些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科学家都不能例外。

但是这不能抹煞掉传教士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传教士东来中国，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著书出版、兴学从教、设医诊病，直接参与了众多文化事业，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中国从传统步入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除了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之外，还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阔了中国人对于世界认识的视野。同样他们也把中国文明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西方文化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在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向中国人播撒了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种子。当他们在自觉地承担西学东渐职责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中学西渐的传媒。他们或写信，或著述，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传回了西方。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书简和专著中，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①] 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西方

① 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载于《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人才惊讶地发现“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①

一般史著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欧洲人知道这种考试制度大约是16世纪末，传教士利马窦向教会送去的报告书中已详细地记录了科举制度，对这种考试原则，当时欧洲人根本不知道”。② 后来曾德昭传教士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大体说来，16—18世纪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科举制情况，尽管有些介绍难免肤浅和感性，但大多能做到客观、公正。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尽管是零星、表面、片断的，但是，正是这些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文字记载，激起了广大西方人士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好奇和向往。这种好奇和向往，恰恰成为了西学东渐、中学西渐的催化剂和动力。他们的这种介绍是出于对当时欧洲各国普遍通行的选官制度——君主恩赐制的不满，并都对中国的这种含有竞争原则的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人才的选官制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正是通过他们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肯定和赞扬，才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建立公开考试来选拔行政性公职人员的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资借鉴的异域文化参照物。美国学者卜德在评论法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时说：“法国人对中国的热情在1789年大革命后逐渐消失了，但科举制仍然是他们从中国学来的一项重要遗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才很自信地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根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③

其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文化事业也为西方了解中国开

---

① （德）来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陈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③ 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载于《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启了一扇窗口，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于 1832 年 5 月 1 日创办了《中国丛报》。《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 1836 年发行的 515 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 200 本，马尼拉 15 本，夏威夷 13 本，新加坡 18 本，马六甲 6 本，槟榔屿 6 本，巴达维亚 21 本，暹罗 4 本，悉尼及南威尔斯 6 本，缅甸 3 本，孟加拉，尼泊尔 7 本，锡兰 2 本，孟买 11 本，南非开普敦 4 本，汉堡 5 本，英国 40 本，美国 154 本。可见销售区域之广泛。《中国丛报》是在华西方人的讨论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传媒。西方人正是从《中国丛报》上知道了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知道了鸦片战争的进程。它刊登的部分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 1837 年 8 月 5 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价值。①

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传播基督教的目的，选择了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要使人们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件易事。在传教士的眼里，欲归化中国，科学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于是传教士在传入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把中国科学技术介绍到欧洲，并经过欧洲的消化吸收后，获得了创新和发展。比如西方传教士的先锋——利玛窦来华后，在传播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同时，记述了他在华的所见所闻，写成《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在这部著作中，利氏对中国科学有许多描述，成为 17 世纪欧洲人讨论中国科学的取材内容。此外，中国的天文学，植物学和中医也通过他们传到了西方，进一步打开了欧洲的眼界，同时也成了欧洲科学家寻求知识的丰富源泉。

---

① 张施娟：《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 年第 2 期。

除了这些之外，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实现了西方与东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掀起了西方的“东方热”，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西方人来说，对神秘的东方产生兴趣源于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神奇的东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被介绍到西方去，并且产生巨大影响。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他的身份是传教士，也就是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但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竟然那么大，生活那么丰富奇特，于是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作为游记体裁的汉学研究的代表作，《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门。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始于1583年，众多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们开启了所谓的“传教士时期”。

应该说，从传教士一进入中国大陆开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交流，就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积极行为。中国文化为西方所了解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成为一种双向的交流。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方传教士准备带着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到中国这块“蛮荒”之地来“教化”尚未开化的“蛮民”，最初的动机是到中国来施行“文化统治”的。结果发现，东方的文明和东方的经验对人类发展的借鉴意义并不亚于西方。更有意思的是，这批传教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变成了“中国通”，回到西方后成为汉学专家，成为最早传播中国文化的人。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中国要求变革的近代，充分说明多元文化的多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参照和对比之中，传教士们以及后来的汉学家们，总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展现中国民族特性、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构架方面，用欣赏的而不是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这个文化构架。他们在文化比照中震惊地发现，在西方文化之外居然还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并且在生生不息地运作。从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读来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西方汉学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他们所感受的时代割裂开来，

而是用这个文化体系的有效运作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长久性。西方汉学这种重视社会实践的品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汉学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学术的性质。当这些传教士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了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国力强于欧洲，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驻华耶稣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态度，直接影响欧洲文化乃至各国君主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 200 年的中国热。①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儒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中国的儒教思想、风化习尚、典章制度均出自于中国古文献，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译中国古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之径，从而调和中国古代经书和天主教教义，最后达到传教的目的。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将儒家典籍等中国古文献翻译成西文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文献的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西方汉学家较早关注的是《周易》和孔子的学说。这是因为《周易》注重事物变化的宇宙观和辩证法，对于一贯强调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的西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而孔子思想体系中关于建立道德文化秩序和人际网络秩序对于世界和平也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意义。德国传教士卫礼贤 1899 年来到中国，回国后，他于 1924 年出版了《易经》的德译本。1924 年至 1929 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开设了关于《易经》的讲座，题目分别是：《对立与友谊的政治学》、《艺术精神》、《变化中的恒定》以及《中

① 朱易安：《在汉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载于《解放军日报》。

国人关于死的概念》等。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卫礼贤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西方汉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卫礼贤的儿子韦德明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周易》专家，著有《易经八讲》及《〈易经〉中的天地人》。西方汉学家认为，《周易》与数字的关系启发了莱布尼兹等欧洲思想家寻求美与和谐，并认为数字有助于为人类世界带来秩序。①

而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是双方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然而过去人们往往只瞩目于传教士展示给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忽略了传教士西撒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其实，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文化上的影响也总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既存在着“西学东渐”，也有过“中学西渡”。接触、碰撞、排斥、选择、改造、吸收、补充、交融……中西双方的文化在彼此的交流中，在相互的影响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我们不应否认，耳濡目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18 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艺术，还导致了在 17、18 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的服饰、工业乃至园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观都引起了对这个文明古国抱有好奇心的欧洲人的兴趣。西方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国艺术。整个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织等工艺品传到欧洲后风靡一时，甚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人在 1667 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国装，化装成中国人。中国趣味不但流行欧洲宫廷，而且走向十字街头，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风尚。18 世纪初，上层的欧洲人以中国筵席宴请宾客为荣，欧洲宫廷贵妇则整天不离中

① 参见《在汉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见 www. sf108. com，2006 年 10 月 18 日。

国折扇，并且此时的欧洲还兴起了园林中国化运动。德、法等国在风景园中仿建中国化的宝塔与榭台楼阁，垒起了假山，种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国服饰陶瓷等物品上中国画影响的西方风景画家，如华笃、拉摩脱、高博等人，向社会奉献了以中国手法画的新作。“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了人们普遍的崇尚，以优美、轻倩、生动、自然为特色的“洛可可风格”，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洛可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唤起了欧洲一般社会在一种假想中快乐的人生观，给欧洲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不管怎样，18 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洛可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文学宝藏，诗歌、词赋、戏曲、小说等各类文学题材丰富多彩，内容详尽而完备。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激发了欧洲文学家的想像力，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文学灵感，并得以寻求到新的题材，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物。

不管是对于传教士还是普通的西方人而言，东方尤其中国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意味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无穷的诱惑，于是他们来了，在这个时代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世界带去了中国，也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的曙光。

① 谭建华：《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学西渡》，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五章 主导东亚，中国营造牢固的朝贡体系

中国是东亚大国，长期以来在本地区处于国力和文明的优势地位。古代中央王朝对世界的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发生地是东亚地区。中国长期营造了牢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刚逝世的何芳川先生冠之以“华夷秩序”的名称。他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的《“华夷秩序”论》一文纵横古今，将中国营造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梳理得异常清晰，并做出了至今依然难以超越，已然成为“公理”的基本判断。

秦的统一为国际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汉代的强盛在中华与四邻之间开始发展起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雏形。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东亚国际秩序正式形成。在文昌国弱的宋代，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东亚古代国际秩序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内容上都达到了顶峰。此后国运衰微，加上列强入侵，东亚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崩溃。当八国联军的铁骑踏进紫禁城的时候，华夷秩序正式寿终正寝。

第一节　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

前面的讨论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进而产生世界影响。世界观决定外交，决定国际秩序。那么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可以用“天下观念”来概括。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至今，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依然用“天下”一词代指中国人视野中的全世界。中国人所规划的“天下”，中国居天下之中，为一国独尊，四周为蛮夷之人，未施王化。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天下大一统，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帝国和天生的圣人——皇帝。皇帝和天朝上国应施王化于蛮夷，追求一统华夷。这是一个以中国代世界，相对封闭愚昧的世界观，统治中国人头脑的历史比王朝的历史都要漫长。

天下观念起源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诸族同周边的其他族体之间存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华夏诸族自信于自身的发展程度与优势，坚持夷夏大防，同时希望以夏变夷，将华夏族的优势辐射向周边，实现天下大同。之后，华夏诸族与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周边民族的各方面优势一直保持到了近代，天下观念与“一统华夷”的愿望也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之中。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现实

为天下观念的强化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开始统治中国人的思想2000多年。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将天下观念与“天”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思想里的“天”是封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是世间道德的仲裁者，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所在。“天”强大到了排挤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在社会上存在空间的地步。中国因此一直没有出现西方近代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思想解放。“天下观念”从“天”的概念里演化而来，也被后者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备受尊崇的儒家思想确保了天下观念的实践。

原始状态的“华夷分野”观念，是在上古时期华夏诸族与其他民族不断对立、冲突但又存在交流的情况下提出的。和许多正在形成的民族一样，当时的华夏族要维护自身血统纯净，强化民族意识，达到“夷不谋华，夷不乱夏”。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取得了对于周边民族的绝对发展优势后，中华民族并未作茧自缚、消极保守，而是源源不断地向四周传播自身的先进文明，有的朝代还强调“天下一家”、“中外一体”的统治思想。“天下观念”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但绝不包含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思想。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农业社会的物质现实为“天下观念”深入人心提供了客观基础。农业社会的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农业生活的安定环境问题，希望风调雨顺，更希望社会安定，没有外患。它必然导致对一种统一安宁的社会秩序的呼唤。同时，儒家思想本身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就要为这一社会服务。所以，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国农业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紧密相连的。中央王朝营造国际秩序的目的是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黄枝连先生的“天朝礼治体系”认为“是内部施行礼治体系的小农国家在外事活动上的一种宏观取向”；何芳川先生也认为农业社会对稳定的需求深刻地反映在了“华夷秩序”上，农业文明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基础。

无论是在普通百姓，还是在统治者脑海中，天下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跃升为最高统治者的例子。他做流民的时候，没有接受过教育，更没有人向他教导灌输天下观念。但是他的建元告示就明确宣布："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无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奠安华夏，复我国之旧疆。朕为臣民爱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告之。"（《明实录》卷71）可见传统世界观的社会扩散是潜移默化的。即使是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乐于接受天下观念。满清王朝在维持大一统国内政治的同时牢固继承了天下观念和一统华夷的外交思想。但是它面临着如何处理自己"夷"的地位的尴尬问题。康熙皇帝就巧妙运用政治思想中的"天命转移"和天下大同思想，将自己置换到中央核心地位。康熙皇帝通晓满文，坚持满族统治，但这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汉族世界观，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的东亚国际秩序。

天下观念中的"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和"一统华夷"的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代中央王朝都试图在"天下"营造华夷一统的国际秩序：建立中华王朝的绝对国际权威，以国内政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礼为国际交往原则，以儒家思想教化万邦，一统华夷。"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①

在实践中，历史开了个"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玩笑。出于安全环境的考虑，历史上中国将对外关系的营造重心放在了疆域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北部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秦汉有匈奴，隋唐有突厥，宋后契丹、女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真、蒙古和满洲相继称霸北方。虽然中华帝国向西北推行华夷秩序一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蒙古高原、西北、中亚贫瘠绝远，游牧军队强悍，加上安息帝国、阿拉伯帝国也与中华帝国在此竞争，恒逻斯一战，唐军高仙芝部被阿拉伯军击溃。中国势力从此退出中亚向东收缩。此后，除了元朝，历代中央王朝都对西北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略。中国在北方和西北地区一直没有营造出稳定的国际秩序。在东南方，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影响稳步增长，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渐建立。

尽管曾经出现过像丝绸之路等少数时期的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主要部分和重点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古代的多数双边外交活动也集中在这些地区。笔者将这一国际秩序称为“朝贡秩序”。古代东亚的外交风云就是在朝贡秩序营造的“朝贡体系”内展开的。

第二节　虔事天朝，万邦朝贡

针对在古代东亚地区，中国主导建立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些学者称之为“朝贡体系”或者“朝贡制度”（tributary system）；有的冠之以“册封——朝贡制度”（investiture tributary system）的名称。相对宽泛的说法是之前的“华夷秩序体系”和“天朝礼治体系”。朝贡册封无疑是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最明显的特征。现有的研究模式与思路都或多或少地围绕着朝贡制度进行。因此，笔者选取了朝贡体系的名称。

对于朝贡体系的争论由来已久。穿越历史的迷雾，淡化学者们的口水战，拨开朝贡的层层面纱，我们逐渐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首先，中国在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承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并向中国纳贡是与中国交往的前提。中国历史上的官修史书也一概将周边各国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友好往来事例记作“朝贡”。事实上，一些国家向中国派遣使者并不见得全都是臣服朝贡。尤其是波斯、阿拉伯和罗马等强国和中国的外交往来，更多的是当时世界强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所有的“觐”、“献”、“恭敬”等语，更多的是史官的心理作用。但是从现实角度说，这一体系反映了当时国际力量对比状况，各方的和平外交往来基本是自愿互利的。承平时期的朝贡秩序笼罩在浓厚的礼治氛围中，实力因素的现实作用不甚明显。当中华帝国逐渐丧失相对优势之时，实力作用的脉络就非常清晰。尽管和传统史官一样，我们也不愿意承认国家实力在朝贡体系中的根本性作用，但是这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朝贡体系是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孔子讲“一统华夷”，“修文德服远人”；孟子讲“王道”，认为“仁者无敌”。朝贡体系从儒家的“礼”、“德”出发，礼仪规范，在国际交往中讲究“和为贵”。如《皇明祖训》训诫：“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的儒礼是古代东亚地区交往的准则。我们之后会发现，朝贡体系发展出了一套内容庞杂、程序繁琐的外交礼仪，笼罩在一片和睦机械的儒家气息中。

再次，读者可能会问，周边各国为什么自愿积极地加入这一体系？从政治方面考虑，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各国进贡中国时多言：一些恃强凌弱的国家知道小国‘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庶不敢欺凌’。显然，各国请求中国的册封，是把中国当作它们的政治保护伞，同时，在稳定各国政局中也能起决定性的作用。”① 黄枝连先生就认为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在正常情况下，不但是对于中国本身，还要对它的“藩属”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使它（们）的礼治主义的社会文化系统可以不遭受到袭击或压迫。第二，成化十五年（1479 年），琉球尚真王的谢恩奏折称：“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贡者，实欲依中华眷顾之恩，杜他国窥伺之患。乞如旧制，令臣一年一贡，以保海邦。”② 中国的册封是藩属确定国内权威的支柱力量之一，同时中国在立法、历法、制度等方面都可以对国内政治起到统一作用。简单地说，加入这一体系的他国目的有二：一求御外，一为安内。

从经济方面考虑，以朝贡形式展开的双方经贸活动能带来双赢的局面，为各国所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比如福州在元朝时还是一座普通城市，实力、地位远远落后于同省的泉州，明清将之作为专门对琉球贸易的关口，使之迅速繁华起来。在书中，朝贡贸易将会是笔者重要介绍的内容。

---

① 谢必震，《明清士大夫与琉球》，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2 期。

② 《中山世谱》卷六，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 85 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

第四，东亚的朝贡体系包括那些国家？这些国家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将东亚朝贡体系的成员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看作是一个辐射同心圆。通常中央政府居于圆心，从内到外分别为中国内地，土司土官，边区（蒙古各部，西北各族，西藏等），藩属（朝鲜，苏禄，越南，马六甲等），关系国（与中国有贸易或外交关系的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荷兰，伊斯兰国家等）。朝贡体系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了中国境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前三个圈全是中国的领土。以清朝为例，“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清朝理藩院发展为我国历史上最完善的中央治边机构。[①] “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后来又加了俄罗斯）；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②]

作为对朝贡体系的总结，我们不能否认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性。一统华夷的“一”，即由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和边疆各族不平等的基础上。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社会经济、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

也许这样的描述是抽象乏味的，读者诸君最关心的是朝贡的具体内容。人们的脑海中，对于朝贡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飘扬的“贡”旗和繁琐的礼仪。一次完整的朝贡就是在喜气喧闹的迎来送往中完成的。

在实际操作中，朝贡由礼部负责，被作为一项政治礼节来完成。礼，在中华帝国的政治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在国际政治中，礼已经演化为了国际准则。中国用礼来营造和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形象与地位，强化朝贡关系，强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康熙年间，朝廷也以俄罗斯使臣“不知礼”，将之驱

① 马汝珩：《清代西部历史论衡》，第83页。
② ［清］《清史稿·志六十六·礼十》。

逐。在近代中西交往中，固守天朝礼仪成为了中国坚持天朝上国迷梦的最后防线。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系中的礼仪高度重视、绝不马虎。

1. 册封过程

藩属世子服丧期满都会遣使赴中国请求册封。清朝即会派遣册封正副使前往册封。以册封琉球为例。册封使一行从北京出发，首先到达福建待命，等待御冠船的竣工和物资的齐备，同时也寻找适当的气候条件。古代中国船队的远航能力有限，季风在中琉两国的航运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船队之所以不沿着纬度从浙江东行至琉球，而南下福州再海路北上就是要利用夏季的南风漂行到琉球。返程则需要等待秋冬季的北风。这一等通常要一年有余甚至更多。随后，福建官员即在福州城南门举行饯行仪式，举行拜天的祭典。一切准备妥当后，使团一行 500 多人扬帆出海，向琉球进发。

从福州到那霸的行程视天气情况而定，时日长短不同，一般需要十数日。使团的海上航路大致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到达姑米山。

登陆后，正副使手拿诏敕，前往“迎恩亭”；琉球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数十人在迎恩亭拜迎。正使将诏敕放在龙亭中，众官行五拜三叩之礼。礼毕，一行人恭送册封使团前往距港口约五里、准备停当的天使馆歇息。满城聚观，欢声雷动。

中国使团居住的天使馆专门为接待册封使而设：内设总理馆内诸事的馆务司、管理馆内用品的承应司、负责肉食供应的掌牲司、负责与册封使从员之贸易的评价司、供应食物的供应司、负责安排宴席的理宴司和处理文书工作的书简司，称为支应七司。每司有红帕秀才一人，杂役多人。

20 多天之后，琉球世子、大臣陪同使团一行前往先王庙谕祭先君，宣读祭文，然后将祭文副本投入惜字炉焚烧。琉球君臣行三跪九叩之礼，谕祭之礼结束。

谕祭之后，择吉日举行册封之仪。册封仪式在王城首里城的正殿前举行。当日，天使馆通往首里城的路上，彩旗飘扬；册封使携带着龙亭（装有册封诏书等文书的轿子）和彩亭（放置赐品等物）一路前往首里城。首里城的大门撤下平日的“首里”二字匾，悬挂“守礼之邦”的牌匾；琉球世子要在大门口跪迎天使。

直入王宫，将龙亭置于阙庭之上。礼乐齐鸣，世子登上阙庭，焚香伏拜，旋下台与群臣对龙庭行三跪九叩之礼，称为“拜诏礼”。礼成，宣读官宣读册封诏书，君臣人等伏听。宣读完毕，世子再行三跪九叩之礼，称为“谢封礼”。接着，册封使呈上中国皇帝的赏赐。琉球世子获得郡王级别的赐品，包括郡王衣冠、皮服、彩币等物。世子接过礼物，转交三司官安放桌上，再三跪九叩，称为“谢赐礼”。

世子朗声问道：“圣躬万福乎？”册封使答：“圣躬万福！”

琉球世子再次三跪九叩，称为“问安礼”。随后，世子接受册封之诏，最后一次三跪九叩，称为“谢恩礼”。场面肃穆。册封仪式就此结束。有时，中华王朝还有颁布给王妃的谕旨和赐品。王妃便在琉球王受封后，伏跪听旨，三拜九叩，再由琉球王转为收受赐物。从使团入住天使馆起，册封仪式为期 100 多天。

入秋，册封使才扬帆返国。滞琉之时，使节遍访琉球山河，考察文物制度，交识琉球通文墨者，留下了许多原始资料。琉球君臣恭敬如故，琉球王每三天遣大臣至天使馆问候。秋季使团在琉球逗留期间，琉球世子会七宴款待，分别是迎风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和登舟宴。“王宴使臣，每次必以金为馈”。[①] 每宴必以乐队、歌、舞、戏等助兴。使团返国时，通常是琉球王率重臣跪送，离情感人。

天使馆使用少，闲置多，修葺费用高昂。琉球世子都要等馆舍修缮完毕后，而不会实时遣使求封。服丧期的存在、福建船队的修造、馆舍的修缮通常使册封仪式在世子即位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举

① ［明］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77 年版。

行。历史上有数位琉球世子由于在位时间短，尚未接受册封或册封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如尚忠王、尚思达王、尚成王等。

2. 朝贡过程

中国相应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接待贡使的礼制，不断修订、改进和完善。为了体现礼仪之邦、泱泱大国的形象，中国不惜催发官吏，耗用重资，征动民力。

还是以清朝琉球为例。琉球朝贡使团以耳目官、正议大夫充正副使；琉球官伴、水梢等看守贡船。贡船到达福建港口后，申报、停泊、检查、封仓、会盘、验看、勘合；中方迎贡物、行李、官员人等入琉球馆（柔远驿）。琉球馆不仅接待琉球贡使、通事等官员人等，也是琉球商人、船员、难民等在福州的食宿馆驿。随着中琉交往日增，琉球馆接待之人日众，馆舍自康熙朝后多有增建、修缮。琉球人在琉球馆中，研读经书，吟诗作对，甚至聘师学艺。琉球使节、大儒程顺则就留有《河口柔远驿记》的诗篇。琉球使团居琉球馆期间，福州地方按150名廪给，招待殷勤，多安排接风饯行的宴席及犒赏。

闽海关官员实情上奏，请照例对琉球贡船免税。福建巡抚便向朝廷申报琉球入贡消息。清帝允准使团觐见，回旨发到福州。福建巡抚按旧例，出给使臣咨批，并委员（一般为五品上下文官）护送贡使及贡物进京。陆地路程大致是福州——清湖——杭州——苏州——扬州——淮安——张家湾——京师。清廷规定："外藩遣使进贡入关后，即使该使臣赶紧起程并有伴送官沿途照料妥速行走，务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到京以符定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让进贡使在元旦之日参加"随班朝会"的盛典，让他们能亲自朝觐皇上，以睹"龙颜"；同时出席皇帝的盛大招待宴会，这既是清政府对"属国"使者的一种高规格的接待，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属国"的友好态度。若琉球贡使未能依限抵京，福建伴送官员将受到查处。清朝有多名官员因为伴送延期而受到降级等处分。

贡使来京，入住会同馆。会同馆是使团在京的主要活动场所。① 会同馆大使根据福建督抚的报文，查点核实使团人数，由提督官具文呈报礼部；贡使所携之琉球国表文章奏，由“提督官于到馆次日，率贡使赍至本部，呈堂公同拆阅”。进表的日期、程序、礼节和仪式，由礼部仪制清吏司向皇帝具题报告，等待清帝旨意。使团入住，会同馆即着手协调、安顿使团在北京的日常事宜。贡使主要由礼部承担接待，户部、兵部、工部、内务府等部衙分别配合承担财务报销、安全保卫、馆舍修缮、后勤保障等项工作。

使臣要携带表文、方物，由会同四译馆卿率领来到礼部。中方“侍郎一人出立案左，仪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馆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正使举表，馆卿祗受，以授侍郎，陈案上，复位。使臣等行三跪九叩礼，兴。退，馆卿率之出。礼部官送表内阁俟命，贡物纳所司”。②

贡使在京事务紧张，纳贡，习礼，觐见，领赏，筵宴。其中的重头戏为觐见皇帝。“届日帝御殿，礼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乃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赐座、赐茶，均随大臣跪叩，饮毕，慰问传答如初。出朝所，赐尚方饮食，退。翼日赴午门外谢恩。”“礼部疏请颁赐国王并燕赍贡使，既得旨，所司陈赐物午门道左，馆卿率贡使等东面立，侍郎西面立，有司咸序。贡使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颁赐物授贡使，贡使跪受。以次颁赐贡使暨从官从人，咸跪受。”

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不拘期日。正副使通常还要被皇帝诏对，赴国子监瞻孔等。觐见皇帝、参加朝贺典礼以及接受皇帝颁赏的物品等活动，使团均由提督官负责导引。贸易毕，琉球使团收拾行囊准备返程。兵部颁给使团关防。会同馆将“采买销

① 会同馆活动引自《大清会典》，转自《清代琉球贡使居京馆舍研究》。
② 以下朝贡礼引文皆转自［清］《清史稿·志六十六·礼十》。

算”等一切“支销事宜”钤盖“礼部会同馆监督关防”，“造册送主客清吏司咨户部核销”。

使团返程“所经省会皆飨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馆饩日给，概从周渥焉”。到目的地，由地方出面筵宴一次。此时已是第二年，琉球国派出接贡船。“等到七、八月，只留一位存留通事跟随几个人在那里看守驿馆，其余各官人等都上接贡船回国；读书与学官话那些人爱回来不回来，这个都随他的便，是不拘的。”

朝贡礼仪繁琐，虚礼甚多。至今故宫博物院内还留有“习礼亭”，为贡使学习朝贡礼节之地。传统中国礼仪、宗教、法律和道德密切联系，混淆不清。这一套封建礼仪牵连着中国的封建政治文明，贡使在习礼亭学的不仅是对中华帝国的敬服，也深入了解了中华文明深邃的内涵。“从而通过这一路叩拜，使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大大加强了向化之心。”①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 6 期。

第三节　蕞尔小国，琉球为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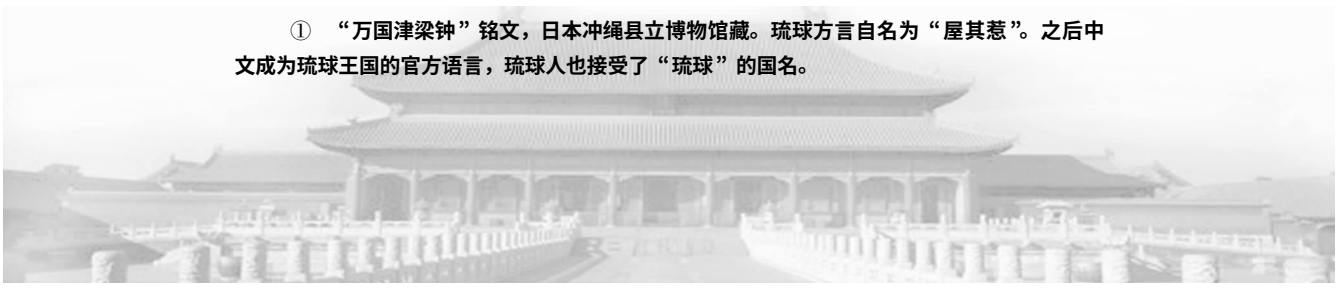
朝贡仅仅是整个国际秩序的表面部分而已。体系内部的双边关系要丰富深刻得多。在朝鲜、安南、暹罗、马六甲等藩属国中，琉球是其中默默无闻而又特殊的成员。

琉球，这个散落在浩瀚东海上的陌生古国，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着浓郁的神秘感。“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① 古琉球国三山六六岛，远近环列。大隅诸岛、吐噶喇列岛、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有如珍珠洒落在太平洋西域，组成了现在的琉球群岛。琉球国地域与其大致相符，大于今天日本之冲绳县。隋将朱宽访求异国，遥望群岛，蜿蜒盘旋，“若虬浮水中”，名之“琉虬”。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的避讳，“琉虬”逐渐演化为“琉球”。琉球在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与中国关系密切，是海外诸国入朝修贡最为频繁的国家。中国赞之为“其虔事天朝，为外藩之最”；“恪尽藩守”，“恭顺可嘉”之语不绝于诏。

明洪武五年（1372 年），明太祖遣使行人杨载，携带对外通聘诏书前往琉球。琉球中山王察度，山北王攀安知先后受其诏，奉表称臣。从此，中国与琉球开始了长达 500 余年的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关系。琉球国随之被深深打上了中国烙印。

---

① “万国津梁钟”铭文，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藏。琉球方言自名为“屋其惹”。之后中文成为琉球王国的官方语言，琉球人也接受了“琉球”的国名。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明太祖“更赐闽人三十六姓”。当时琉球国技术落后，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要。尤其是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船队经常偏离航线，甚至发生海难。是年，察度王遣世子武宁入贡，请求明朝赐与识航海、礼法、音乐之能人予中山王，指导技术。明太祖遂派遣福建三十六姓前往琉球。同年，中山王“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三人，入监读书（国人入监，自兹而始）”。① 同时疏言：“通事程复、叶希尹二人，以寨官兼通事，往来进贡，服劳居多，乞赐职、加冠带。使本国臣民，有所仰止，以变番俗。”② 这表明琉球对中国先进文化采取了主动吸取的态度。两年后，察度又“奉乞王位冠带”，并为琉球大臣乞品秩冠带。明朝一一准许，琉球仿效中国政治制度，完善了自己的王国体制。

在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同时，琉球进入了“大交易时代”。“14 世纪至 16 世纪中后期，琉球王国业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主体对象，幅面及于日本、朝鲜，南至现今菲律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交通网。”③ 1425 年，统一琉球的巴志王受明朝赐姓尚，并受封中山王。他筑都城首里（守礼）城，以明向化之心，并于城外营造建国之门，由明朝册封使内官柴山题为“中山”，为都城第一门。15 世纪末的尚真王在位，琉球最为强盛。

顺治十一年（1645 年），琉球上缴了明朝敕印，清廷遣使张学礼往封琉球国世子尚质为中山王。琉球转为清朝藩属。康熙五年（1666 年），琉球首次派遣 130 人的进贡使团。康熙十三年（1674 年），靖南王耿精忠反。十五年（1676 年），他遣游击陈应昌来琉球国招降。琉球对此加以拒绝，却在第二年派遣正议大夫蔡国器探问大清朝廷安危。康熙帝大喜，赏赐有加。

---

① 《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 48—49 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第 32 页。

② 《中山世谱》卷三，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 43 页。

③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3、55 页。

1. 政治关系

清朝将琉球作为主要的藩属国来对待，将双边的政治交往严格限定在朝贡体系之内。清朝中期，册封琉球王是清廷眼中最重要的对琉交往内容。鉴于琉球的恭顺，清廷对琉球赏赐尤多。日本那霸重修的首里城公园入口处是一座中国式牌坊，悬挂有康熙赐之“守礼之邦”汉字匾额，称“守礼门”。冲绳人敬之为“国宝”。次等重要的双边政治内容就是接待琉球的进贡。清廷对琉球使团接待严谨、优厚，不关注贡物。琉球贡物原本庞杂，有象牙、香料等本国不产之物。康熙年间定例为：硫磺 12600 斤（福建省留用）、红铜 3000 斤、白刚锡 10000 斤（后两者押送进京，入内务府）。琉球使团入京，由鼓乐导行。使团官员乘轿，从者乘马乘车，投宿公馆；沿途各省地方官均派官员负责其境内的迎接、护送及交接，一切费用由中方负责。其住宿之地，中国官兵昼夜守护。清廷关注的是琉球进贡的象征意义，并向琉球颁发中国历法，教谕皇帝年号。

清朝的这些政治行为却是琉球国内政治最为重要的内容。（1）清朝的册封是琉球国王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每逢琉球王薨，新王在得到中国册封前不能称王，而称世子。只有得到中国的身份认可，琉球王才能正式向国内发号施令。明永乐十三年（1415 年），琉球国山南世子他鲁每，遣使入明进贡并请袭封。这是琉球首次向中国请出册封请求。同年五月，明成祖遣行人陈季芳往封，赐浩命冠服及钞万五千锭。自此，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2）使用中国年号，奉行中国正朔不仅意味着服从中华帝国，实际上也将之转变为其国内法令。16 世纪，琉球以进贡天朝、采办贡品的名义下，与朝鲜、日本及南海诸国进行频繁贸易。琉球船队奉中国正朔，以中文为通商交流语言，贸易船上的都通事、通事几乎全是华人。（3）频繁地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不仅是臣服之心的一再宣示，也是为了追逐巨大的物质利益。对于贸易萎缩、趋向衰弱的琉球来说，朝贡利润的作用更显重要。琉球使节名目繁多，从顺治六年（1649 年）

到光绪五年（1879 年）的 230 年间，琉球共派遣了 347 个来华使团。① 朝贡过程漫长，一次完整的朝贡通常持续两年左右。往往是前贡刚销，续贡又至，甚至出现累贡积压的情形。

中琉隔海相望。喜怒无常的海洋对两地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琉球常有海上遇难船、民漂至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了中琉之间的“遭风难民”处理方法。这是中琉两国政治交往中的重要内容。

乾隆二年（1737 年）六月，帝谕：“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念，内外并无歧视，外邦人民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② 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回国时再给一个月粮食，并赏给肉食、酒食、布匹、日用杂物等。遂成定例。琉球进贡船队也常常遭遇海难，或飘风至大陆。清廷修理标准、抚恤标准更优，“正副使每员日给廪给银二钱，夷官每员给蔬薪银五分一厘，口粮米三升，跟伴水梢每名给盐菜银一分，口粮米一升，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个月。”③ 清廷对此极为重视，乃至有地方官因办事压力而自缢身亡者。④ 琉球也积极救护中方的难民和难船，对遭难的清朝册封船队更加重视。安置馆舍，供给衣食，修理船只，护送回国，甚至供养中方人员成年累月。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海禁既开，东南海上贸易活动增多，商船海难和遭风暴飘至琉球的事件随之增加，但总体不及对方。琉球经常派遣专船护送中国难民回国。清廷对之倍加嘉奖。

清朝与琉球的政治交往在两国国内政治的地位完全不同。这是两国国力悬殊客观造成的。中国在朝贡体系中拥有绝对的实力与文

---

① 吴元丰：《名目繁多的琉球来华使节》，载于《历史档案》第 2004 年第 2 期。

② 朱汇森主编：《清史稿校注》，台北：台湾国史馆 1990 年版。卷 533《属国——琉球》，第 12088 页。

③ 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流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载于《历史档案》1995 年第 1 期。

④ 嘉庆十五年（1810 年），琉球头号贡船飘风至广州惠来县，县令王槐寿因财政拮据等原因而自缢。

化优势。琉球则需要仰仗中华帝国实现其安内御外的目的。

2. 经济贸易

琉球人喜欢自称“三山六六岛”，这暴露了其国小地瘠的基本国情。琉球是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最小的国家。与朝贡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相比，琉球不是一个准确意义上的农业国。琉球“地不宜茶”，“波菱、山药、冬瓜、薯、瓢之属，皆闽中种而味实不逮”，“迩来那霸、首里二处亦聚女侩交易，然不过蔬、谷、鱼、盐之类。”① 但是处在西太平洋中段的优越位置，发达的海上道路，普及的捕捞业、家庭副业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都为琉球的海洋贸易提供了异常的优势。交通贸易的发达使得琉球一度非常富庶，成为东亚贸易的枢纽。1609 年日本侵入琉球首里城。日将桦山久高单单为登记、掠夺财物就花费了七八天时间。

中琉之间的经贸内容繁杂，加上清朝政府对中国人、船海外活动的严格限制，中方在琉球贸易活动极少。琉球主动通过四条途径积极展开对华贸易：

⑴ 中国一直对朝贡采取“薄来厚往”的原则，以示恩惠怀远。中原王朝一般对藩属的赏赐按其贡品市价的 8 到 10 倍的价格核定。而贡品为该国土产，本便低于中国市价，之间获利极丰。每次朝贡清帝照例赏赐琉球国王：锦 8 匹、织金缎 8 匹、织金纱 8 匹、织金罗 8 匹、纱 12 匹、缎 12 匹、罗 12 匹；正副使臣：织金罗各 3 匹、缎各 8 匹、罗各 5 匹、绢各 5 匹、里绸各 2 匹、布各 1 匹；都通事、从人和留边人员各有赏赐。② 因此，琉球常常不按定例以各种名义来贡。如琉球国官生在国子监学习肄业归国后，琉球国要附进谢恩贡；皇帝恩赐匾额，琉球也进谢恩贡。后雍正年间定谢恩不遣专使。贡使仍会额外到来，清朝便将物品抵作下届正贡。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贡使携物至，清朝令延为戊寅年正贡；但

① ［明］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77 年版。

② 朱淑媛文：《清代琉球国的谢恩与表奏文书》对一些礼节及物品描述十分详细，远甚《清史稿校注》。

戊寅年（二十三年），贡使又捧贡物至，再次顺延为庚辰年贡物。

⑵ 除了贡品获利外，在朝贡背景下有两条免税的正规贸易渠道。一条是200人的使团中除贡使带15人觐京外，都留闽。他们便在福建将随贡船携带的货物就地销售，并收购中国特产回国。如苏门答腊胡椒在产地每斤10文，在中国市价为每斤3贯；而琉球船队所运之胡椒给予每斤30贯的高价，利润高达3000倍。① 贡船有时携银不下10万两，利润可想而知。其携带归国的货物以生活用品为主。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为例，计有中绸2270匹，粗冬布1602匹，粗夏布1837匹，粗药材30420斤，冰糖5500斤，胡椒4850斤，毛边纸33120张，连史纸7720张，色纸3600张，寿山石900斤，油伞2252把，茶叶21744斤，细瓷器2837斤，粗扇33250把，白纸扇950把，簸箕74250个，牛经线2755条，线香11200斤，粗瓷碗1925斤，砂仁11100斤，水银3100斤，此外还有胭脂、雄黄、蜂蜜、皮鼓、漆器、沉香、玳瑁、布衣、蛇皮等。如此之多的生活用品的频繁进口，一来已经超过了其出口物品额，二来就是供应全体国民的生活也不为过。有人便推测琉球从事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也是在情理之中。早在嘉靖年间，“因当时明朝政府厉行海禁，不准国民出海贸易。海外国家需要的中国货物多数是依靠琉球转贩，故琉球商船转贩达十余国，赢利甚多”。②

⑶ 朝贡使团在北京使馆进行半官半民的商业活动，顺治十一年（1654年）按照《明会典》，“除违禁货物不准收买外，准在会同馆听其两平交易毕”。③ 赴京使团往往在南方购买北方稀缺物品，以售款再购买北方特产回南方。这一回合，一来沿途由中国政府护送，货物无忧；二来免税。利润少则数十倍，高过百倍者也不稀

①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② 李金明：《论明朝对琉球的册封》，载于《中西初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历代宝案》校订本第1册，礼部尚书胡世安语。吴元丰：《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始末》。

奇。馆驿开放之日，“胡人持各色物货日来馆中，纷沓如市。该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夹故也。”① 双方自愿交易，现金买卖，形成了一套惯例制度。京城朝鲜使馆周围，有专门以朝鲜人为贸易对象的商家，称为“东商”，不知道有无“琉商”。

⑷ 遭风难民、难船滞留他乡之时也展开贸易活动。清朝政府对琉球商、船允许免税贸易。琉球商人、难民将幸存货物和难以修复的船只折价出售，也会购买中国货物回国。琉球国护送中国难民回国的专船，兼有贸易的使命。对琉球的护送船只，中方也给予了免税贸易待遇。琉球抓住护送专船的利润，进行贸易活动。琉球护送难商之船的贸易额要少于贡船、接贡船的贸易，但数额和利润也不可低估。海禁造成了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稀缺，也造成了海外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稀缺，反而促进了琉球中转贸易的开展。在对遭风难民的贸易上，“由于中国方面在变价时给予琉人的优惠待遇，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其中存在琉人以走私贸易为主的‘有意漂流’”。②

以上贸易途径都是免税的。清代海关税分“货钞”和“船钞”两部分。货钞即商税，分进口和出口两类，根据货物价格和性质征收，税率平均为4%左右。③ 往来货物差值虽不全是获利，也能反映赢利的大概情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琉球接贡船来闽，初来时免税83两2钱3分6厘8毫，回国时免税289两7钱2分1厘5毫1丝5忽。其差额表明该年接贡船一艘便增7162两5钱有余。三十二年贡船又至，前后免税额分别为：219两9钱6分5厘，597两8钱3分，增9450两银子。以上还仅仅是使团在闽一地一条途径的收益，如果加上赏赐、同文馆贸易利益和归国倒卖中国货物

① ［韩］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载于《国译燕行录选集》（第4册），第127页。转引自《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

② 见西里喜行：《关于清代光绪年间的“琉球国”难民漂流事件》，载于《第二届琉球·中国交涉史研讨会论文集》，冲绳县立图书馆1995年版，第256页。转引自张先清、谢必震：《清代台湾与琉球关系考》。

③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的收益，则蔚为可观。

15 世纪琉球与中国通商次数累计为 206 次。琉球对朝鲜和暹罗通商分别是 33 和 30 次，与满勒加为 15 次，而日琉之间的通商才 4 次。① 这表明琉球的海外贸易以中国为主；除了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华的贸易优惠和转口贸易，使得物产稀少的琉球物资相对宽裕，适应了其国内需要，同时也得利颇丰。琉球乐此不疲。萨摩入侵琉球后，其国照常朝贡，晚明以其国家残破，准其 10 年一贡。琉球反乞两年一贡，以效忠顺。明朝定其为 5 年一贡，因其再次固请，准照旧，两年一贡。琉球新败，需要朝贡背景下的贸易来引进物资，恢复国家元气，却为明朝所难以理解。中琉之间的贸易也造成了琉对华贸易的依赖。明末，“30 余岛，僻居海藩，瘠地荒土，别无所产，男女只知纺织营生，通国衣食全赖寸丝尺缕，皆给于天朝，将及 300 年……今禁白丝，男女惊惶，不能度生，人人困苦。”②

3. 文化交流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首批来清朝留学的琉球人蔡文溥在《中山学校序》中说：“中山虽在海外，自大明以来通中国，贡典不绝，沐圣天子文教者盖三百馀年矣。”③ 琉球人少国弱，文化相对落后，对中华文化一直持着热心学习、主动吸用的态度。中华文化之传播入琉，渠道有四：

⑴ 明太祖赐闽南三十六姓。闽人三十六户居于那霸附近的久米村，领受俸粮，世世不绝，史称“闽三十六姓”。这些人先是涉足琉球的航海，推动了琉球航海技术的发展，为琉球商船扬帆海

① 见朱德兰论文：《十五世纪琉球的亚洲外交贸易》表三。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第 54 页。

② 《历代宝案》，校订本第 1 册，第 447 页。转引自《南明时期中琉关系探实》。

③ 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第 1 期。

外，居功甚伟。这批琉球华人，逐渐制礼法，通音乐，影响日益扩大。《中山传信录·取士》说："久米村皆三十六姓闽中赐籍之家，其子弟之秀者，年十五六岁，取三四人为秀才。其十三四不及选者，名若秀才，读书识字。其秀才，每年于十二月试之，出《四书》题，令作诗一首，或八句，或四句，能者籍名，升为副通事，由此渐升至紫金大夫。此为久米子弟入仕之始。"① "三十六姓"子孙承担了政治、外交等重大职责和几乎所有的文教职事。琉球来华使节几乎都由华裔充任，登堂入相者也不在少数。蔡温、程顺则、王茂、郑迥等大臣都是久米村的华裔。汉人居住琉球，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汉语、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

⑵ 中国使团的文化传播。清朝册封的正、副使为文名闻达者。如嘉庆朝册封正使为嘉庆元年状元赵文楷，副使为乾隆朝进士李鼎文。二人与琉球文人相唱和，考证琉球土文，赋诗留墨，教化无形。使臣还可随带一部分从客和家人。从人几乎网罗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天文生、医生、诗人、画家、书法家、琴师、高僧、道士、厨师、糕饼匠、铁匠、锁匠、造船工匠、裁缝、理发匠及裱糊匠等。中国使团在琉球居留数月，于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将中国的文化艺术、手工技艺、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等逐渐传播到了琉球社会。中华帝国赏赐琉球王室的物品、使臣个人的馈赠礼品及随役人员携带的贸易商品包括精美的丝绸锦缎、各色瓷器、玉器、珐琅器、玻璃器、经籍、字画、文房四宝、食品、药材等，都成为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

⑶ 清廷遵明例，开始接受琉球的官派留学生。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琉球国官生四人入太学，以都通事标准厚加培养。之后，琉球便主动派遣留学生来华，引进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传衣冠礼仪，易中山民物。明清两代琉球共派遣留学生 20 余次，有案可稽者 80 余人。官生学制在四年以上，因为出身高贵，归国后多在政界担任要职。

① 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

现存官方资料中记载最全的是琉球官生的国子监学习和生活情况。琉球曾经先后16次派人来华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制度和技术。明清政府对其总的方针是：教育一视同仁，生活优为抚恤。乾隆年间，留学生要早起沐浴、正冠衣，赴讲堂听讲《小学》、《近思录》等。午饭后，听讲经书，然后临帖写字。晚上则在灯下听讲四六古文、诗，要求翌日背诵。逢三日作诗一首，逢八日作四六古文或序文一篇。同时还有月考、季考、岁考，以查勤惰。同时，衣食住行待遇优厚。以食物为例：每人每天给白米二升，鸡一只，肉二斤，茶叶五钱，豆腐一斤，花椒五分，清酱油四两，香油四钱，酱四两，黄酒一瓶，菜一斤，盐一两，灯油二两。同时有专用厨房；各官生从人另有衣食住行的安排。①

琉球官生一般在华生活四载有余，感慕华风，对中华文化向心力极强，在维护这一体系中起着中坚作用。1879年日本在琉球废藩置县，原官生林世功来华进京，长跪乞师求援，连达七日。翌年，日本抛出分割琉球国条约，林在华自刎而死。② 闽人三十六姓和历届留华学生，主导了琉球各方面的活动，形成了支撑国家的精英集团。明人《咸宾录》记载琉球“凡习刑法、钱谷等官，皆土人，为武职；其大夫、长史、通事官司朝贡，为文职，皆三十六姓人及学于国学者为之”。③ 这两部分人在普及文化、提升琉球文化水平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⑷ 除官生外，一些琉球人甚至不远万里，前来福州、北京等地求学、求艺。这些人被称为“勤学”或“勤学人”，名垂史册的蔡温、程顺则即其优秀代表。程顺则于康熙年间留学、出使来华，自费引进了会稽儒生范宏注释的《六谕衍义》。他将之进呈琉球王尚贞，建议作为国民修身和学习官话（中文）的课本。《六谕衍

① 谢必震：《明清士大夫与琉球》。黄新宪：《封贡体制和琉球来华留学生教育》。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

② 黄新宪：《封贡体制和琉球来华留学生教育》，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8期。

③ 董明：《明清两代汉语在琉球的传播》。

义》在普及文化、改进风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由程顺则介绍到了日本。①

文化原本相对落后的琉球在汉文化的感染下，兴起了兴学习文的风气。康熙十一年（1672 年）琉球国王令准，正式在那霸久米村泉崎桥头建孔庙，春秋二祭，皆从中国之礼，鲜明地树起了尊儒学儒的旗帜。载“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之后琉球建明伦堂以为府学，逐步向下普及官方教育。《清史稿·属国一》载“择久米大夫通事一人谓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话师教之”。琉球国通文理者也兴办私学。嘉庆七年（1802 年），有众多华裔居住的那霸港官民集资兴建了四所乡学，以满足当地青少年学习汉字汉语的需要。学校的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和考察制度照搬中国，并开始了一定的程度上的开科取士。琉球国内的国学、乡学体系，直接传播了中华文化。《中山传信录》卷四“琉球三十六岛”条载：“各岛语言，惟姑米、叶壁与中山为近，余皆不相通。……诸岛无文字，皆奉中山国书。我皇上声教远布，各岛渐通中国字，购蓄中国书籍，有能读《上谕十六条》及能诗者矣。”② 琉球甚至成为了中日文化的中转地。日本派遣人员来琉球学习儒学、医学和先进的工艺。琉球学者郑迥、魏士哲等名振日本。中华文化携其丰蓄涵容，与琉球本土文化反复交融，汇总生成新的近世琉球文化。

由于国情的缘故，琉球吸收中国文化没有朝鲜吸收得那般深入、彻底。但是琉球地区遗留下了许多汉文化的痕迹，包括庙宇、匾额、联拾、风俗等。中国东南沿海的妈祖信仰也在琉球广泛传播，并实现了信仰本土化。中国妈祖“救父未救兄”传入琉球后演变成“救兄未救父”，经过中琉两种不同信仰的冲撞与融合，最终

①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0 页。
② 黄新宪：《封贡体制和琉球来华留学生教育》。

妈祖成为琉球姊妹神的载体，得到琉球人民的普遍认可。[①] 清末于慎卿编纂的《古今楹联类纂》收录了琉球龙王庙中的对联。曰："和长江大河而注之海，能兴云致雨而谓之神"。[②] 这副中文对联紧扣中国风俗中的龙王，行文、内涵与中国内地类似之联对无异，可见琉球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

中国琉球的往返海途，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极目连天；再者，明清之时海氛不靖，出海有遭海盗之厄。中琉双方的使节一般都"带棺出征"。中方官员的棺材前刻"天朝使臣之枢"，在使臣自知不免时仰卧棺中，令人以铁钉锢之，以免葬身鱼腹，失天朝大臣风采。尽管人们视中琉交通为畏途，但还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先人为中琉两国的友好交流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① 薛曦：《从"救兄未救父"的传说看妈祖信仰在琉球的嬗变》，载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1 年第 4 期。

② 刘福铸：《古琉球国联拾》，载于《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95 年第 2 期。

第四节　中日交往，东亚核心

一衣带水的中国与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国家。

这不仅是从国力上说的，更是从中日两国的关系对整个东亚国际体系的震动上来评判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一直游离于朝贡体系的边缘，有倾心向慕、全盘学习的友好交流时候，也有多次兵戎相见。唐时，日本的遣唐使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从公元 894 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之后就是长期的倭寇问题，短暂的中日勘合贸易，日本入侵琉球，中日朝鲜战争等导致的长期中日政治冷淡。日本明治维新后，入侵朝鲜。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

古代历史上，中日关系的波动究其原因是日本引起的。在整个东亚国际秩序中，日本怀有一股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1610 年，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纯，奉旨呈书明朝福建总督，原稿为："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宾。"① 日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引进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吸收与改造。它不仅学习中国的科技文化，更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华夷观念在日本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日本将

① 见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夷诸国》，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0 年版，第 179 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

自己置换到了“华”的地位，要求建立以日本独尊的国际体系。在日本营造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时，朝鲜、琉球都曾经遭受日本侵略。

这种观念的差异在现代依然存在。具体到针对朝贡体系的看法时，中国和多数国家的学者选择“辐射同心圆”的结构观点。而日本学者却坚持“纺锤型”的结构观点。而纺锤的两头分别是中国与日本。

1.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日本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与中国展开外交活动。中日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当时日本小国林立。其中倭奴国的国王遣使入汉，愿为东汉臣藩。中国封其为“倭奴国王”。现代“汉倭奴国王印”的出土表明当时的汉朝影响已经波及日本九州。这可以看作是日本进入正在形成的华夷秩序的开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人”常常遣使万里朝贡，贡献方物。中国继续以怀柔恩赏政策笼络日本。南朝宋孝武帝时，封“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梁武帝时，封“征东大将军”。

隋朝建立，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当时大和国推古天皇政府由圣德太子摄政。他派遣了大礼小野妹子赍国书及贡礼，于608年（大业三年）3月至隋都，向炀帝呈交国书、贡礼。日本的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读后很不高兴，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但是中国还是安顿了日本使团带来的留学生和僧侣。

隋朝并且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臣，率隋朝使团一行13人随小野妹子赴日。裴世清晋见了日本天皇，献上了文物及国书，并奉隋炀帝之命责难之。天皇不得不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仪……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中国使臣递交的国书在日本的《日本书记》太籍中被保存下来，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

小野妹子和裴世清在之后的史籍中都不见记载。但是他们却是

中日两国第一次友好互访的当事人。

唐代，中国真正对日本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煌煌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巅峰，成为了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在唐代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本意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但对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化层面。

从630年第一次遣使到894年的264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批。日本国内非常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使团组成既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也有主神、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各行工匠，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随行。使团规模不断扩大，从初期的200余人增至后来的500余人，船只从2艘增至4艘。

使团成员在中国交流广阔，学习欲强。尤其是留学生和僧人们，在中国遍访名胜古迹，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书籍、图画、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书法、建筑、绘画、雕刻等科技。许多人长期留学中国，比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等，与唐朝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当时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入唐僧人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这些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

相对的，也有大批的唐朝人前往日本。一些唐朝使臣由于航行艰险，便居留归化日本。如唐人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有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

鉴真一行六渡日本成功后，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鉴真

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 440 余人授戒；为 80 余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同时鉴真及其弟子多才多艺，全方位地向日本人传授唐朝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鉴真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与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鉴真因此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纻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至今仍为日本国宝。

645 年 6 月 12 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排斥改革的外戚苏我入鹿，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常年留居中国的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 （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 （今大阪）。

12 日这一天可以被看作是唐朝对日本影响的总爆发。这场被称为“大化改新”的政变之后，留唐精英建立的新政府以唐代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646 年元月开始陆续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 （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模仿唐租庸调制编制户籍、计帐 （规定赋役的登记），行班田收授之法，统定班给人民土地和应负租赋的数额；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及向皇室献纳仕丁 （夫役）、采女 （宫女） 的制度。

新政府从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学习盛唐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668年，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701年日本编成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以唐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这一次改新最终使日本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就国际关系而言，当时日本积极介入华夷秩序。

公元894年，因派遣唐使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日本方面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200年的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一方面，日本财政窘迫，国家居危，统治者们思想消极、保守封闭；一方面唐朝已经进入衰败期，昌盛不再。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期间北宋曾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但没有得到日本响应。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表达了与中国交往的兴趣，可惜南宋王朝此时内忧外患，无力响应。蒙古初兴之时，日本还成功地抵御了蒙古大军两次大举征伐。

到了明初，中日关系又开始了重建朝贡体系的外交接触。自唐朝末年以来数百年间，日本游离朝贡体系外。但是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明内容和发展程度几乎与中国相同。缺少日本的参与，东亚的国际体系是不完整的。

明初朱元璋要求日本称臣入贡，遭到了日本拒绝。日本怀良亲王尖锐抨击道："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明史》卷三百二十二）1403年，朱棣即位改元后，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却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日本大力吹捧朱棣，表示愿意接受大统历，奉大明正朔。在朝贡框架中，中日进行了勘合贸易。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舟，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实际上日本商船队常随贡使汹涌而来。随着日本战国纷争，来华商人、武士、海盗等在嘉靖年间酿成了倭患。

倭寇困扰中日关系很久，导致了中日关系降到低谷。日本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控制琉球，对华间接贸易的途径。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大肆劫掠后，开始了琉球附庸于日本的"一国两属"

情况。日琉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在：日本强迫琉球派遣人质与使节；设立“在番奉行”于那霸，监督琉球的内政、外交和贸易，定期向萨摩呈报外国船只往来琉球始末；割占琉球北方领土。但是琉球依然拥有自己的专权、王室、政治体制。该国依旧使用中国年号，奉行中国正朔，保持中琉朝贡关系。

日本征伐琉球最主要的目的是当时中日关系断裂，日本难以从朝贡贸易获得利益。而日本对中国文化、物质的需求是切实存在的，所以就采取了控制琉球、盘剥中琉贸易的措施，以间接达到目的。现在学界公认萨摩侵琉主要原因是觊觎琉球的贸易财富和贸易地位，希望从中琉贸易中获利。为了控制中琉贸易的巨大利润，萨摩继续认同琉球与明朝的臣从关系，维持中琉之间的贸易，千方百计盘剥压榨琉球。

琉球购买的中国商品，被迫只能在鹿儿岛与日本贸易；琉球的特产也只能出售到萨摩；萨摩利用琉球国家新破，财政困难，藩镇和萨摩商人出资本，利用琉球进行“傀儡贸易”。琉球长时间要依靠萨摩资本进行中转贸易，为日本做嫁衣裳。

中琉关系与日琉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琉球虽属中国藩属，但中国并未干涉琉球内政一丝一毫。而日本还出于盘剥中转贸易利益的目的，刻意隐瞒其压迫琉球的事实。1875 年 8 月 5 日，琉球王尚泰致书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说：“（琉球）从属皇国管辖之地鹿儿岛（明治维新前的萨摩藩）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① 当初，中国使团来到琉球之时，日本隐藏琉球的日船于固定隐秘港口，节制活动，只参加册封之礼。但中国使臣遭遇身材、衣冠有异于琉球人的“在番奉行”，起了疑心。之后，日本完全避免了与中国使团的照面。

2. 古代中日战争

中日两国的最早战争因朝鲜而起。朝鲜半岛在日本的国家战略

① 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 118 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第 160 页。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上一再引发中日战争。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就借机将势力伸展到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到了唐代，中日两国分别支持新罗和百济，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各自从西、北两个方向攻打新罗。唐朝应新罗要求派大军救援，一举灭亡了百济。日本齐明女皇亲征救援，于661年7月死于九州的大本营。救援一事暂时搁浅。663年8月27日，唐军终于与日军在白村江口发生遭遇战。

当日，日本援军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另有百济精骑和新罗骁骑助战。新罗军小胜。第二天，日本联军依仗兵力优势，以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打大唐中军。唐军左右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逃亡溺死多人，船队为之难以前行。《旧唐书·刘仁轨传》载："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日本惨败，势力迅速缩回国内。认识到了中日实力的巨大差异后，日本将政治重心转为内政，同时加大派遣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可以说，这一战推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确立。

中日第二战是倭寇之患。明正统年以后，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大起。一些倭寇势力甚至深入南京、扬州等富庶地区，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发展。戚继光等爱国将领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1555年戚继光调到浙江抗倭，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军纪严明，战法实际，战斗力很强，屡建奇功。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福建告急。戚继光等率军入闽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牛田登地，乘胜追击，日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同时，刘灏、俞大猷等也屡败倭寇。1564年戚继光与倭寇万余在仙游城下决战。倭寇大败。戚、俞二人基本肃清了福建倭寇。随后，俞大猷率军平定广东境内倭患。至

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

不到30年后，日本战国局面结束。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建立幕府。日本新兴的大名和武士们，随即将战刀指向了朝鲜和中国。1592年4月12日，侵朝日军20万横渡对马海峡，于翌日清晨登陆釜山，发动了战争。承平日久的朝鲜武备松懈，长年耽于党争，根本无力抵抗强悍的日军。仅仅两个月，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宣祖北逃义州，向明朝求救。

当时的明朝已经呈现出王朝末路的迹象。但唇亡齿寒的紧迫威胁和早期入朝明军被歼灭的事实迫使明朝派遣大批配备先进火器的正规军。明军入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仅未能扩大战果，还被压缩回了釜山防御圈。1593年5月，双方开始和谈。

然而，丰臣秀吉将和谈作为缓兵之计，重整军备，并故意造成谈判破裂。1597年，战争再次爆发。日军与中朝军队在半岛南部相持。在关键时刻，朝鲜起用名将李舜臣，重组海军，取得了海战胜利。拥有制海权的中朝军队开始了猛烈的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苦力支撑。丰臣秀吉病逝后主持大局的摄政会对前线官兵封锁消息，并以秀吉名义命令撤兵。至此，为时七年、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的中日朝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从物质层面来看，七年朝鲜战争没有胜利者。作为战场的朝鲜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丰臣政权因为战败而迅速垮台；原本矛盾重重的明朝在战争中消耗了剩余的军力财力，加剧了国内矛盾。从世界历史层面来看，这次战争重新确定了中国在朝贡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日本再次被排斥在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不久清代明立，中日再未恢复稳定的朝贡关系。

历史上的日本，一再挑战朝贡体系，爆发中日战争。但是因为实力和道义的巨大差异，日本一再失败。客观上，中日历史战争一再强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日本始终成为古代东亚的“另类”。

第六章 海上中国，被人严重忽视的东方文明

神州大地上中外交流的盛举上演得轰轰烈烈。中国在海上的身影从“殷人东渡”开始也从未断绝。中国的东部与南部都为浩淼的太平洋所包围，具有发展海洋事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华民族的先民并没有放弃影响世界历史的海洋渠道。勤劳的他们通过海外贸易、海外移民、大规模的远航构建了丰富多彩的“海上中国”。这是一张毫不比陆地中外交流逊色的文明网络。遗憾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明和交流活动主要集中在陆地上的客观事实似乎也使中国人将目光局限在陆地之上，严重忽视了“海上中国”的繁盛存在。

第一节　海上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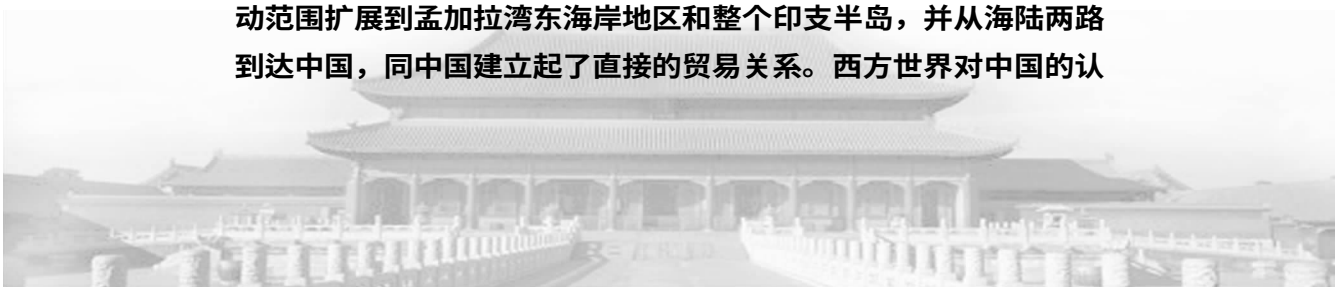
公元 2 世纪前半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从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到达了一个叫卡蒂加拉（Kattigara）的地方。他将旅行经历写成报告带回罗马帝国。后世的希腊地理学家对亚历山大的作品进行了研究，保存了一些珍贵的片段：

亚历山大曾经记载，从金洲国开始，整个陆地都面向南方；沿着此地航行，在 20 天内即到达扎拜城；然后再从扎拜城向南稍偏左航行‘若干天’，即可到达卡蒂加拉。

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他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处，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

据学者考证，引文中的卡蒂加拉即汉文史料中的交趾，位于红河入海口处附近，今河内城郊。扎拜则为占婆同音转译，位于柬埔寨西岸的贡布附近。由此可见公元前罗马人的足迹就已经达到了中南半岛地区，至于有无接触中国则不得而知。在这件事中，罗马人主动过西亚沙漠，进入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地区，开辟了新的贸易道路。

张绪山先生的研究证明，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红海水道为基地展开的。公元 2 世纪，罗马人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孟加拉湾东海岸地区和整个印支半岛，并从海陆两路到达中国，同中国建立起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



识亦随之大为发展。随着帝国的衰落，特别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公元3世纪末以后，罗马人乃至整个欧洲从海路向东方的探索被完全阻断。罗马人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对古代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①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方动力所在。

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类似于陆地丝绸之路的中国海上贸易商道。丝绸之路起于东南沿海的扬州、明州、泉州、番禺等港口。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当时的商路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金、银和手工业品，交换回珠宝、香料和苏木等奢侈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海上丝路上诸邦国的兴衰，与这条海上商道的贸易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同中华帝国关系的制约。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②

古代中国在文明早期就发展出了高超的航海技术。早在汉朝的时候，南方海上的贸易网络就已出现。汉时大秦使臣就“经狮子国，更沿印度东海岸至伊洛瓦底江附近，折而南航环马来半岛至安南”到达中国。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规模并不大，是与陆地丝绸之路相互补充的。海上商路必须依赖于陆地的交通和货物支持。三国时，蜿蜒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乘风破浪航行于万顷碧波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重镇永昌郡交汇。永昌郡在三国时期栽桑养蚕，织成丝绢，再加上四川运来的丝绸及其他手工业品，经贸繁荣。公元5世纪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北方战乱，海洋贸易得到了可观的发展。这时西亚、南亚的海船不仅可以

① 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载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②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绕马来半岛，而且可以直航中国各港口。中国船只也可以远航大秦、天竺。

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发展。当时的中世纪阿拉伯的著名作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们，如苏莱曼、马苏迪和伊德里西，都记述了中国船舶常航行到波斯湾和红海。唐代贾耽更记载了从广州直航波斯湾头以及位于红海口的亚丁的详尽航程。“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①

唐朝中期后，北方丝绸之路屡屡受阻。客观的形势和东南沿海的地理优势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发展。在宋代东南沿海的丝织业很发达，海上交通和丝绸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已出现了能营造载重200吨以上的海船的大型手工工场。从唐朝开始，政府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市舶管理制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宋朝继承了市舶管理制度，并在宋初于京师设“榷易院”，1080年颁布《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这部制订于11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从其内容来看，开启了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福建的泉州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了北方丝绸之路。

元朝是国际性的大帝国。元政府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市舶收入在元朝财政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当时中国遣往海外的商船基本由西域人操纵（元朝禁止汉人海外经商。）14世纪初，元廷即以西域人麦术丁等率商队前往东非索马里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元朝文书中常称之为“回回田地里”的商舶。元朝的海外贸易基本采用官营的形式。具体做法是政府出船、出本钱给商人出海贸易，以所获十分之七归官府，十分之三归己，这是元朝官本商贩的海外贸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易法。由西域商人主要参与的元代海外贸易，“造船置货，动辄万计”，为政府赚取了“宝货赢亿万数”。如江浙行省市舶岁入已达“珠400斤，黄金3400两”。这相当于元廷当年国库收入中黄金数目的六分之一多。①

明、清两代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时禁时开。结果只是将海外贸易的控制权从官方手中转移到了民间手中。民间的海外贸易热情蕴藏已久。政府控制的削弱助长了这种热情。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现象成风，明政府最后也只好开禁。

从开通到清朝前期，“海上丝绸之路”并未如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那样因阻断而荒废，反而有日趋兴盛和畅达之势。中国在海上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贸易顺差不绝，白银源源不断地留入中国。尽管清朝继续海禁政策，但是海上贸易顺差优势依旧。面对中国的闭关政策和自身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西方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以英国为代表，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同时，16世纪之后，西方殖民者的大举东来，许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规模或范围都大为缩小，海上丝绸之路既盛又衰。所谓的“盛”指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商品贸易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所谓的“衰”指的是传统的中国主导的以丝绸为主要商品的海上贸易开始萎缩。当时无论是商品的结构、贸易的支配权，还是贸易的性质及作用，都在发生巨变。西方输入中国的商品、尤其是鸦片的数量与重要性则与日俱增，并最终使得西人的对华贸易由开始的入超地位变为了出超，以至于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多达五六百万两。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从此彻底走到了尽头。

探讨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还要将眼光拓展到太平洋对岸。横跨

① 马建春：《元代西域人的商业活动》，载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存在的。自 1567 年第一艘贸易大帆船从墨西哥航行到菲律宾，至 1851 年最后一艘大帆船到达菲律宾，总共有 108 艘大帆船航行在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上。他们克服了世界最大洋赐予的艰难险阻，逃过了来自荷兰、英国等西班牙敌对国的多次进攻，突破了来自西班牙宗主国及殖民地政府的种种限制，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评价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说："两个半世纪来，大帆船年复一年地航行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漫长而孤独的航程上。没有任何一条航线能持续到如此之久，没有任何一种正规的航行像它那样艰难危险，250 年里，它承受了几十艘船、成千上万人和数百万计的财物。"① 这一段海上丝绸之路将新旧商业事业完整地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促进了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横跨太平洋的航行中，在古罗马人东来的史实中，外部世界对维持海上丝绸之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地中海、印度洋世界一直在努力探索着通向东方中国的路。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商人先纷纷坐船而来；紧随其后的是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他们先由海路抵达南中国海，再沿海北上，到达中国沿海港口进行活动。西亚商人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中间商，垄断了由海路而来的中间贸易。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的通航运输工具中，最多、最重要的不是中国的商船，而是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商船。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双向开拓的结果。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后来居上，是由于它在地理环境和其他各种真实或潜在的利益上远远优于陆上丝绸之路，这种优势吸引西亚商人逐渐把贸易交通的重心转移到了海路。②

千年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开辟和繁荣对亚欧和东非地区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

---

① 李金明：《联系福建与拉美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载于《东南学术》2001 年第 4 期。

② 陈潮：《重新审视海上丝路的开拓》，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社会史发展的进程，推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塑造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联系网络，进而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提高了中外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大量东西方商品的汇聚无疑方便了商路周边人民的生活。中国产品受到各国上下的欢迎。其次，海上贸易的活跃促进了中外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垄断商路的马六甲从一个仅有二三十个土著居民、靠简陋渔具捕鱼为生的荒僻的小渔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展成了拥有 10 万人、世界商人云集的都市。再次，各种生产技术的传入推动了各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商品的交换和中国、印度、阿拉伯人的移居，许多生产技术也开始互通有无。仅中国输出的生产技术就有养蚕、丝绸纺织、陶瓷制造、漆器制造、茶叶生产、农业生产、造纸印刷等。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各国的政治往来。中国是国家形成和制度发展相对较快的国家。中国的政治和制度也随着商品和商人的传播，进入了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政治对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形成、巩固和制度发展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使其沿线星罗棋布的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地中海国家之间加深了相互理解和友谊。①

海上丝绸之路对东南亚地区人民文化生活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移民的增加，中华文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也顺着商路流淌。这股文化之流非常不像经济和制度一样容易把握，但它给相对落后地区赋予新的生命，使得文化发展程度相当的地区之间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1681 年中国人沈富宗随比利时神父柏应理赴欧洲，1684 年 9 月 25 日柏应理带领其前往凡尔赛宫拜见了法王路易十四。而真正亲身到法国传播中国文明的第一人是 1702 年底到法国的黄嘉略。作为唯一居住在法国的中国

① 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

人，他首先向法国人提供了他们希望获得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孟德斯鸠亲自与其进行了长谈。黄嘉略对中法文化交流最显著的贡献是法国汉学的创立。他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法国的。“不论怎样认识，中华文化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直接结果。”① 丝路不在，但文化的联系作用和历史影响将是永恒的。

① 鲜于浩、雷斌：《法国与丝绸之路》，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二节　郑和七下西洋

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
洪涛接天，巨浪如山，
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
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这段似诗一样的史实记载给我们描绘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景象，是明朝初年中国国势强盛和人们豪情挥洒的写照。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重大表现，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轰动事件。

明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政治较为清明。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从永乐三年（1405 年）至宣德八年（1433 年）的 28 年中，郑和奉朝廷之命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江、浙、闽、粤海岸南下复西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使团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第一次下西洋。他们依次访问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苏门答腊、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等国。船队在古里为船队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郑和在当地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皓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郑和在国外建立最早的一块碑。两年零三个月后郑和返回南京。

第一次下西洋立即引起了轰动。政府第一次明确获得了印度洋

和东南亚地区的一手资料，而随船队来华的各国使节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朝廷令郑和马不停蹄二下西洋。当年郑和统舟师前往爪哇、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古里、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等国访问，永乐七年（1409 年）七月返国，九月又前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阿鲁（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南渟里、锡兰、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甘巴里（今印度科因巴托尔）、阿拔巴丹（今印度阿默达巴德附近）、古里等国访问。永乐十年（1412 年）十一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访问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渟里、彭亨（今马来西亚）、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锡兰、加异勒（今印度卡异尔）、甘巴里、柯枝、古里沙里湾泥、溜山（今马尔代夫马累）、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剌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木骨都束（今肯尼亚摩加迪沙）、不剌哇、麻林迪（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比剌（今非洲爪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孙剌等亚非国家。第四次下西洋直接开通了中非航路，将中非交往推向了高峰。中国驰骋大洋的雄壮场景和携带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华派遣使团。一些国家甚至是国王、王后亲自前往。因此，郑和专门为了护送使团归国，而第五次、第六次下西洋，先后护送了忽鲁谟斯、阿丹、喃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 30 国次的使臣归国。

宣德五年（1430 年）六月，明宣宗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郑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分别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太平港立石碑，记载六次出航的历程。宣德六年（1431 年）十二月九日，船队从五虎门出洋，经占城、爪哇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古里、竹夕（今索马里朱巴河），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这次远航因此也成为郑和出行最远的一次。当船队返回到印度西海岸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1433 年）四月初在古里逝世。王景弘继续率领船队返航，经苏门答腊、满剌加等地，于当年七月返回南京。

郑和船队规模巨大，装饰华丽，可算是古代中国对自己造船和

航海事业的大检阅（之后，古代中国骤然海禁，停止了远航，自然失去了这样的检阅机会）。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舶分为五类：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其中宝船最大，“宝船63号，大船长44丈，阔18丈。”明代一尺约合今日0.311米，依此推算，则下西洋宝船船长约138米，宽约56米；最大排水量约14800吨，按一般浮船的使用经验，其载重量约为排水量的50%来计算的话，郑和宝船的载重量约在7000吨左右。这种巨型海船，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郑和船队的装备就证明了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繁盛。

在郑和逝世100多年后，葡萄牙大航海时期的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出版的《亚洲旬年史之三》就提及了郑和下西洋一事。

为保持其征服者之英名，华人在内陆东征西战。他们曾出师勃固王国。那里至今犹存的华人的手迹向我们叙述了他们的征战业绩。尚存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在勃固北部的阿瓦王国的遍达（Piand）与米兰都（Mirand）之间，尚存华人在那里兴建的一城市的遗址。不仅上述王国，正如前述，暹罗中包括的大大小小诸国，如位于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 - tay）、堡高（Baca）、茶兰瓦拉固（Chalamvaragu）及其他与其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他们将年分为12个阴历月份，在黄道图中使用12宫及天体运动的其他知识。

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这些被征服的王国，作为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隔三年，遣使中国，进呈礼物。贡使人数总在四人以上，因为抵达中国大皇帝、王爷所在地的路程遥远，候见及赏赐的时间又长，一两个恐有不测。即便免于病卒，出席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后，也有人入土。暴死者得隆重安葬，竖有灵位，上面书写死者姓名、何国贡使。此种种做法，不无为其王国树碑立传之意。但当他们从陆地或水路前来印度

时，其行动必比希腊人、罗马人、迦太基人尤为小心谨慎。华人因征战他国，远离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但无意重蹈覆辙。相反，看到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他们发觉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银，其他金属不一而足，自然财富如此丰富、百工技艺如此高超。①

在这里，巴罗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描写，可能是西方文献中对这一东亚国际制度的最早涉及。他的描述基本上符合郑和下西洋前后的史实，印证了郑和盛举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热衷于海外航行和发现，但是落在了中国人的后面。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并无争议。但是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却是众说纷纭，有踪迹建文说、宣扬国威说、耀兵异域说、贸易探异说、经营国际贸易说、朝贡贸易说等等，莫衷一是。从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和七次在海外展开的各项外交活动来看，这次盛举的目的是具有外交性的。② 笔者认为明朝初建，郑和是遵命向外宣达新朝立场，联系邦交，目的是对外开放、和平友好、互利贸易。

从客观结果上看，郑和远航不仅达到了外交目的，其历史影响还远远超过了政治外交，深入到了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各个层面，对以后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郑和下西洋建立了庞大的亚非交通网。七下西洋，郑和打通了南洋通道，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是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以及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船队还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

① 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500 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② 卫太夷：《加赠郑和以“外交家”的桂冠》，载于《中国航海》2005 年第 2 期。

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其次，郑和在下西洋稳定了亚太和印度洋沿岸局势，扩展了朝贡体系。在郑和下西洋及其之后几年，航线周边地区保持了和平局势。郑和船队在完成外交和贸易的同时，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做了很多努力。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在永乐、宣德两朝，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亚非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物产丰富的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规模并且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郑和使团对亚非各国的生产经济、物质资源和人民生活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调查，为大规模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在郑和下西洋时，不仅各国政府从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最后，郑和下西洋之旅也是文化传播之旅。中外互识增长。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宣传中华文明，对文化落后的地区与民族尽力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对文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民族，互相借鉴学习。在具体方面，郑和船队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理，比较详细的中

外物产情况准确、生动、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①]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在亚非人民中留下了和平友好的深刻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郑和航海的遗迹、故事和传说。比如印度尼西亚各地留下了诸如三保洞、三保庙、大铜钟遗迹、遗物，以及“三保公鱼”和“郑和与榴莲”等神话传说。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对郑和遗迹、遗物的钟爱与向往，逐渐形成了“郑和崇拜”，已经成为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

总之，在 15 世纪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怎么评价郑和的远航都不为过。七下西洋的宏伟事业，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更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郑和航海不杀掠、不殖民、公平贸易，这一盛举既是对中国海洋文明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中国海洋文明掀起的汹涌波涛。

在郑和下西洋超过 600 年的今天，人们对它的兴趣依然不减。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孟席斯曾出版《1421》一书，描述了郑和舰队比哥伦布早 70 年发现美洲的推测。国内也有律师宣称在上海发现一幅“郑和版世界地图”，标志有非洲和美洲轮廓，支持了孟席斯有关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率先完成环球航行的观点。但是主流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观点和历史证据漏洞太多，不够严谨。笔者估计，我们要做好谨慎看待针对郑和下西洋盛举炒作的长期准备。

① 《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抑制下的蓬勃

郑和下西洋似乎成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巅峰绝唱”。

在万顷波涛中乘风破浪的豪情和向四海开放的胸襟仿佛在转眼间就在中国社会消失了。郑和死后，中国再无远航盛举。朝廷的理由是简简单单的“劳民伤财”。之后，明朝和清朝前期厉行“海禁”。官方的海上经济行为仅仅停留在与东亚的琉球和东南亚各藩属之间的朝贡贸易。本着厚来薄往的原则，中国政府仅对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表示兴趣。虽然藩属国不一定这么想。各个海上藩属国都想方设法地增加朝贡贸易的机会，比如缩短朝贡时间间隔、扩展使团规模等等。但是相对中国而言，琉球等海上藩属国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小。

失去官方支持和参与的海上贸易陷入了低谷。

但是海上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抑制的。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国民生产与商品经济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白银成为了普遍流通的货币，并且被体系内的各个贸易伙伴所接受。在长期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依赖性。如明朝对日本实行禁止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计地吸引中国商贸的到来，除了加强从其他贸易伙伴手中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外（如侵略并控制作为贸易中转地的琉球），还保护、规范来日贸易的中国私人船队。急需拓展市场的商品经济与政府僵化和社会保守的抑制作用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古代中国的海上经贸网络存在着政治与

经济剥离的可能性。事实上，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对应，就存在着民间贸易（有学者称之为“帆船贸易”）。商人冒险出海贸易，甚至进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民间的贸易在补充官方贸易的同时，还开拓了体系内部的各条航线，将地区体系内的各个成员初步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葡萄牙的到来，刺激了明清时期沉闷的东亚海上贸易。（葡萄牙和澳门将在下一章有详细论述。）葡萄牙在进入东亚及其之后，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它“入乡随俗”，试图挤入朝贡贸易关系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官修史书一概将周边各国各民族与中原的友好往来事例记作“朝贡”。1667年到1670年葡萄牙派遣使团觐见康熙皇帝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国方面视做朝贡。1670年，葡萄牙使团经过反复交涉后被护送到北京。沿途，传教士和使节煞费苦心地在使团的船只旗帜上书写“大西洋国朝贺使臣”，企图以此来区别于“朝贡”。可惜《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将之写作“大西洋国入贡”。

使团此行的背景与清朝的迁海政策有关。为了防范郑成功反清势力，清朝政府大规模海禁，甚至连与澳门毗邻的香山县都在内迁之列。这严重影响了澳门这个依赖内地补给和贸易赢利的弹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门地方请求葡萄牙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来请求康熙放松对澳门的禁令，重新开放贸易。使团对康熙小心翼翼地陈述了澳门的困境，后者只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知道这些情况了。康熙最关心的是自己刚铲除鳌拜以后就“万邦来朝”的虚荣心满足，对葡萄牙国王大加赏赐。葡萄牙使节请求免除澳门海禁的目的却是没有下文了。海禁还在继续，澳门居民只能通过贿赂进行非法贸易。

两年后的1671年，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态，投其所好，进贡了一头狮子，以满足康熙帝“四方宾服”的心理。虽然贡物只有一只动物，但是康熙帝异常高兴，厚加赏赐，并带子亲临观看。朝野上下也纷纷赋诗作文歌颂朝廷，以表敬贺。这一次，清王朝网开一面，开放了澳门与广东的陆路贸易。依赖贸易生存的澳门终于

得到了一线生机。

这样的一来一往，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与葡萄牙的关注点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注意农业社会的安定环境和之中稳定、受人尊崇的生存状态。当时富有进取精神的葡萄牙人拉大了其中的政治与经济缝隙，为澳门的贸易赢得了可能。这在清朝的心目中却是双方“朝贡关系”的确立。

现在的研究表明，立足脚跟后的葡萄牙在澳门及东亚进行的是一种中转贸易。实际上，葡萄牙仅仅进行的是“搬运工”的作用，并没有从事生产，但是却获得了巨大了利润。这种转运贸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贸易网络，一是货物。葡萄牙在澳门站住脚以后，利用了东亚国际体系中原有的贸易网络，建立了全新的自己控制的“海上帝国”。同时中国广大的经济腹地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如果渠道顺畅，源源不断的商品涌到澳门，再经过葡萄牙人的辛勤劳动输往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国际体系的经济层面完全与政治剥离，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官方的海上贸易相平行的贸易网络。

海上经贸的剥离表现在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在各条航线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 16 世纪末期，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 20 万两。①

作为澳门贸易支点的中国内地，商品生产因之而发达起来。以离澳门最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子。明朝中叶，明朝初期的自给性塘鱼生产发展为了商品性的塘鱼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模式。这种三角洲低洼地开放的集约方式的出现，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养蚕植桑的极大发展。作为“丝绸之乡”的江南地区在明朝末期，手工业得以稳定发展，一方面是贸易促进的成果，同时也为中转贸易奠定了基础。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国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

①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4 页。

花样、重量，进行制作，以适应葡萄牙贸易的需要。由此，澳门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间接腐蚀作用可见一斑。①

剥离现象还表现在葡萄牙与日本、琉球、东南亚等中国藩属集中地区的贸易活动。学术界公认贸易是维系中国与藩属关系的重要手段。非官方贸易的活跃使得各藩属轻易能获得中国商品，也能取得相当的利润，正式的海上朝贡贸易反而地位自动下降了。

正是在明清时期，东亚地区逐渐融入了国际市场。17 世纪一艘典型的满载白银货物的葡萄牙商船从里斯本出发，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将之转化为当地货物到达澳门。他们从广州购入丝绸、茶叶等，再回到欧洲，从而可以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不仅是商人就是欧洲人，都不认为东亚仍然是脱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与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传播也渐渐展开。这时，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则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异常尴尬：民间的贸易与交流日益增长，但是东亚各国统治者却在维持着僵化封闭的国际体系。

值得说明的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剥离并不是完全的，政治仍然影响着贸易的进展。1670 年葡萄牙的使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般的情形是，中国加强对官方贸易的重视，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澳门的贸易就得到发展；如果中国方面放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进行，澳门的转口贸易就面临严重的竞争。②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合法的商人。本来应该由合法商人赚取的庞大利润却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而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目的之一——重农抑商。即使在这样的执政思路和政府的抑制下，古代中国的海上文明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繁盛庞大的规模。这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的祖先衣衫褴褛，惨淡经营。他们的付出可能是古代中国海上文明奇迹形成的主因。

---

①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4 页。

② 张廷茂：《澳门海上贸易的历史作用》，载于《澳门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 年。

中国，一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国度，一条历经劫波而豪情不灭的巨龙。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曾忽视过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强大来源于她的和平崛起……

第四节　海外华人华侨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从唐朝开始，就有大批中国先民通过海上网络移民他处。他们或避战乱，或逃饥荒，或为欧洲殖民者所“招募”，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并求发展。移民海外的潮流一直持续到现在，形成了华人华侨问题。华侨一词最早产生于清末《清实录·德宗本纪》。清政府于1900年签署《国籍条例》正式承认海外定居但有中国国籍的人为华侨。他们背井离乡原因各不相同，目的也不相同。但是所有海外华人华侨所经历的艰辛，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和他们对“根”的维持与把握却是相同的。

现在海外华人约有3500万，其中80%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其余的20%主要居住在北美、澳洲、欧洲及非洲。① 中国移民首先迁移的地区就是东南亚。经过数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华人华侨终于在各移居地站住了脚，形成了颇有实力的华人华侨群体。有人戏称，海外华人华侨势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远在唐宋时代，东南一带的中国人就兴起了移民潮流。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地区，海外经贸往来密切，当地百姓接触波斯商人或胡商日多，或多或少形成了经商致富的观念。心理既动，加上地理和政治条件的刺激，东南百姓开始了前往海外的旅程。他们一般选择到南洋一带去拓展生路，成为最早的海外华人。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政治大乱起于北方。南方相对安定，

① 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载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5卷1999年。

但是南方人在北方南下避难百姓的挤压下，也选择了向更南的海洋进军。古代中国的北方战乱和人口南渡促进了南方向南洋移民的潮流。原因有二：一是躲避战乱，二是出外谋生。承接了北方大量人口乃至整个中央政权的南方，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支撑起骤然增大的人口和上层建筑。而原来北方南下的官员贵族，财力不济，其中不少人不得不进入商业领域。而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是海外移民的推手。

史学家奈斯比特曾描述海外华人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天堑长江，把中国人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人。历史上，江北人追求仕途荣华，而江南人则重利重商。……多少世纪以来，南方的商贸和北方的官宦一直关系不顺。南方人对官府一向畏惧，竭力避免官府注意他们的财富，保持低姿态以不受贪官污吏的搜括。他们远离权力中心，只在必要的时候用行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生财之道。数百年来，南方商贾阶层已习惯于这种处世原则。他们在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商业，满足于改善家族的经济状况。一旦家乡遇上灾荒，他们便背井离乡到新天地去继续这种生存方式。"①

我们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商业的发展和人们的商业精神的出现，是南方移民潮的社会温床，加上古代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历史就难以阻止这一潮流的奔腾流泻了。

元末明初，南方战乱，各政权分立。朱元璋平灭张士诚和方国珍政权。二人的余部都是沿海居民，熟悉海上生活，大多数逃往海上，继续与明朝为敌，一再失败后散落于南洋各地；洪武年间，明朝又赐福建三十六姓百姓给琉球国；明中期以后，海盗和倭寇勾结反抗海禁政策，被击溃后不得不流落南洋，有国难回。海外华人华侨的队伍得到了壮大。

这样的情形在明末清初再次重演。明亡，南明残余势力与清朝周旋多年。永历帝被吴三桂追赶逃入缅甸，其余部宗族留居缅甸，后裔自称桂家，后来在当地开矿经商，颇有声望；张煌言与郑成功

① 转引自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合兵攻南京失败，部队解散，大部分逃到了南洋各地；杨彦迪等人率几千人逃入越南，在当地垦田自立，因为，他们帮助越南的阮氏政权，他们建立的村社称为“明乡”，他们的后裔称为“明乡人”；清朝早年，内地也有许多人因为文化和心理上难以调适，不满满清统治移民他乡。比如朱舜水到日本向德川幕府借兵复明不成，定居日本水户藩，传授王阳明学说，形成了日本的水户学派。

鸦片战争后，移民潮达到高潮。不过近代的中国移民史不再像古代历史上那般洒脱、自由，而是充满了血泪控诉。中国移民，尤其是劳工，像猪猡一样被人拳打脚踢，被用曾经贩运奴隶的船只运载出海，去向前途未卜的海洋。西方列强的劳力需求助长了血泪移民的风潮。如英荷殖民者为了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兴办烟草业、橡胶农场，开掘锡矿、金矿，营建公路、码头，兴建商贸城镇，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当时还没有从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加之当地民众对殖民者的反抗情绪很大，英荷殖民地的经济只能就近从广大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招募来大批契约劳工，即所谓“猪仔”。这些主要由中国破产农民构成的近代劳工到了殖民地后，承担了殖民地的建设重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没有实现打工赚钱的出国目的，更是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其中一些幸运者从劳工中分离出来，成为当地的零售商贩，慢慢地发展成了现代华人华侨。

说华人华侨的海外生存史是一部血泪史，一点都不言过其实。早期移民最初漂洋过海所到的地方是想像中的荒蛮之地，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都十分陌生。他们既不被当地接受，而自己也常想聚财致富后就荣归故里。但是古代中国执行的是严格的敌视移民政策。如康熙 1712 年诏令：“……所去之人，皆在国外，将知情者同往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员，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清朝中前期的传统国策对人民移居国外不仅禁止，还用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海外华侨在当时被视为“弃民”，甚至是“叛逆”，政府对他们的权益不但不加以维护和争取，而且对归国华侨还要加以制裁。同时移民所到的崭新环境，并

非想像中的乐土；回家改善家族生活的钱财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聚敛的。几乎所有的华人华侨最后都不得不留居在了移入地。

这些无亲无故、缺少田产家舍的中国移民只能开始从事基础性的职业：苦力、农夫和佣人。这样的职业也比较容易使新移民避免与旧有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减轻融入新社会的阻力。高强度的劳动常常使他们客死域外，亲朋好友与同伴们凄惨地助其尸骨还乡。早期移民当中的少数人能够在完成小额资本积累后，成为商贩。仅有成金字塔型的少数人继续前辈的生意，获取利润，发家致富。因为没有国籍，因为受到旧有社会结构的排斥，中国移民很少成为专业人士，极难跃升社会上流。前几代移民都是当地华人社会的垫脚石和铺路者。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世界，海外华人华侨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多数人不仅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而且事业有成。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不断增多，实力增强。还是以华人华侨集中的东南亚为例子。在早期的英荷种植园，一些有商贸意识或经验的中国移民逐渐演变成了英荷殖民公司、洋行与原住民间从事原材料收购和工业品销售的中间商。经过 100 年的惨淡经营，海外华人的主要经济活动便集中到了商贸方面。在印尼政府对华人经济各种限制的条件下，还出现了像李光前、林绍良、郭鹤年这样的“橡胶大王”“水泥大王”、“食糖大王”。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拥有 2 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华族只占到 600 余万人，约为总人口的 3% 强。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经济统计表明，印度尼西亚居全国控制地位的 25 个大商业集团中，有 17 个为华族所拥有。在泰国，华族人口大约占泰国总人口的约 10%。但是泰国是一个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华人与原住民的融入较少有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华族进行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环境较东南亚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在控制泰国经济的 100 个最富裕的商业家族中，大约 90 多个都是华人家族。而居泰国经济核心的曼谷，经济实力也主要由华人商贸家族控制。据一项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统计，华人拥有当时泰国商业和制造业资产的 90% 以及泰国银行资本的一半。

尽管处于绝对的人口劣势（新加坡除外）和并不如意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华侨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顽强的精神生存并壮大起来，构成所在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这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不能不称之为奇迹。①

海外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烙下了中国身影。唐人街、孔夫子、中餐厅、功夫都是显著的中国标志。现在亚、非、拉、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虽然历经一二百年的沧桑，街区、建筑却依然保持着中国式雕梁画柱、红檐绿瓦的传统色彩和风格。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节日民俗，成为各地的旅游观光景点。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和东京唐人街。像伦敦的唐人街位于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爵禄街，与皇家公园、白金汉宫相邻。早在 1880 年，受聘于英国东印度的一些中国海员在东伦敦区聚居下来，形成一个小型华人社区。这就是伦敦最早的唐人街。随后华人不断进入，使唐人街规模不断扩大，到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经济不断地发展，英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一些娱乐场所纷纷在爵禄街附近开业，也成为伦敦唐人街日后繁华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华人以餐馆业起家，克勤克俭，把昔日名不见经传的街坊建设成为今日世界知名、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他们不仅在繁荣华人经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中英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②

海外华人华侨的行为和成绩是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最好的宣传。我们在感激早期移民的辛劳和奉献的同时，更要为他们坚守中华文化之根的精神所折服。为了在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异乡维系住中国人的特性，海外华人华侨非常重视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在侨居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合心同力、争取同声说话。同时，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整体意识增强，使世界华人华侨联系更加紧密。也许这就是海外华人华侨成功的内在原因。

① 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② 苏振生：《世界著名的唐人街》，载于《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0 年第 10 期。

第七章 帝国噩梦，从裂痕到崩溃的屈辱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遭遇“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政治伦理、制度和政府统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融入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同时，国内政治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规则。中外政治交流达到了有史最高的程度。中国在屈辱的近代，从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发展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国将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崭新的政治影响。

本章描述的是从 16 世纪西方势力进入东亚开始到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间的历史。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历史是从属于西方历史的。中国失去了之前积极向外扩散文化的能力，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涌入中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本章不写西方对中国的刺激，也不写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而是重点书写中国的反应和这种反应的历史影响。

第一节　澳门，东西初识

16 世纪开始，西方势力携着近代文明进入东方。历史选择了珠江口西边的弹丸之地——澳门作为了中西初识的舞台。

西方国家自海上而来，大规模进入东亚，继续加大了古代东亚海上贸易体系业已存在的剥离现象。葡萄牙是第一个进入东亚进行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

从 15 世纪初起，为了寻求黄金与香料，也因为传播基督教的狂热，葡萄牙人在国家政权的推动和支持下，开始了以探索东方航路为主要内容的海外扩张活动。明朝正德九年（1514 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现在中国南海之滨。欧维士（Jorge Alvares）乘船抵达广东东莞县的屯门（现在香港境内），进行香料贸易。

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兼具商人与海盗的性质，常常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掠夺，不可避免地与明朝政府发生了军事冲突。1518 年，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三艘船只抵达屯门。他擅自在屯门建屋树栅，修筑炮台；像对待非洲黑人一样对待中国人；驱赶商船；掳掠船员；夺其财货；纵容部下抢劫百姓，蹂躏妇女；还勾结内地奸民，掠买人口，激起中国人民愤恨。1521 年，明政府决定进行清剿。广东巡海道副使汪宏进驻与屯门仅一海之隔的东莞南头镇，并以 50 艘战船对屯门形成半圆形包围圈，向葡军发动了进攻。《新安县志·卷十》记载："公（汪宏）亲冒风涛，指画方策，号召编民，率以大义，战而克之。"汪宏亲自到前方沿海地域了解情况，拟定作战计划。另外他还从附近地区招募了一批民兵，组成一支志气高昂的讨伐队伍。汪宏充分利用己之长，克敌之

短。葡萄牙人，凭借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但船大而进退不便，若遇浅水更是不易，所以，汪宏利用风势，对敌之船进行火攻，结果大获全胜。葡军虽然有远征队到来加入作战，仍然伤亡惨重。葡萄牙殖民者只得抛弃部分船只，仅乘三艘大船趁黑夜潜逃。

第二年，葡萄牙又派出舰队来到中国南海地区，与中国水师在新会西草湾一带相遇。中方拒绝葡方重返屯门的要求。双方发生激战，中国水师再次获胜。此后，葡人在浙江宁波府属、位于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建立居留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1548 年，浙江巡抚朱纨下令进攻双屿港，将那里的建筑物及港内船只一概焚毁，并用木石将港口填塞。

屯门之役、新会西草湾之役和双屿港之役是元朝之后，中国与欧洲国家第一次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势力还很强大，葡萄牙人认识到了武力征服的困难，因而改用行贿欺诈等手段，继续谋求在中国沿海立足，最终选择了澳门。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门》条中写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贿许之，时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矣。"

这条史实透露了两大信息：一是葡萄牙人借口船只遇险，请求上岸休整；二是他们上岸后贿赂海道副使汪柏，最终获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在这里，海道副使汪柏就成为了千古罪人。他是怎么接受贿赂的呢？

1556 年 1 月 15 日，葡萄牙船长索萨在致路易斯亲王的信中说："我在 1552 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挤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关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由于最初葡人不准居留在中国，早时达成这种协定是不可能的。为了达成这种协定，订定葡萄牙人不是满剌加人惯常叫我们的佛郎机。""和

平协定以及缴纳各种关税是由广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决定的。”在这里，这位葡萄牙船长承认了命令同胞们隐瞒自己身份的事实（佛郎机人在中国的名声太臭），接着明确说明和平贸易的展开是海道副使的命令。索萨的信印证了《广东通志》汪柏“徇贿许之”的说法。

索萨详细提到阿尔梅达对他的帮助，旅途往返、送礼和其他用途。阿尔梅达用了一大笔钱。汪柏很可能接受了贿赂。他分明知道葡人是佛郎机，为什么又要欺瞒朝廷，订定他们不是佛郎机才许通贸易？汪柏接受了葡人的贿赂，竭力为其遮瞒的解释是符合情理的。

之后葡萄牙贿赂海道副使，居留澳门成为了惯例。1572 年，葡萄牙人开始公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澳门历史进入葡人“租居”澳门阶段，直至 1849 年葡人拒绝缴纳地租为止。为什么葡萄牙人的居留“由暗到明”，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葡方文献记载，地租起源于对海道副使的贿赂，大约在 1572 年以前 10 年或 12 年已经开始。那一年，葡人通事（明朝所谓的“翻译”）贡萨尔维斯前来向海道副使送礼，交纳 500 两白银。但是当时有其他官员在座，海道副使很是尴尬，便说，这笔款还是要交国库的，要汇寄给提举。不知道是这位贡萨尔维斯翻译不懂得中国官场的“玄妙”，还是有意为之。反正客观的结果是对葡萄牙人非常有利。从此他们以 500 两白银的地租换取了在澳门的居留和贸易特权。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在澳门问题上采取了明智的策略。葡萄牙人在与中国王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失败后，现实、巧妙地利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和海上中国的基础。一方面，它利用了明清东亚贸易在中国政府抑制下的蓬勃发展，将政治与经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拉大；一方面，在政治上葡萄牙始终保持对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恭顺态度，不争虚名，务求实利。这使得葡萄牙在澳门逐渐扎住脚跟。

葡萄牙虽小，但在世界贸易领域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葡萄牙作为海外扩张的先驱者与航海大发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着丰

富的贸易经验与可观的贸易船队。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拥有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不仅飘扬着葡萄牙国旗的船只游弋于非洲海岸，不仅葡语商人叫卖于欧洲和拉美各市场，葡萄牙的船队甚至在直接穿越太平洋，从美洲向西，前往欧洲。① 以澳门为例。结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势力，澳门仅仅是其“海上帝国”的一个据点而已。从澳门出发的航线有：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

其次，如前所述，白银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东亚国际体系的通用货币。对于葡萄牙而言，白银正是这个国家过剩的东西。葡萄牙在非洲、美洲的大规模殖民扩张，发现了大量的贵金属矿产。加上殖民者在海外的掠夺所得等，黄金与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葡萄牙本土。同时欧洲在 16、17 世纪本身黄金与白银的开采量激增。英国率先实行了货币的金本位制度，法国、德国等国家跟进。这样就导致了白银的进一步过剩。

这种贵金属的互补关系在当时的贸易环境下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自然经济极端稳固，人们自给自足。而中国生产的茶叶却是西方的生产必需品（这一点在印度没有试种茶叶成功的时候尤为突出），它的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在西方的市场的竞争力也极端强大。葡萄牙却无法从欧洲拿出可以与之竞争的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葡萄牙商人的措施是利用中国对香料、木材等非洲、东南亚特产的有限需求，进行纯粹的中转贸易。他们所能够依赖的也只能是白银了。葡萄牙商船从非洲、印度等地采购物资前往中国贸易，换取中国的紧俏商品，再前往各条航线。

葡萄牙本身国力的落后，意味着它不能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更不用说武力手段了。同时澳门贸易的巨额财富引得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觊觎，它们曾几次企图侵占澳门。澳门的实力不足以与列强抗争，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国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恭顺的态度。在抵抗其他列强侵入中国强行获取贸易点方面，

① 张天泽著，王顺彬、王志邦译：《中葡通商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国与葡萄牙的利益是一致的。

正是葡萄牙国家本身具备的巨大贸易优势和在实际操作中的成功，澳门贸易在近四个世纪中蓬勃发展，获取了巨额利润，也活跃了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拉动了整个南方的商品经济发展。澳门特殊地位的存在是符合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的地方利益的。

1666 年底，清朝严格海禁。5000—6000 名士兵组成的舰队封锁了澳门海域。葡萄牙人甚至产生了撤退的念头。1667 年初，两广总督卢兴祖派遣香山县知县姚启圣多次到澳门以许以贸易为名，公然索取贿赂。取得贿赂的卢兴祖不执行朝廷的迁海令，并且为免迁澳门上疏朝廷。在澳门发展的历史上，商人们对贿赂一词与贸易一样熟悉。

然而卢兴祖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地方的利益。澳门每年上缴的税收在 2 万两以上，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府具有重要的用途（特别是在一个机械计划的税收和开支制度下）。同时澳门的转口需要向广东买进的货物，与广东乡绅、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内地的商品生产需要一个销售渠道。澳门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通道。

澳门的特殊贡献还在于它开始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真实情况汇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也促使它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探讨与中国展开全面贸易的可能。西方世界采取了主动姿态。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走在了接触中国的前头。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九月，英国派遣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为全权大使，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 90 人组成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 600 箱礼品，乘船自朴次茅斯港启程出使清朝。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 83 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英国政府训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贸易条件、互换常驻使节等要求；事先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要求清帝准予直接进京晋见。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并准其所请，指派大员在天津迎接。1793 年 8 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

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然而，英国使团的先导旗上醒目书写着“英吉利国贡使”。在乾隆心中，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自己生辰的藩属国使节。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中，理解不了近代的国际规则和外交关系。这注定了马戛尔尼使命的失败。

一到热河，中英双方就关于觐见礼节发生了争执。马戛尔尼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对英使的“妄自骄矜”表示不满，进而认为英人来华别有所图。但晚年的乾隆仍“慷慨”地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①

9 月 14 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使团因多次与清廷交涉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遂于 10 月 3 日提出六点书面要求：1. 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2. 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3. 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4. 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5. 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6. 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此六条观点以贸易为核心要求，但无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勃兴的英国强横的一面。

乾隆帝在英国人的书面要求上批复了一句载入外交史册的观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廷以英国要求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禁止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

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 月 7 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 9 月回到英国。作为新兴的殖民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大门，扩展贸

① 笔者本科学习中国外交史时，期末的第一道题目就是选择题，选择马戛尔尼到底向乾隆帝行了什么礼。

易和政治势力，遭到清朝断然拒绝。在中西初步接触的这一回合，乾隆帝的行为虽然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其盲目自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马戛尔尼使团在这一回合中也刺探了中国的实情。使团的经历和回欧洲的宣传，向欧洲社会宣达了一个保守帝国的消极一面。中国热潮中对中国的完美认识和过高评价自此降温。

第二节　天朝迷梦，列强对东亚体系的冲击

世界各国在交往过程中，竞争关系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进入近代后，世界逐渐连成一体，竞争关系逐渐激化。近代的国际竞争主要集中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和东亚各国之间。遗憾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在遭到强烈打击前一直沉浸在自我构造的“天朝迷梦”之中。

天朝迷梦的主要内容是自满自大，固步自封；坚信四海之上，中国为尊。而坚守朝贡体系则是天朝迷梦的主要表现。

朝贡体系从中方角度来说，要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这种追求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的，反映在体系中就是注重道德因素的力量，强调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希望各国在中国的中央政权领导下，恪尽藩守，和睦相伴。它忽视对未知地域的探索，轻视与体系外存在的联系；对体系内部，求稳的心理也要求内部的秩序、规范等等，固步自封，少有创新。

在自我设定的圈子里陶醉久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王朝开始自大起来，慢慢滑入了对外部事物漠不关心、盲目愚昧的境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球案”事起。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便是清朝是否知道琉球的两属状态。有人认为“鉴于当时中国的闭塞，不知道的可能性比较大”。堪称精练能干的洋务官员左宗棠于1881年奏请严备海防的说贴中说：“……日本与琉球共处一方，由来已久。琉之为日本属国与否，中国无从详知……”① 有学者指出，清政府官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7页。转引自董书慧：《论清末中日围绕琉球问题的争端》。

员，甚至是作为外交决策者的李鸿章，也到底部分迷信了日本关于琉球完全附属于萨摩的“论断”了。

在对外政策上，清朝已经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1684 年台湾统一后，清朝一度开放了主要防范反清势力的海禁，但为期不长。康熙不久重新执行海禁，而这次是防范所有外国的。如五十六年（1718 年）颁布“禁海令”，严禁华人出海，严禁贩卖船只粮食等给外人，禁止华人居留外国；对外商来华船只严加防范。“1725 年，雍正下令严行禁教，驱逐在华传教士，清朝的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宽松政策宣告结束。这种政策首先是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目的，当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它却人为地隔断了中西交流。”实际上它的许多内容是针对国内人民的，其实质乃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宣布将江、浙、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广州自此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同时清政府严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完全禁止出口的包括粮食、铜铁、硫磺、硝石、书籍等，丝及其制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受到严格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禁丝出洋：“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百斤照米过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狭隘的朝贡和严弛不定的海禁并行，是明清对外政策的主线。

中国内向化的思想和因之所规划的内容导致了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行为僵化。黄枝连先生认为这一体系“本质上就是相对地保守，倾向于产生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在它里面的种种次文化里，都有从‘相对固定’趋向‘绝对固定’的极端主义现象”。清朝沿用明例，雍正朝沿用顺治朝旧例，乾隆朝沿用雍正朝故事，“定例”、“依例”等字眼充斥各官方史料。大如请求贡使进京的题本在“繁复迟缓”的内阁中层层处理，小到国子监中琉球生的草铺拆除也要各方互相知会。

正如清代专制统治大为加强，事无巨细，俱决于皇一样，在执行对外交往时，中方的执行者——官僚机构运作机械，暮气沉沉。与机械性相伴随的腐败蔓延，腐蚀着整个体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九月初二，帝下旨整肃江南吏治。前据江苏学政刘墉奏，该省生监滋事妄为，府县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但对百姓又不欲太分皂白，官场互售其奸。乾隆深以为是，认为封疆懈弛之弊，渐染日深。各官以无事为福，且更事既多，上和下睦之风，竟成故智。痛责并命整饬一省吏治，当属罕见；其中言语更是对当时政制暮气的最好描述。

当西方列强在近代民族国家形式的武装下，拿着近代工业化生产的巨大物质成果汹涌澎湃地扑向世界其他地区之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与中华帝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次次的打击下，中华帝国努力营造的华夷秩序趋于瓦解，终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彻底崩溃。周边国家（除了日本）纷纷被西方国家殖民，中华帝国也频频出现边疆危机，中国人在痛苦中思考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战略。

在世界观上，天下观念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冲突。“由于我们的天下观念，导致我们不认为对方民族和我们有同等的地位，我们也就不重视自己的身份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产生。”“天下观念是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西方和中国接触前，双方在理念上最大的不同。”① 欧洲国家经过战争砧板上的一次次敲打，你我敌友，国家疆界，在各自心目中一清二白。尽管欧洲国际关系中充满污秽肮脏之处，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沉浸在天下观念中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华夷秩序也是以中国的绝对支配地位为前提的。华夷秩序中的其他国家必须接受中国的中心地位，奉中华正朔，由中国册封而获得政治权威。

① 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版，第 348、351 页。

这种巨大的差异体现为领土意识、国际法意识和外交礼仪等一系列冲突。康熙年间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问题。清朝在军事胜利的前提下，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反而在领土这一国家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上做出了让步。中俄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尼布楚及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地划归俄国。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举措。英国殖民军在侵略缅甸之时，在缅甸北部踌躇不前，无可适从。因为传统上，中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边界线。英军担心挑起与中国的事端，而在侵略缅甸问题上思虑再三。这是中西方在实际测定边界与以传统控制线为边界两种思想上的差异的体现。这个差异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中国边疆问题。“琉球处分”发生时，朝野舆论在琉球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国内思想思考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和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社稷”，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外交自然处于被动。1872 年，日本“处分”琉球，七年后正式吞并琉球国。

当西方列强接触到华夷秩序之时，它们凭借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强迫朝贡体系中的各国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与实践，凭借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成果将各国纳入到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通过了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 2000 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①

这样僵化的体制使得清朝自身异常脆弱。道光年间，英人数千来犯。清朝统治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和不定，举止失措。沿海各省矛盾重重，反应迟缓。因循守旧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东亚国际体系也遭受到了第一次直接的根本破坏。其迹象早在乾隆年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间便已埋下了伏笔。

1839 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道光时期的清王朝将当时的贸易逆差和对外交往呈现出来的颓势归咎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鸦片输入，因此，选择了禁烟作为抵抗西方势力膨胀、维护朝贡体系的中心工作。禁烟从短时期说是成功的，也是获得中国普通百姓支持的。

鸦片贸易遭到取缔后，英国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 年 10 月 1 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1840 年 4 月，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支付军费案。6 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 40 余艘及士兵 4000 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的结果是，拥兵百万的清王朝被数千名远道而来的英国远征军打败。

1842 年 8 月，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连同之后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英国强迫清王朝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开始逐渐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权。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之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中国各方面的主权逐渐丧失，开始了被殖民化的悲惨历程。之后，其他西方列强随之而至，以澳门为接触与活动中心，迫使清朝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天朝迷梦虽然被无情地击碎，但中国人的心理依然停留在迷梦中，不愿意清醒。而传统中国牢固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时半刻能够瓦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的程度非常有限。世界发现，中外贸易的规模和中外交流的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西方将

之归为中国开放程度不够，中国人缺乏诚意。

于是在西方的策划下，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次，中国人真的是被打蒙了。

1856 年 10 月，英国利用亚罗号[①]事件制造战争借口，声称中国船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清政府送还在该船逮捕的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赔礼道歉。10 月 23 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不久后，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负责对华战争。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②]向中国交涉。1857 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美、俄两国看到战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也支持英、法。

1857 年 12 月 29 日，英法联军 5600 余人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成立了傀儡政府。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死。

1858 年 4 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进行谈判。5 月 20 日，英法军舰炮轰并攻陷了大沽炮台。26 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于 6 月 26、27 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获得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特权；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实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 2.5% 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停身份，分别于 6 月 13、18 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2 款、中美《天津

① 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船只，且在事件发生时注册期已过。船上也的确发现了海盗。

② 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 1856 年 2 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又称西林教案。

条约》30 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

咸丰皇帝与道光皇帝的思维一样，在条约签订后又想单方面修改条约，尤其是废除西方公使常驻北京与自己当面交涉外交。英、法政府也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于是坚持《天津条约》各项条款不容变易，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

1859 年 6 月 25 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遭到守军英勇抵抗。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 400 多人。第二年开春 2 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 1. 5 万余人，法军约 7000 人，扩大侵华战争。而清政府则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导致英法联军连续攻占大沽、天津，并兵临北京城下。9 月 22 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狩猎热河”，令其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10 月 13 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

10 月 24、25 日，奕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俄国又以调停为名，逼迫奕䜣于 11 月 14 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 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 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

这五年间的英法联军侵华之役，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中国人必须彻底走出迷梦，思考如何与近代世界交往的问题了。

第三节　中西和好的黄金时期（上）

对于清朝最高统治层来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圆明园对他们的刺激远远不如“辛酉政变”的冲击力大。出逃热河的咸丰皇帝死在了承德，同治皇帝即位。同治生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发动政变，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近半个世纪的掌控。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䜣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成为了新权力核心的主角之一。新的权力核心在对外交往上采取了和好图强的战略。

客观上，新的权力核心都刚从咸丰末年的内外交困中走出来。此时清政府依然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他们不得不承认清朝衰落的现实，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西方列强。主观上，奕䜣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积极入世、开眼看世界的务实政治家。他们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实权，身处战争前线。以慈禧太后为首领的新权力核心开始联合地方开明官僚，实行自强新政。

这段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实质上是中西和好的黄金时间。中国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紧跟着经济形式、科技文化、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制度都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和巩固。

中外和好的第一声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长江中流发出的。为了向东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开始在湘军中引进西方军事机械和工艺，武装军队，开始了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长达 30

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朝开明官僚在严重的内外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求富的社会运动。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洋务派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活动。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的有奕䜣、桂良、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辛酉新人回到北京掌握政权后，为了适应外交需要和地方呼声，1861 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䜣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中国传统政治机构开始近代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为了中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平台。

咸丰十年（1860 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 1 月，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 年 3 月）成立。总理衙门还鹤立在传统的政治机构中，囊括了所有的近代政治事务。除了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外，总理衙门还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①

以总理衙门为突破口，传统中国政治中设立了更多的近代机构。海关税务司署就是近代政治机构的代表。海关税务司署在发展中的窘境很好地体现了近代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浓厚的“近代特色”。

海关税务司署是对近代中国海关行实施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其首脑为海关税务司。海关税务司名为中国海关监督雇佣之

①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䜣、桂良、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䜣任职时间长达 28 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 10 人）、额外章京（满汉各 8 人）。

人，实际是中国海关的主宰。1853 年 9 月小刀会在上海起义，设在英租界的中国海关遭到抢劫，复为英国水兵占领。英国驻沪领事借口中国海关机构不复存在，遂与美、法领事协商，宣布由各国领事代征海关税饷。中国方面为保证关税收入，于 1854 年 2 月在苏州河北岸重设上海海关，随后又在黄浦江的闵行镇和苏州河的白鹤渚设立两个税卡，征收出口丝、茶关税。这些措施受到外国领事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压力，为了恢复海关税款收入，于 6 月 29 日派上海道台吴健彰与三国领事会谈并达成两项协议，成立一个由三名领事代表组成的税务司署。规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由三国领事各自挑选和推荐，由上海道台任命。他们有权检查船只的进出、货物的装卸以及报关结关等各项单据，侦察一切违章和作弊行为。海关税务司的违法和渎职，由道台和三国领事组成的混合法庭调查处理。税务司署附属机构的全体华洋人员，也必须对混合法庭负责。他们的去留必须经过税务司的建议，由道台做出决定，而且不得迟延。

1854 年 7 月 12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税务司在上海出现，执行中国海关行政的权力。上海海关税务司成立后，10 年之中，税务司制扩展到广州、汕头、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淡水、台南、牛庄等 13 个通商口岸。1861 年在各关税务司之上，又设立一名总税务司。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各级税务司完全听命于外国公使和领事，中国地方官甚至连将军、总督都无权加以管束。总税务司在海关范围以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

1863 年 11 月，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他在任职期间，不但把中国海关完全置于英国人控制之下，而且还把他自己的活动伸向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海关税务司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 年，海关税务司才真正结束。

在海关设立之前，清朝的税收制度沿用几百年而不变，体制庞杂腐败。嘉庆十二年（1812 年）记有田赋 3284 万两白银，435 万

石粮食；漕粮 358 万石；盐税 637 万两白银；杂赋 232 万两白银；耗羡 43 万两白银。而关税则是固定为一年 450 万两。关税解送原则是多留少补。至于其他税收被分成各种用途，比如 100 两的银子有的解到京师户部，有的运到山东修河道，剩下的十几两则是送去浙江某清军营地的。而这 100 两的白银则是从贵州收上来的。户部只是负责账面上的管理，不问其低能和腐败，也没有人去想是否要改变一下。

赫德出任总税务司后，改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海关机关。一、摆脱腐朽的清朝机关的束缚，建立先进的人事制度。这是一种近代的公务员制度。赫德设铨叙科，主管人事工作。原则上洋人和华人都可以竞争海关职务。历史上华人丁贵堂曾经晋升为副总税务司。[①] 二、引进先进的会计制度，办公费用与税收分开；同时实行先进的报税制度，依靠先进的统计制度海关每年都公布海关报告。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统计科首次在中国出现，分管会计、税帐、不动产和养老金账目。三、海关实行档案制度。海关机要科管理重要文件，汉文科负责与清朝来往的文件，设于上海的造册处主管编制和印刷统计，供给账册、表格、文具等。茅海建先生评价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机构”。的确，这个机构没有传统机构顽固扯皮腐败和庞杂的老毛病，赫德的每一条命令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它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机关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击。在清朝末期，海关税收猛增，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和厘金的财政来源。同时税金的流动性也是前两者没法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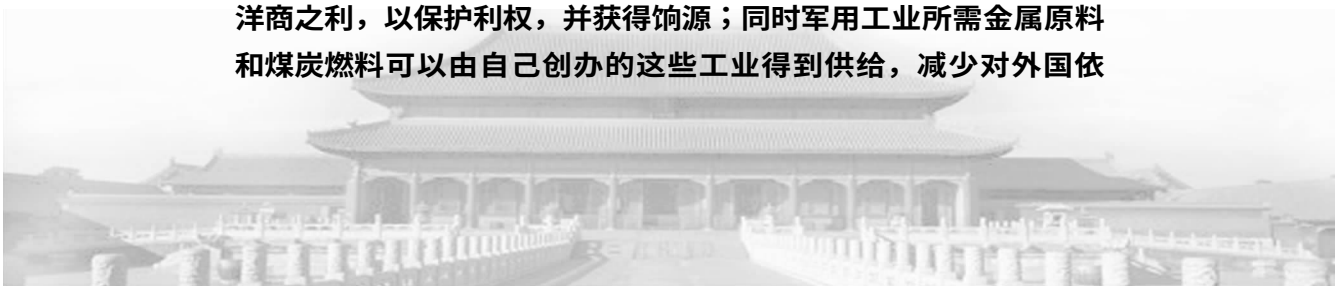
赫德“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是“中国大臣们唯一获得情报和建议的桥梁”。赫德的海关几乎插手 19 世纪 60 年代后中国所有重大的外交事件。赫德是英国外交官出身，他必然为英国利益考虑。但他同时也努力把近代外交知识和思想介绍入中国，将中国带上正常的外交轨道（形式上的），进而影响了清朝的外交制度。

① 林代昭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8 页。

赫德在外交上的行为有他作为一个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前外交官的自私的一面，有对中国传统和文化不甚了解所造成的误会和蛮横的一面，但也有不少作为一位在外交上接受了近代思想和一系列规范的“老师”对“学生”的谆谆诱导。赫德历任清政府的副海关长，总税务司，兼任二品衔按察使，并赏一品顶戴。在任期间，他向朝廷推荐了大批熟悉近代事务的人才，提出了很多有关政治改革和机构设置的建议。后人时常批评他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行为的初衷，更要看其行为的客观结果。赫德对清朝提供的许多建议的初衷不见得就是坏的，而赫德在向中国引进先进的政治制度及带引中国走上近代政治轨道上是做出了相当贡献的。

制度的创设由上而下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先是曾国藩1861年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镇压起义；续起的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开始大规模地创办近代军用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19世纪70年代初，为了适应开始紧张的中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新式陆军的练军。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以及南洋水师受挫。1885年后，重点建设北洋海军，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1888年北洋舰队初步成军，舰队编制基本采自英国。与海军建设相适应，沿海各重要海口还设置了炮台等防御工事。

在经济上，因为内乱平定，清廷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转而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依



赖。同时洋务运动还创办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等民用工业企业。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最终孕育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走向世界。清朝到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 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清廷请六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恭亲王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是个旗人官员，长期在山西做县官。当时大部分官员们仍然思维僵化，自满封闭，视出国考察为畏途，也都不愿去。年已 63 岁的斌椿却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阻，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受中国政府派遣，成为中国向外派遣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同治五年（1866 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照顾自己起居的儿子广英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 110 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的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成为直接见证了西方近代科技与文明的中国官员。

自此而后，中国向外派遣采访政俗、交往政治的使节增多，并在外常驻，发展起了近代外交制度。咸丰皇帝对与外国使节正面交往的顾虑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第四节　中西和好的黄金时期（下）

人的思维的变迁是历史变迁的最深层内容。中国人的思维在近代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国人去检讨民族的制度、文化与思想，高强度的中西文化碰撞刺激了国人的思维变迁。

洋务运动中，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具有世界视野和西方思想的交流人才。洋务派培养新式人才是为了适应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建设的需要。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广方言馆。在实践中，中国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为培养更多的通晓洋务的人才，除了开办学堂，清朝开始派遣人员出国留学。

说到近代中国的留学，不得不提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1828—1912）。容闳，广东香山南屏镇人，出身贫寒。1847年初赴美学习，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55年回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上海宝顺洋行谋生。他曾经在1860年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洪仁玕提出编练新军、改良政治、健全教育、派遣留学等建议，但没有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接受。后来容闳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

洋务运动恰恰需要容闳这样的洋务人才。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任天津教案中方翻译。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建议选派颖秀青年，送出国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

兰彬、容闳等人负责。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得知清朝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最早的第一批学生送往美国留学，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朝廷决定挑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

大洋彼岸的“花旗”美国，在当时普通的国人心目中毫无概念。人们对蛮夷之邦的偏执认识严重阻碍了学生的选择。况且让父母将未成年的儿子送往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一别15年，无异于虎口夺子。容闳在东南地区挑选学生时，官宦人家和一般家庭都敬而远之。只有贫寒之家才为了儿子的前途，愿意冒险一搏。当年留学生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向容闳出具的保证书就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满纸辛酸，足可见詹家的心情。后来，容闳只得前往香港招募，才勉强凑足额。

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幼童在容闳率领下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戴着瓜皮帽，穿着蓝缎褂和黑布鞋的孩子们立即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和欢迎。到美国后，按照中美双方商定，孩子们被分别安排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生活，以便更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和语言环境。对孩子们来说，初期的考验是艰巨的：要尽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习俗；要补习英文；要集中起来学中文。中方随行官员要求严厉，限定每人每周交一篇文言文作文。谁交不上来，就打谁的屁股。经过两三年的补习、适应，多数人进入了中等学校学习。孩子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成绩优良。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孩子们在接受全新教育的同时，也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孩子勤奋的学习和特有的适应能力。双方甚至建立了亲人般的关系。

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

从耶鲁大学毕业。另有三人夭折美国。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留学生习惯于美国穿戴，逐渐放弃了中式服装。一些人开始厌恶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索性把辫子剪掉，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随行的清朝官员发现剪辫子的情况后，在严厉训斥之余上奏清廷。清朝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巩固王朝统治。而源源不断发来的在美留学生剪辫子、信奉基督教等情况，使得朝廷重新评价留学的价值。

客观上，教育是整体教育。清王朝只想让孩子们接受科技工艺教育，而禁止他们接触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留学生们原本接受的儒家教育就少。耳濡目染在西方的教育环境中，他们对封建礼教、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信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伦理和思想。这样的变化在现代人看来是自然的。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朝官员看来，就是大逆不道，违背了派遣的本意。

1876 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到任，先是开除了两名信奉基督教的留学生；加重学生们的中文课程，加强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容闳支持孩子们的不满情绪与表达，这更加强了吴子登对留学项目的敌视，不断向国内反映留学生洋化，不堪使用。对国内政治缺乏敏感的容闳也不反驳。1881 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从 8 月 21 日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启程回国。①

从 1872 年到 1875 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

① 容闳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光绪元年（1875 年），兼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 1881 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 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1912 年 4 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

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福州船政局学生为主又派遣留学生，均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晚清的留学项目，让西方直观地看到了中国和中国人。这一代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给外国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留学经历及其实践也打破了中国社会保守封闭的状态，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开明人士做了走向世界、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努力，但在当时的中西互识上，中国还是远远地落在了西方的后头。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中国输于蕞尔小国的结果彻底终结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家体系，粉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欧洲和美国也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卸任的美国驻华代办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① 出版了他在华回忆录《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②，代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19 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愚昧落后。因为，中国专制保守，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近代医疗、交通设施贫乏，甚至千百年来固执地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力，但就像一位穿着破旧丝绸衣服的老太，守着宝藏向西方国家要饭吃。虽然不能说这是全部西方人的观点，但它的确是实际的、趋向性的。110 年前的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作“不受欢迎的移民”，审

① 切斯特·何尔康比（1844—1912），中文名何天爵，1869 年来华，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 年到 1885 年，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参赞、署理公使等职。任外交官期间曾协助起草 1880 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参与 1882 年美国和朝鲜签订条约，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接待陪同，经历了中法战争的外交过程，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 年归国。另撰有《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等作品。

② 《中国人本色》，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

视者既往的敬羡和热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何天爵就是其中一位。他抛弃西方中心的偏见，真正地去认识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

以政治认识为例。何天爵反对简单地以“绝对专制”来概括中国政治。他观察到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对现行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修改行为或者那样的努力，进而认识到了在中国国情下，传统中国政治的合理方面。“整套制度不仅存在，而且制度统治下的人民也都赞同满意于这一制度。这套制度从未在本国受过批判还被周边的弱小民族所仿照，扩展影响。它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政权制度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它统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的人民，并且为百姓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就像过去一样，无数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在它的统治下依然心满意足。必须承认，中国的权力制度必然存在积极正面的内容，存在呼唤激发人的善良本性的因素。”（《中国人本色》 第二章） 在对中国政府和自己接触的政治人物的剖析中，何天爵抓住了中国宗法家长制的核心，构造出了中国政治的认识系统。他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英文“president”一词进入中国后，晚清国人将其意译为“总统”，取总统职权“总而统之”的特点而定。从总统一词的译法，对比清朝存在的“都统”、“统领”、“总管”等官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试图将这一现代政治名词划入中国政治习惯的努力。曾任福建巡抚的晚清思想家徐继畬惊讶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

（徐继畬：《瀛环志略》）徐继畬的认识一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思想，二来并不深入。他看到了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首创共和的功绩，但缺乏深入比较认识的能力。稍晚的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

权位如徐张者、睿智如徐张者，认识尚如此，更何况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衣衫褴褛又目不识丁的百姓们。1881 年，学监吴子登请求清廷将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到朝廷批准。从 8 月 21 日起，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直接进行中美交流，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留学义举就此打住。

1895 年，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轻易指责中国人远比真正理解他们要容易得多。"（《中国人本色》前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给出了西方人对中西互识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可以以更高的层次、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和他人，如果我们可以用更理想的、标准的人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况就会更好。更宽广的视角不但能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精确，更加合理，还有更为深远重要的价值。这样做能使人们更加宽容、友爱、和睦相待，信任人们团结、高贵的本质。"（《中国人本色》前言）

第五节　战争不断，威风不再

中外和好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近代西方体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逼近中国。7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等列强纷纷侵入中国领土。沙俄侵略新疆，英国觊觎滇藏，日美进犯台湾，造成中国日益恶化的边疆危机，其后更演化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这些战争无一不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一次次的丧权辱国表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既没有巩固清朝的统治，更没有实现富国强兵。中国之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是肤浅的，是不成功的。国人的心理和民族的命运在向屈辱的深渊沉沦。

19世纪中期，法国逐步将越南蚕食殆尽，使后者成为了自己的保护国。为了扩大在远东利益的殖民利益，法国进而提出了包括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大印度支那计划，企图变中国南方为法国殖民地。

1884年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方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要求清军退回中国境内，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法国以北黎冲突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整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2.5亿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清政府随即与法方在上海展开外交接触，无果。

法国蓄意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8月间，北上的法国舰队先后在台湾基隆和福建马江挑起战争。虽然法军在台湾被击退，但法军在福建击毁马尾船厂，重创福建水师。8月26日，清廷颁发

上谕，向法国宣战。

10 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被击退。由于无法深入，转而从 10 月 23 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 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3 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孤拔伤重而亡。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4 年 2 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10 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老将冯子材受命驰赴镇南关部署战守。3 月 23 日，法军再次进犯镇南关，冯子材亲率士卒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本来是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 年 4 月 4 日，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签订停战协定。中法战争至此停止。1885 年 5 月 13 日，清政府命李鸿章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6 月 9 日签订《中法新约》。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4 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军赴朝镇压。日本亦派兵入朝。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和东学党起义军已签订休战和约。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 月 13 日请求中国撤兵。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但日本决心扩大事端，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23 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 日，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挑起战争。8 月 1 日，中

日政府同时宣战。

战争的爆发，对清朝来说是当头棒喝。日本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眼中是东海蕞尔小国，唯中国马首是瞻；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是蓄谋以久、扩张势力跃升国际地位的冒险之战。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扩军备战。而日本全盘西化、全民奋进的环境，使得小小岛国实力倍增。同样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中国缺的是日本那般深入的西化，缺的是日本那样的全民狂热。殊不知，天道酬勤。

战争开始后，清朝军队就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在黄海海战中，作为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很快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将战场转移到中国境内。日军分兵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仅 10 天时间，清军百余营 6 万多人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随着战争失利，清政府于 1895 年初期不得不向日求和。4 月 17 日，李鸿章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是清朝末年中国遭受的巨大耻辱。战争历时九个月，中国损失兵力高达 6 万人，丢失了朝鲜这个重要的战略盟友，割让台湾给日本，并使得日本势力渗透入东南和辽东一带。而日本获得了高出日本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亿两白银赔款，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正因如此，此后日本制定了以占领中国为目的的战争国策，并做了长期的准备，终于发动 1937—1945 年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说这场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相互地位以及中日关系，并导致了两国从此兵连祸结，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更可怕的是其他国家正在虎视眈眈地窥探着大捞一笔的机会。1895 年初，甲午战争中国败局已定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喉舌《新闻报》就鼓吹抓住“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一签订，瓜分中国的更加喧嚣的声音随之而起。《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

（R. W. Litt - le）叫嚣：“中国应该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管理它。”战后访问远东的《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V. I. Chirol）叫嚷，英国应该立即抛弃联华制俄的虚妄想法。他说：中国现在“如此一筹莫展，以致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它的内部如此“衰败，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他认为英国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沙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失败欣喜若狂，他们宣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鼓吹立即采取实际行动。在这些人的煽惑下，中国遭受瓜分的形势日益严重。日、中两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兴起，一个沉沦。①

① 丁名楠主编：《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六节　铁骑踏进紫禁城

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争相抢夺“阳光下的地盘”，而在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正发生着三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二是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推行改革，但在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镇压之下惨遭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改革的一线生机被痛心地扼杀。三是义和团运动，最后被悲惨地断送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下。三件事，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社会影响也不同。可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每一个事件过后总是导致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①]帝国的沦落历历在目。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直就不如欧洲和美洲的。这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见一斑。还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对中国也有很高的评价。西方曾称赞中国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与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很多。特别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国”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这具古老的躯体丧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闻风而至的敌人也在寻找着机会。正如《草原帝国》

① 李文海：《八国联军侵华百周年断想》，载于《理论与现代化》2001 年第 1 期。

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说：“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这些野蛮人吸引到中国来。”而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伟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前之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后，就无情的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地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滑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①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于是，1895 年 4 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 18 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 1300 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变法主张。

特别重要的是从 1898 年 6 月 21 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 15 万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123 页。

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①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

① 雷颐：《探索戊戌失败之文化因素》，载于2002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11 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 年 8 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 年 10 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1897 年至 1898 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 年至 1897 年全国共有学会、学堂、报馆等共 300 余个，出版 30 多种报刊，表明维新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1897 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声浪日高。康有为迅速从广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1898 年 1 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 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也先后成立。士大夫经常集会，讨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 月 11 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在此后到慈禧太后于 9 月 21 日发动政变的 103 天中，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维新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史称“百日维新”。当时光绪帝发布的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

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 年 9 月 21 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派发动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这六位志士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变法的失败早在意料之中。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可是变法中最缺乏的就是强有力的政府。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

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而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短短的 103 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 300 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另外，维新派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中国的"天朝上国"梦。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改革更加困难。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于 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认同感。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

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极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赶不上衰败的速度。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悉数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历史课本早已将 19 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同道者所听懂，以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虽然激起了一丝涟漪，可是没有办法惊起千重浪。

知识分子失败了，中国的农民站起来了。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于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 1899 年起事态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卷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对抗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膛炮装备的八国联军。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只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蹂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它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可惜它最后被自己所忠诚的朝廷出卖而遭到扼杀。这次运动

却给西方国家入侵制造了口实。很快，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开进了紫禁城。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分区占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后住在慈禧太后原先居住的西苑仪鸾殿（后为怀仁堂），其内藏珍宝极多。不久，该殿即遭焚毁，据称这是偷盗者纵火灭迹。抢劫更是随处可见，瓦德西在《拳乱日记》里说侵略军攻陷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皇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劫后残余的《永乐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册”。此外遗失的珍贵图书“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十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此时的清廷已经逃跑了。后来避过了风头的慈禧太后对列强还保留着大清朝还是暗自庆幸的，赶紧与 11 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安安稳稳地过最后的几年。

古老的中国在 19 世纪末一点一点地沉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由此断送了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也都没有让中国这头被拿破仑称作“睡狮”的狮子醒过来。同样，30 多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再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也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面对挑战；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太后仍然可以相对而言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可惜的是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 10 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它腐败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 20 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被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①

① 许知远：《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载于《中国报道电子杂志》总第 427 期。

附录　中外历史大事记

中外历史大事记		
200、300 万年前		东非出现原始人类
约 170 万年	云南元谋人出现	
前 32 世纪		埃及第一王朝形成
前 22 世纪	夏朝开始	
前 21 世纪		古巴比伦时代，爱琴海迈锡尼文明出现
前 1792 年		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在位，君主专制确立
前 17 世纪	商朝开始	小亚细亚赫梯王国开始
前 14 世纪	盘庚迁殷	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
前 11 世纪	西周开始	前 1125 年，亚述败巴比伦
前 11 世纪至前 7 世纪		古印度雅利安人国家开始形成，婆罗门教流传；古西亚新亚述帝国时期。
前 9 世纪	前 841 年，国人暴动，放逐厉王，实行共和行政，中国历史确实纪年开始	希腊《荷马史诗》编集
前 8 至前 6 世纪		古罗马王政时代
前 776 年	中国史载世界上最早的日蚀记录。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前 722 年	《春秋》记事始于本年，为世界上最早的编年史	
前 770 年	周平王东迁	
前 685 年	齐桓公在位（- 前 643）	

前660年		相传日本开始建国
前623年		释迦牟尼在世
前604至前561年		新巴比伦国尼布甲尼撒二世修建空中花园，灭犹太国，将犹太人掳往巴比伦。
前594年	鲁国实行初税亩，按亩征税	雅典执政官梭伦实行政治经济改革
前551年	孔丘出生（-前479）	
约前509年		古罗马共和时代开始
约前500至前449年		希波战争，古希腊城邦反抗波斯帝国侵略
前475年	田氏篡齐	
前485至前425年		古希腊希罗多德写作《希波战争史》（即《历史》），为西方史学开山之作。
前469年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世（-前399）
前427年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世（-前322）
前403年	三家分晋	
前390年	孟轲在世（-前305）	
前384年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世（-前322）
前359年	秦国商鞅变法	
前334至前324年		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前273年		印度阿育王在位（-前232年）

前 221 年	秦统一全中国	
前 206 年	刘邦项羽先后入咸阳，秦亡	
前 202 年	项羽乌江自刎，刘邦称帝	
前 179 年至前 139 年	文景之治	
前 140 年	汉武帝即位	
前 138 年	张骞出使西域	
前 73 至前 71 年		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
前 27 年		罗马执政官屋大维确立罗马帝制
前 7 或前 4 年		相传基督教创始人耶稣诞生
9 年	王莽改制开始	
25 年	刘秀称帝，建立东汉	
30 年		相传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处死
68 年	汉明帝于洛阳首建佛寺	
73 年	班超出使西域	
79 年		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等城被埋在地下
97 年	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	
1 世纪		中亚贵霜帝国时代开始
105 年	蔡伦发明植物纤维造纸术	
184 年	黄巾之乱	
208 年	赤壁之战	

220 年	曹丕篡汉立魏	
221 年	刘备称帝，立蜀汉	
229 年	孙权称帝	
265 年	司马炎篡魏立晋	
280 年	晋灭吴、统一中国	
301 年	八王之乱开始（- 306 年）	
317 年	司马睿称王，东晋开始	
323 年		罗马君士坦丁统一罗马
376 年		以日耳曼人为主的部落开始强行移居罗马帝国境内
383 年	淝水之战，统一努力失败	
386 年	北魏人拓跋珪建立北魏（- 534 年）	
392 年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395 年		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部
4 世纪		加纳古国建立；日本大和国时代开始
420 年	刘裕篡晋立宋，南朝开始	
439 年	北魏统一北部，北朝开始	
446 年	北魏太武帝灭佛	
476 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494 年	北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	
5 世纪末		法兰克王国时期开始
534 年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	

约570年		穆罕默德在世（-632年）
574年	北周武帝灭佛	
589年	隋灭陈，统一中国	
606年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	
618年	隋炀帝死，李渊称帝，建唐	
622年		穆罕默德到麦地那，伊斯兰教纪元开始
629年	玄奘往印度取经（-645）	
630年		穆罕默德和门徒位领麦加，大食国立
641年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645年		日本大化革新开始
668年		新罗灭高句丽，统一朝鲜
690年	武则天称帝	
712年	唐玄宗即位	
718年		东罗马军打败大食军
726年		基督教东西教会开始分立
750年		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立
755年	安史之乱开始（-763）	
867年		东罗马马其顿王朝开始（-1057）
875年	黄巢之乱（-884）	
882年		基辅罗斯建立
907年	朱温篡唐建后梁，五代开始	

960 年	赵匡胤陈桥兵变，立宋	
962 年		鄂图一世称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开始（-1806）
1004 年	宋辽澶渊之盟	
1041 年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6 年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诺曼底诸侯威廉征服英吉利，英国诺曼皇朝开始（- 1154）
1068 年	王安石变法	
1096 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9）
1115 年	女真人建金国	
1126 年	靖康之难	
1127 年	宋高宗南京即位，南宋开始	
1147 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9）
1150 年		梵蒂冈宫殿始建
1192 年		日本镰仓幕府立
1204 年		十字军攻入东罗马，占领君士坦丁堡
1206 年	铁木真建立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1215 年		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
1219 年	成吉思汗开始西征	
1232 年	宋联蒙古灭金	
1235 年	蒙古拔都开始西征	
1237 年	蒙古拔都军攻入欧洲	

1252 年	蒙古旭烈兀开始西征	
1260 年	忽必烈在位 （- 1294）	
1265 年		英国首次国会召开
1269 年		第八次十字军略东征（- 1270）
1271 年	蒙古人定国号为元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东游
1279 年	元灭南宋	
1283 年		莫斯科公国建立
1331 年		日本南北朝时期开始（- 1392）
1337 年		英法百年战争 （- 1453）
1348 年		欧洲流行黑死病 （- 1350）
1368 年	朱元璋称皇帝，建立明朝	
1370 年		帖木儿帝国兴起
1378 年		天主教会分裂开始
1396 年		土耳其打败十字军
1399 年	靖难之变	
1405 年	郑和七下西洋 （- 1433）	
1417 年		天主教会分裂终止，教皇仍留在罗马
1449 年	土木堡之变	
1453 年		土耳其灭东罗马
1457 年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1462 年		法兰克福出现一年一度的定期书市，成为当时欧洲书籍交易中心

1488 年		葡萄牙人迪亚士到达好望角
1491 年		哥伦布到达美洲圣萨尔瓦多岛
1498 年		葡萄牙人达·伽马试航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到达南美洲东岸
1517 年		罗马教皇派人往德意志推销赎罪，宗教革命开始
1519 年		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命令，带领远航队环游地球（- 1522）
1543 年		哥白尼逝世，《天体运行论》遗作发表
1553 年	葡萄牙侵占澳门	
1564 年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世（- 1616）
1567 年	张居正改革	
1579 年		英国殖民势力开始到印度
1580 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澳门	
1582 年		日本丰臣秀吉统治（- 1598）
1588 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失败
1596 年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世（- 1650）
1600 年		日本德川家康取得政权；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16 年	努尔哈赤建后金国	
1618 年		欧洲三十年战争（-1648）
1642 年		英国革命开始（- 1649）
1643 年		英国科学家牛顿在世（- 1727）
1644 年	李自成入北京，清军入关	
1649 年		英国成立共和国（-1653）
1661 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 年至1681 年	三藩之乱	
1685 年	英国人在广东立商馆，开始通商	
1688 年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
1689 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修约	
1712 年	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丁赋	
1749 年		德意志文学家歌德在世（- 1832）
1773 年		英国北美殖民地波士顿茶叶事件
1775 年		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82）
1782 年	《四库全书》编成；广东十三行成立	
1784 年		英国瓦特成功改良蒸汽机

1789 年		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法国革命开始（- 1794）
1799 年	清算贪官和珅	法国拿破仑政变
1804 年		海地革命胜利
1809 年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世（- 1882）；美国政治家林肯在世（- 1865）
1838 年	清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	
1839 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 年	鸦片战争开始	
1842 年	南京条约签订	
1850 年	太平天国起义	
1852 年		法国路易·拿破仑称帝
1857 年	第一次英法联军	
1859 年		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始（- 1869）
1860 年	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洋务运动（- 1894）	
1861 年	慈禧当权开始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世（- 1941）：美国南北战争开始（- 1865）
1862 年		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
1864 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	
1865 年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林肯被刺
1867 年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69 年		苏伊士运河通航

1870 年		普法战争 （- 1871）
1871 年		德意志帝国成立
1876 年	清派学生到英、法学习	
1879 年		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斯大林在世 （- 1953）；美国爱迪生发明电灯泡
1894 年	甲午中日战争 （- 1895）；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1895 年	康有为公车上书	
1896 年	中俄密约	第一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
1898 年	戊戌变法失败	
1899 年	义和团开始兴起	
1900 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后记

感谢读者购买、阅读此书。

中外交流史的内容纷繁复杂，史料筛选不易，观点错综复杂。正因如此，中外交流史的内容吸引了众多的关注目光，不断有新的热点和谜底出现。这是一个“常维新”的领域。我读本科的时候，写过有关中西交流和中国外交史的文章，包括赫德与近代海关、朝贡体系、琉球历史、澳门与贸易等文章。何芳川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华夷秩序”论》是每一位做中国外交史和中外交流史的后来者必读的论文。这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文章纵横古今，将中国营造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梳理得异常清晰，并做出了至今依然难以超越、已然成为“公理”的基本判断。我头脑中关于中外交流的基本历史脉络是何老师的这篇文章奠定的。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选修过历史系茅海建老师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课程，并在课程中阅读了茅老师的《天朝的崩溃》和《苦命天子》两本书。茅老师的思维和观点启迪了我对中外交流史，尤其是近代外交的基本看法。研究生阶段，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外交，继续接触了很多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内容。我在这里都向读者坦白交代。

出版商显然也认为中外交流史的内容很值得认真去做。接到选题策划的时候，编辑告诉我这是一部书写中外交流的书，但是要从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角度入手。恰好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清朝中期的中国与琉球关系》，以中国古代外交为中心对中外交流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不知天高地厚”承接了这个选题。在本书中，我尝试着以时间为线索，结合专题探讨的形

式，书写自己心中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读者可以从中发现殷人东渡、徐福出海、丝绸之路、佛教东来、四大发明、蒙古西征、闭关锁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内容，看到张骞、班超、鉴真、成吉思汗、马可·波罗、南怀仁、马戛尔尼等熟悉的身影。希望读者诸君能够通过阅读此书，增长有关中外交流史的知识。

最后再谈两点有关中西互识的问题。古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喜欢自我局限在猎奇阶段，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不愿意花心思去深入思考外部世界。这样的认识倾向至今存在，非常令人担忧。具体谈到古代中外交流的情况，人们可以想到闭关锁国，可以记起四大发明，也为近代之后西方列强东来后中国的屈辱历史而扼腕。但对其他情况的记忆就很零星隐约了。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告诉读者，古代中国并不全是闭关锁国的自满自大时期，也曾拥有开放勃发的激情时代。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为世界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在西方历史上，西方人一直没有放弃对东方、对中国的认识。不论是丝绸之路还是传教士东来，更不论是近代的西学东渐，西方都在中西互识中扮演了主动角色。关于中国的形象，英国人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称，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是不断变化的“变色龙”。美国人哈罗德·伊克萨斯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中称：“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也经历了一条漫长的变化历程。”从一开始的神秘中国，到逐渐出现有关中国的传说，西方人就开始了探索中国认识中国的历程。随着各种渠道的交流（在这方面，西亚地区、阿拉伯世界和印度起到了桥梁作用）的深入，中国形象逐渐明晰。西方人凭借对中国的并不全面的认识，将中国形象定位为完美的国度，可供学习的榜样。近代之后，中国从优越的高峰跌落，中国形象也变成了落后贫瘠的老大帝国。在整个认识过程中，西方一直不缺清醒的旁观者和深邃的思想家。即使是侵略时期，西方对中国的观察也是一分为二，且教且学。但是中国却没有出现可与之媲美的人物。

即使是在同一个时期，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也不是统一的。美好的与丑陋的、可敬的和可悲的、可畏的和软弱的中国形象在西方时起时落。任何一种形象都不能完全取代另一种形象。这既反映出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特性的多重性、矛盾性与复杂性，也反映出了西方观察者视角的侧重点和变化。出现分歧是正常的。有的时候，认识的分歧和思想上的辩论，反而有助于认识的深入。

第二个问题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地区发展的历史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古代东亚的文明发展离不开中国。古代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保有对周边地区的相对优势。这种优势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构建了以中国为核心、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圈。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隐性资源，也是当代整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之一。

历史上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地区（欧洲和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最高，是区域文明交流的两大发动机。中西文明交流内容是中外交流史的主要内容。这是客观事实。但在现代认识中外交流内容的时候，不能存在“言必称希腊”的倾向。客观上，古代中国对世界历史发挥影响的主要地区是东亚、东南亚。我们不能因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忽视周边地区，忽视对古代东亚交流史的认识，也不能忽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情况。

再回到这本书的写作本身。书中的基本史实是根据笔者记忆而写；重要的历史时间都是王朝纪年和公元纪年连用；中外人名和地名以通用名为主。我想，每个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不会是百分之百满意的。作为在读学生，我一来对中外交流史的知识和理论积累不够，二来编写时间有限。在编写过程中，我大量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领域），再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和之前的文章积累，完成了这部作品。书中肯定存在观点的分歧和知识性的硬伤。笔者对本领域所有的前辈表示感谢，对所有的内容错误承担责任。

最后要感谢一长串的好友。首先，要感谢陈娇娇师姐。她在编写过程中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书中有关宗教内容的材料都是她热

心提供的；其次，要感谢“北京·牧”工作室的所有伙伴，感谢申竞然同学的热心校对；再次，要感谢杨文、罗凌，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督促，就没有这本书的完成。最后，更要感谢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员，没有他们的幕后工作，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

谢谢大家。

张　程

2007 **年** 1 **月** 1 **日**